

炎黄春秋



1964年6月，罗瑞卿陪同毛泽东等检阅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汇报表演。

平型关大战决策 过程写真

逐鹿中原

——邓小平政委在豫南

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

捍卫真理 矢志不渝

罗瑞卿从复出到辞世



3 95

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

鼓励

鞭策

厚望

——特邀编委、部分作者
座谈会剪影

1月5日,《炎黄春秋》杂志社在文采阁举行特邀编委、部分作者座谈会。

到会的特邀编委有:冯征、冯其庸、刘颖南、李庄、李普、苏双碧、常征、温济泽、廖盖隆、魏久明;作者有:王景山、尹骐、田方、李锐、陈思付、吴象、吴晓梅、张秀平、林里、胡永应、段向群、凌云、穆欣;特邀编辑有林耀、方徨。

国家新闻出版署、文化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有张伯海、王涛、黄河浪、力平、鲁璋等同志。

我社社长杜导正,副社长方实、宋文茂,副总编辑刘家驹、王恂等出席。



本期导读

平型关大战决策过程写真

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开全民抗战之胜利先声。粗知抗日战争史的人都会知道它，但它的策划过程恐怕就知者不多了。本文作者以确凿的史实，给读者介绍了当时敌我态势的演变，八路军作战原则和战略部署的形成，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前方将领（包括友军）反复商议的经过。

逐鹿中原

——邓小平政委在豫南

古语有云：得中原者得天下。在解放战争转入全国性反攻的决战关头，刘邓大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挺进大别山，实施中央突破；并与陈赓、谢富治兵团，陈毅、粟裕大军配合歼敌，建立中原解放区。这一重大战略行动，由邓小平任书记的中原局统一指挥，导演了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

万老说：“我没有写书，但是有些书里写到我，有的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人家不了解的，可能还以为我在吹牛呢！”万老为此大发感慨，并倾吐了他在庐山会议上种种难忘的经历。

捍卫真理 矢志不渝

——罗瑞卿从复出到辞世

本刊今年第1期，披露了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内幕。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复出。这位一代名将立刻以坚定的原则性和高昂的斗志，深入揭批林彪和“四人帮”，勇敢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决支持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一系列整顿措施，显示了共产党人捍卫真理、矢志不渝的高风亮节。

“为人民服务”光照千秋

——追忆毛泽东得知张思德牺牲后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的牺牲，在毛泽东的心灵中激起巨大的悲痛。他在追悼会上发表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讲话，至今光照千秋，成为共产党立党、解放军建军的唯一宗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面对拜金主义盛行，究竟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人人都应该作出明确的回答。

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

在“大跃进”年代，“卫星”频放，浮夸成风。1.016亩水田首创亩产36956斤的“世界纪录”，原来是层层“报喜”，层层“加码”的一场闹剧。这种图虚名招实祸的荒唐事，当今的人们不会再干了吧？否！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披露，某地乡镇企业虚报产值，竟能把早已破产没影了的企业“造”出产值来。看罢沉思，坚定了我们编发本文的决心。

下期要目

- △跨过鸭绿江的决策人
- △共和国史册上的大匪患
- △“文革”中，叶剑英与邓小平的生死交
-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
- △丁玲和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 △李宗仁、白崇禧“和共”内幕
- △一个“延安的养蚕姑娘”的辛酸人生
- △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了吗
- △揭开诸葛亮神的面纱
- △他们从深圳杀出一条血路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苏双碧
 张 镗 张国琦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 编 辑: 洪 炉
总 经 理: 徐 孔
副总编辑: 刘家驹 王 恂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木子
责任校对: 秋实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天津街7号
 邮 编: 1008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15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 6016633-227 6076801
 定 价: 3.20 元

专 稿	春秋笔	求 实 篇	英 杰 谱
④ 平型关大战决策过程写真 ⑫ 逐鹿中原——邓小平政委在豫南 马仲廉 罗高松	⑰ 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 李维民 ⑳ 「为人民服务」光照千秋 ——追忆毛主席得知程思德牺牲后 曾加顺 ㉑ 捍卫真理 矢志不渝 ——罗瑞卿从复出到辞世 黄 瑶	⑳ 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 章跃兵 ㉓ 敢讲真话的戏曲评论家景孤血 朱 复 ㉔ 刘仁静的是非功过怎能说没有定论? 洪 焰	㉕ 地下斗争二十年 ——向警予的助手陈恒乔与胡允恭夫妇的传奇生涯 王炳毅

目 录

殒星篇	轶闻录	赤子心	艺苑志	文荟园	时代风	神州光	古镜台	编读窗
<p>④5 「杀了卞卞 还有卞卞！」…… 罗林远</p> <p>④9 何万生烈士和他的革命老妈妈…… 安捷 ——北伐军歌作者与蒋介石的师生刘葛</p>	<p>⑤3 老作家冰心的海军缘…… 袁华智 唐宏</p>	<p>⑤6 共产党人的怀祖之情…… 王锡堂</p> <p>⑤9 第一个率团访问内地的台湾学者范光陵…… 江鲲鹏 ——记党和国家领导人瞻仰炎帝陵</p>	<p>⑥2 乌兰牧骑走红神州…… 郝玉峰</p> <p>⑥6 我国音乐美学的开路人何乾三…… 程迺欣</p>	<p>⑤2 海南颂(外一章)…… 陈雄</p> <p>⑦0 访擅写帝王的作家二月河…… 韩湾 冯兴阁</p> <p>⑦2 爱国情怀总是诗…… 周云龙 ——记文史研究者许华</p>	<p>⑦5 扬起一面中国帆…… 刘永路</p>	<p>⑦9 古钟妙曲传五洲…… 徐士杰</p>	<p>⑧2 载誉吐蕃的金城公主…… 格来</p> <p>⑧5 安刘氏天下者,谁也?…… 李邦云 ——西汉著名辩才和谋士陆贾</p>	<p>⑧6 本刊特邀编委和部分作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本刊编辑部</p>

你知道抗战初期驰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战，甚至会唱那首“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奔战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八路军军歌》，可你曾了解当年在全民抗战声中，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战，究竟是由谁，是怎样决策的呢？请看：

平型关大战决策过程写真

● 马仲廉

周恩来、彭德怀东渡入晋

1937年9月3日深夜，陇海铁路线上的一列专用客车由西安车站徐徐开出。列车出站后便加快了速度向东方奔去。

列车上乘坐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等高级将领。周恩来在近几个月内，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抗日统一战线，奔波于延安、西安、庐山、南京和上海之间，同国民党代表经过了反复的谈判与斗争，终于和国民党当局达成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在陕北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对日军作战。周恩来于8月中旬和朱德、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南京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后，赶回陕北，又在8月22日至24日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县冯家村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然后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秦邦宪、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赴西安，准备一起去南京，继续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有关统一战线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等到达西安以后，于8月30日、31日接连收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电报，要求周、彭二人改赴太原，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晤，商谈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和部队的补充计划等问题。

对于部队活动地区选择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关系到八路军当前对敌作战和同友军配合取得作战胜利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建立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问题。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于7月14日即向国民党当局表示，红军同意担任平绥线作战任务，并愿以一部兵力深入敌后方打击敌人；接着于

16日制定了红军参战方案，准备派一个游击师在热河、察哈尔、河北之间活动。8月4日，毛泽东等指示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国民党谈判，红军以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铁路西进和由平汉铁路南进的日军进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兵力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人后方。8月11日，周恩来等在南京国防会议上表明了中共中央的上述意见。当8月17日国民党当局希望红军进至晋察冀边陲地带的阳原、蔚县、涞源、灵丘地区准备作战时，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同意。但毛泽东等人担心国民党当局的这一方案包含祸心，又命周等拒绝这一方案，而提出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于8月下旬出发东进时，明确决定了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配合友军在平绥线、平汉线作战。

由于日军占领平、津后，于8月间沿平绥铁路展开进攻，国民党军事当局要求八路军迅速改编，东渡黄河进入华北前线作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于8月22日由驻地关中地区的三原出发，一边行军一边改编。该师沿着富平、蒲城、郃阳的路线，抵达黄河西岸的韩城，然后由这里渡黄河，到山西省的侯马乘同蒲铁路的火车北上。

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在参加了洛川会议后，部队已经出发东进。为赶上部队，他们赶赴西安，准备乘火车经潼关渡河，再乘同蒲铁路火车北上与部队会合。当他们到达西安时，周恩来已经接到毛泽东要其改赴山西的电报。于是周恩来命聂荣臻留下，和他一起赴太原，而林彪立即乘火车经潼关渡河北上与部队会合。

9月3日，周恩来又接到了毛泽东关于同阎锡山交涉八路军活动区域的另一封电报。电报中指出：“周、

彭到太原应与阎锡山交涉红军活动之如下地区：（一）涿鹿、阳原、蔚县三县境内一切友军未驻地区。（二）宛平、房山、涞水、易县四县友军未驻地区。（三）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六县县城以西地区。（四）涞源、阜平、灵丘三个全县作为我军之中心根据地。（五）广灵、浑源、繁峙、五台、盂县五县。以上共21县，有些是全县，有些是部分，均必须确实指定，并由南京及晋阎令知三省省政府转令各县县政府，同时令知各县及其附近驻军，说明红军之布防及创造游击根据地之任务。因为如不明白规定红军之区域及任务，并用通令下达友军及地方，势必因区域不明、任务不定而发生许多纠纷。”

当日夜间，周、彭、聂等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派的专车东行，陪同周、彭一起到太原的还有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副师长肖克，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准备到晋绥军第六集团军担任顾问的程子华。

东开的列车9月4日晨抵达潼关。周、彭等人下车后，即乘船渡过黄河到达彼岸——山西境内的风陵渡。

周、彭与阎锡山岭口会晤

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东渡进入华北前线作战和入晋路线，是同国民党军事当局商定的。对此，蒋介石给阎锡山已有所交待。阎对此事也相应地做了准备。但周恩来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到太原同他会晤，却是他未曾料到的。在他接到由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转来的电报后，立即指示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准备在太原的接待事宜，并指派梁敦厚到风陵渡迎接。

梁敦厚，字化之。他是阎锡山的亲信，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总干事，牺牲救国同盟会总干事。待周、彭等人在风陵渡下船后，即由梁迎接登上了同蒲铁路风陵渡车站的专车北上，于9月5日下午到达太原。

由于日军占领南口、张家口后，继续向山西、绥远进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雁门关南的太和岭口设立行营。于是周、彭等在太原停留一天后，于7日到达岭口，受到阎的热情接待，稍事休息后便开始会谈。

参加会晤与谈判的第二战区方面有：司令长官阎锡山，长官部参谋长朱绶光，高级参议续范亭，第19军军长王靖国，第七十二师师长陈长捷和梁化之，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彭德怀、肖克、徐向前和八路军驻太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左）与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会晤

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

会谈中，周恩来耐心地向阎分析了抗战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当前是敌强我弱，但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他鼓励阎坚持抗战并对阎表示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给予积极的评价。希望他与共产党合作到底。周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

经过协商，共同决定：（一）八路军进入山西以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二）在第二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其工作纲领由中共拟出。（三）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四）给八路军补充物品，兵站帮助运输。

周、彭等还接受阎锡山的建议，于当日下午赶到大同，同正在那里指挥平绥线上作战的傅作义，会晤3个小时。9日返太原后，周、彭将同阎、傅会谈情况电告朱德、任弼时并报毛泽东。9月16日至19日，周、彭还专程到河北省保定市会见了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商谈了八路军与第一战区部

队在阜平地区协同作战等问题。

这样，八路军在冀察晋绥四省边界地区活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配合友军作战的方针得到了落实。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八路军按全国战斗序列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隶属于第二战区，归阎锡山指挥。对此，朱、彭于14日向各部队发出通令。这样，又出现了第二战区与第十八集团军的指挥关系问题。当然，按常理指挥关系是明确的。但这毕竟是国共两党与两军的关系问题。何况，中共方面一再声称八路军采取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9月16日，周恩来派彭雪枫赴岭口会晤阎锡山，进一步明确两军指挥关系，并向阎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含义。

彭雪枫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阎解释说，这是八路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其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八路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府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八路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关于指挥关系，阎锡山说，“今后指挥八路军拟用两个原则：（一）事先相互商议；（二）临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由八路军自行酌量行动。”此外，阎还对彭雪枫十分坦诚地说：“八路军作战自动，不用督促；晋绥军扰民有余，扰敌不足。嗣后两军协同，必须互取短长。”阎还从战局发展趋势考虑，提出在日军深入的情况下，以晋绥军一部同八路军一起建立五台山抗日根据地问题。对此，彭表示转报中共中央决定。

阎锡山的决战计划

华北战局在进入9月中旬以后，第二战区在平绥线上的军事形势急剧恶化。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占领张家口后，接着向天镇方面发动进攻，击溃天镇、阳高地区中国守军后，于9月13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日军第五师团同时占领察南的阳原和蔚县，并于14日进占广灵。然后，第五师团以第二十一旅团的4个大队分别向浑源和灵丘进攻，矛头直指内长城一线，目标是平型关内的大营镇。

在日军进攻面前，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先是将平绥线上作战的部队撤退至桑干河南岸布防。当日军第五师团占领阳原、蔚县、广灵，并以主力一部由灵丘指向平型关时，阎锡山很不理解：日军主力为何不由大同沿平坦的地形直下雁门关，而从对于进攻不利的

广灵山地指向平型关？他突然回忆起一件事来：1936年夏天，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到太原访问。板垣是阎留学日本时在士官学校的同学。当时板垣不乘火车，而乘汽车从察哈尔沿蔚县至代县的公路进入山西，据说板垣在这段公路上还不时徒步行进。那时他不解其意。当板垣率第五师团从第一、二战区的结合部直插进来越山地直指平型关时，他才省悟到那时板垣是进行战略侦察。于是阎赶忙制定了一个将日军放进平型关以内加以围歼的决战计划。这个计划的方针是：以诱敌深入至砂河以西地区，从恒山、五台山两方面发动箝击，并截断平型关要隘，歼灭日军于浑沱河上游盆地。据此，阎锡山按照他的决战设想，再次调整了军队部署。

阎锡山对于这个作战计划十分满意，他曾得意地说：“布好口袋阵，让敌人进得来，出不去。”他派高参前往平型关、团城口、恒山等地，向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等传达作战意图；又将屡屡不肯力战的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从砂河召到岭口行营拘押起来，传令各军，藉肃号令。

但是，阎锡山深知他指挥下的晋绥军战斗力很差，部分中央军属于“客军”，很难指挥。南口、张家口的败退和大同的失陷，更给他能否实现这一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平绥线作战失利后，他曾作《弃雁绥工事诗》表达他的心情：

“国防大计定当先，
临时决策事难全；
工事费款千余万，
放弃全由南口牵。”
“南口之役失全衡，
准备毫无守何成？
八师精锐损半数，
致使雁绥枉经营。”

平绥线上南口、张家口、大同失守了，雁门关和绥远怎么样？能守住吗？

此时，阎锡山十分盼望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主力到来后，加入对日军的决战。

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八路军先头部队第一一五师，于9月上旬由晋南的侯马陆续登车北上，由于车行缓慢，时行时停，到14日第一批部队第六八六团和独立团，在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率领下抵达原平和林彪会合。阎锡山指令战区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右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右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右四），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右三）在一起。

驻原平军事交通处派汽车，立即将所到部队输送到大营，以便让第一一五师及时参加与日军的决战。此时，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和第三四四旅仍在同蒲铁路南段输送中，因天雨路断，部队只好参加抢修铁路，因而延误了北上时间。

9月14日，林彪率第一一五师先头部队乘汽车进到平型关西南的大营镇。当日，林彪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发出“在当前情况下一一五师行动计划”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在广灵失守，灵丘附近到敌之情况下，原定一一五师经灵丘到涞源计划已不执行。现拟将三四三旅及师直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侧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敌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三四四旅应经忻县、定襄在河边村下车，经五台、恒山以南向涞源前进，到涞源后再依当时情况向敌侧后活动。

毛泽东收到林彪的电报后，于16日电林彪，指出：“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自蔚县急进。晋阎拟集中14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一一五师参加作战。我

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要动摇此方针。”

看来，在八路军的作战原则上林彪指导思想是同毛泽东不一致的。

毛泽东虽然要求林彪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但依然要林彪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作战的意见立即电告。

17日，林彪致电毛泽东，提出他对当前一一五师行动原则。他说，我目前采取的行动原则，是在敌目前正在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关于第一一五师目前行动方针，不只三四三旅应在现地域协同友军作战，师直及三四四旅亦应同样任务而靠近三四三旅，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任务而进驻阜平。理由是：（一）目前敌正在前进中，运动中，作战中，为我进行运动战之良好机会。我友军目前尚有抗击敌人之相当力量，为能得到友军作战之良好机会。现地域为山地，为求山地战之良好机会。倘过此时机，敌

已击破友军,通过山地并进占诸主要城市时,即较难求运动战、山地战及友军配合作战。(二)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过少,则有失众望。(三)兵力过小则不能将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敌之一部以上。(四)目前须以打胜仗,捉俘虏,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五)目前第一仗实以集中约一师的兵力为好,待尔后客观情况下已失去一师兵力作运动战之可能时,再分散作群众工作和游击。

林彪提出以一个师的兵力打运动战的主张,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时,他刚刚进入前线,还未来得及察看地形。这说明他在北上行进途中,从军用地图上研究了内长城沿线及内外的地形。他同时也研究了友军的战斗力。此外,他从提高军民的抗战信心和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着想。而且还说明,他的这一主张是按当前情况作出的。情况发生变化,条件不允许时,再分散作群众工作和打游击战。理由是充分的,但显然与毛泽东的主张相悖。

毛泽东提出改变八路军的战略部署

根据华北战局的发展,毛泽东于9月17日发出了改变八路军战略部署的长电(全文约1400余字),征求前方各将领的意见。

他在分析日军为完成夺取华北五省的企图时指出:“其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日寇右翼之主力,又分为三路,均以追击姿势前进。一路沿平绥东段、同蒲北段攻雁门关,判断约一师团,占大同后,现未动。一路由天镇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行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卫立煌军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蒋以卫立煌军处于敌之包围中,令其向平汉线撤退。阎以灵丘为山西生命线,拟集中14个团在平型关以北举行决战。判断如决战胜利,则敌之南进可稍延缓,但必增兵猛攻。如决战失败,敌必速攻平型关、雁门关,待后路预备兵团到达后,主力直下太原……”“晋阎指挥下之傅杨刘汤各军均失锐气,使我们不能作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之结论。”

毛泽东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毛泽东指出:“原决定的八路军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

侧,箝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致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与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一)我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岑山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面军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三)我一方面军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四)总部进至太原附近,依情况决定适当位置。”

为贯彻执行这一计划,毛泽东在17日这天致电正在东进途中的朱德:请速去太原转雁门关与阎锡山商谈一二〇师防地问题。我们提出该师应以晋西北之五寨、神池、平鲁等地为根据地,向绥远省游击,以箝制日军南下。

在毛泽东17日发出变更八路军战略部署的电报时,周恩来和彭怀正在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等地同第一战区领导人会晤。18日,彭德怀电报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提出目前应尽力争取山西之持久抗战,以便发动和组织恒山、太行山脉和晋绥地区之群众,使敌虽深入山西,但仍处在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之中。彭并提出了三个师的部署意见:第一一五师进至灵丘及涞源以南;第一二〇师和总部直属队进至五台、灵丘及阜平以西;第一二九师将来出动晋西北;另以一小部兵力向绥远省发展游击战争。

9月19日,周恩来、彭德怀由石家庄回到太原,下车伊始,就接到了毛泽东给彭德怀18日电报的复电,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他说:“敌在太原志在必得,此时我们的部署应远看一步。五台、定襄、盂县地域小。敌进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之中。林彪、杨爱源二部在此区域亦属暂时的性质,无持久的可能。判断该地只能支持数千人的游击战争。贺龙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以相当有效的箝制作用。五台区域有林、杨二部十分足够。贺师开去则失战略意义。因此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将来刘师与林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中。至吕梁山脉(吉县汾河间)可由陕北抽调一部去策应。”

显然,这时出现的新问题是,根据战局发展,八路军必须调整原拟将三个师都集中在冀察晋绥四省边界地区的部署,还有第一一五师如何配合友军在平型关地区作战问题。这两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而解决这两个问题,除中共中央军委和前方将领统一认识外,还必

须同阎锡山协商。

八路军侧击日军的最后决定

遵照毛泽东调整八路军战略部署的指示，彭德怀偕彭雪枫于9月19日晚间会见阎锡山。他热情地接待了彭、彭二人，并请刚刚来到山西了解战况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管军令的第一部长黄绍竑参加了会谈。

会谈开始以后，阎锡山向彭德怀等首先介绍了当前敌情和战区作战部署。阎说，在日军未到砂河之前，即在灵丘、平型关、大营镇之线对日军进行抵抗；在日军进至砂河之后，集中24个团的兵力与敌决战。在决战时要求八路军抄击日军进攻的左侧背。

接着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向阎提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改变原定计划而出晋西北的意见。阎表示不十分赞成这一改变，而黄绍竑则坚决反对。对此，彭与阎、黄展开争论，坚持第一二〇师出晋西北。最后决定了一个折衷方案。其主要内容是：第一二〇师直属队率一个旅在晋西北，以神池为指挥中心地点，小部伸出左云、右玉向敌游击；发动和组织五寨、保德、河曲、偏关地域的群众。主力即在神池、宁武集结休整训练。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由副旅长王震率该旅一部，进至五台东北，阜平以南地区，根据情况变化逐渐向南发展。林彪率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去灵丘、上寨地域，相机协助友军袭击日军侧翼。聂荣臻率第三四四旅及直属队进至阜平。八路军总部准备进至五台东侧的石咀附近。

至此，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改赴晋西北和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地区侧击进攻日军，配合友军作战的计划定了下来。彭德怀于20日将会商结果及对砂河决战的想法电报毛泽东。毛泽东于21日复电彭德怀，对于砂河决战，同意彭的看法，并阐明了他的观点。毛泽东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今日红军的作战原则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

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电报还说：“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17日的判断与部署，他只想以陈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9月21日，八路军总部对各师发出《关于作战方针和军队部署的训令》，对于当前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指出：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兴奋友军，转变呆板死守的战术，造成持久胜利的发展。对于已经入晋的各部目前具体部署的原则是：第一二〇师主力以灵活的游击战袭击向左云方向之敌，并发动及组织晋西北及绥东群众，组织游击队。王震率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进至五台东北豆村镇、台怀镇地域，准备适时相机参加战斗。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控制于上寨镇附近，小部经常袭击扰乱灵丘、涞源之敌。第三四四旅最好位于阜平东北，随时协同第三四三旅相机袭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有力挺进游击队，深入紫荆关、蔚县、涿鹿之间活动，收编散兵，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总部直属队开进至五台附近。

9月2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说，日军正以主力猛攻保定，以一部袭击平型关，另一部占左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广灵、灵丘以南平型关一带待机。宋时轮支队出晋东北游击。王震旅开阜平。贺龙率第一二〇师师部及张宗逊旅开晋西北，驰援雁门关。建议第一二九师速开正太线南北地区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扩大队伍，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

总部的训令和周恩来的电报，进一步明确了八路军集中主力一部侧击进攻日军，配合友军作战的部署。对此，毛泽东于24日复电周、朱、彭、任说：“已令刘师准备出动，该师行进路线仍以走侯马上车为宜。”“林师及王震部既均使用于作战，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布置。”

至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前方的八路军将领之间，关于集中主力一部侧击进攻平型关日军，配合友军作战的部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大战前夕

这时，华北战局已经发生剧烈变化。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从9月14日起向保定地区展开进攻。18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决定，将处于平汉铁路线主攻方面右翼的第五师团参加保定方面作战。命令第五师团留

精锐部队一部于山西省北部外，主力迅速经涑源进入保定地区作战。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遵照命令，除令第九旅团于19日占领涑源外，亲率一个联队留在蔚县，这时发现中国军队在山西内长城线上布防，所以决定以一部兵力进入大营镇附近，以保障师团主力的转移。9月20日，板垣命令在广灵的步兵第二十一旅团长指挥第四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和野炮兵一个大队向灵丘进攻。在灵丘前线阻敌的中国军队第七十三师被迫转移至龙泉寺、白咀子、1286高地至大西沟一线；独立第三旅退至灵丘以南山地。灵丘城即被日军占领。至此，日军逼近内长城线。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于9月14日以后，陆续到达平型关西南的大营镇，并于19日抵平型关东南的上寨、下关地区集结。在此期间，师长林彪曾乘汽车出平型关到灵丘侦察敌情、地形，预定了在日军攻击平型关正面友军阵地时，由平型关东北山地侧击日军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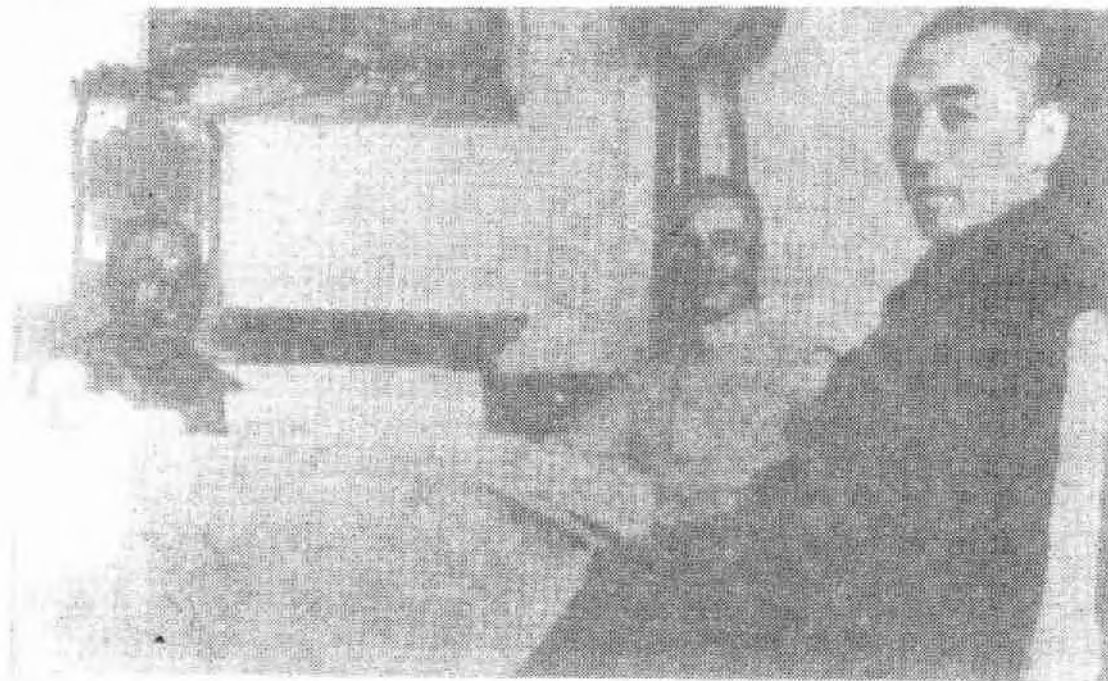
21日晚，周恩来陪同到达太原的朱德总司令赴太和岭口同阎锡山会晤，进一步协商了八路军的游击地区、军队驻扎和兵力使用等问题。朱于22日由岭口转五台，23日将八路军总部设在五台县城东的南茹村。周恩来和阎锡山一同视察了雁门关防御阵地后，也转五台，并于23日回到太原。

9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长三浦敏

事率领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配属于该旅团的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由灵丘出发，以大营为目标，沿灵丘到平型关的公路追击后撤的晋绥军第七十三师部队。22日晨，该部日军在蔡家峪地区击溃晋绥军掩护部队一部后，进抵平型关守军阵地前。当日夜，日军开始攻击平型关外的东、西跑池守军阵地。进占浑源的日军第二十一团第二十一联队主力（欠第三大队）于22日也加入了平型关方面的战斗。

根据日军进攻情况，阎锡山于23日作出计划用总预备队中的第七十一师附新编第二师，共8个团的兵力，由内长城外侧公路以北地区向东、西跑池、小寨间迂回，侧击日军之右侧背；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由平型关东方便山地夹击日军，断敌后路；以第七十二师和第三十五军两个旅为总预备队。由傅作义任出击总指挥。阎当即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8个团兵力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夹击敌之侧背。”阎并令其它出击部队迅速向出击地点前进。

八路军总部接到阎电后，立即命令第一一五师进行战斗动员，并于24日拂晓向进攻平型关的日军侧击，与友军出击部队协同作战。当日晚20时，朱、彭电报毛泽东说，我一一五师今晚以3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之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这一情况，朱、彭同时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右)、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左)接见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中)

电报阎锡山和蒋介石。

第一一五师接到八路军总部出击敌人的命令后，于当日召开了战斗动员会。此时，聂荣臻率三四四旅也到达了下关地区。聂当即与林彪共同制定了部队出击计划和作战部署，并参加了战斗动员会。

当日夜间，第一一五师进至平型关东南的冉庄。这时，担任出击的晋绥军部队，由于向前开进中行军疲劳，不能按计划在24日出击，因而傅作义决定将出击时间推迟到25日。

1937年9月25日，在山西省北部内长城线上的平型关地区，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板垣师团一部的战斗激烈展开，并取得了歼敌千余人的首战胜利。此战震惊中外，给疯狂入侵华北内地的日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和信心。

平型关战斗的决策，是经过一段商讨过程的，而这一战斗的决定，又同整个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战略部署联系在一起。因此说这一战斗的决策不属于某一个人，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前方将领们共同决定的。如果一定要明确是谁具体决定的话，可否这么说，平型关地区侧击日军，配合友军作战，最初是由林彪提出，由彭德怀同阎锡山商定，最后经毛泽东同意的。

尾 声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9月25日侧击日军取得胜利

后，毛泽东于26日10时致电朱、彭、任并告林彪、聂荣臻，表示祝贺说：“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就在25日第一一五师同日军鏖战之时，毛泽东致电朱、彭、任、周并告林彪，提出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其中提出：“拟建议蒋阎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与我林师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挥，在蔚、涞之敌向保定前进，灵、广之敌向代州前进，确已深入之际，从灵、涞之问向北突击（反攻性质的中央突破），恢复灵、涞、广、蔚四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涞、广、蔚建立群众的及堡垒的根据地。”29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朱、彭、任，指出：“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阎必须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但须计算，这仅是战役的暂时的局面，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可见，毛泽东此时在强调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原则下，也主张在有利条件下以主力一部集中作战。不久，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正式形成了，即“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有人曾提出批判林彪在平型关作战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毛泽东亲自出面予以制止。
(责任编辑 洛松)



平型关战斗胜利后，战士们凯旋归来

逐鹿中原

——邓小平政委在豫南

● 罗高松

那是如火如荼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的第一年对敌作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歼灭伪军、保安队等敌杂牌军34万人，共计112万人。敌消我长。国民党的正规军由200万下降到15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由61万发展到100万以上。这一迅猛变化，引起国民党营垒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同时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为了发展有利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向人民解放军提出了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作战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此时国民党的重兵深陷于陕北、山东两个战场，而两者之间的兵力十分薄弱，恰像一个“哑铃”态势。毛泽东慧眼独具，他以战略家的伟大气魄，不失时机地作出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实施中央突破；陈赓、谢富治率太岳

兵团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进入豫皖苏边区，三支大军在中原构成“品”字形，相机歼敌，建立中原解放区。这一重大战略行动，由1947年5月成立的以邓小平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指挥。古语有云：得中原者得天下。这正是逐鹿中原，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战略部署。就在这个重要时刻，中国的政治家邓小平和军事家刘伯承联袂出现在豫南大地，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令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活剧。

抢渡淮河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两道难关之一。而今邓政委这样说：“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

遵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率军于1947年6月30日一举突破黄河天

险，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正当部队经过鲁西南战役，抢时间休整的时候，毛泽东发来一个三A级（最急的）秘密电报。电文不过8个字：“陕北情况甚为困难”。以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沉着冷静，居然说“困难”，而且“甚为”，刘邓顿感局势严重，必须尽快行动，减轻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的压力。于是，不管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头上有敌人飞机盘旋轰炸，毅然率主力4个纵队，12万余人，分成左、中、右三路，提前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征程。8月11日跨过陇海铁路。18日涉过黄泛区并渡过沙河。25日从汝河杀出一条血路。26日夜，刘邓率中路之第二、第六纵队主力，抵豫南之淮河北岸息县县城至临河一线。邓政委向部队响亮地提出：“进到大别山就是胜利！”而过了淮河，就进入了大别山。

淮河是中国五大河流之一，由西向东横贯豫南与安徽全境。时值雨季，水深流急，是横亘在南征大军面前的最后一道天险。渡口只有10来只小船和竹排，身后有19个旅的庞大追兵在蒋介石严令下急

速逼近，先头部队距我军后卫仅15公里，稍有迟延，就将面临背水作战的困境。深夜，刘邓和李达参谋长等在小王湾举行紧急会议，研究抢渡淮河问题。邓政委提议：“伯承先行指挥过河，我和李达在后方指挥部队阻击。”刘司令员果断地说：“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行动。”

会后，刘司令员亲自登上竹排，手拿一根长竹竿，边渡河边测水深，找到了可以徒涉的渡口水道。第二天天一亮，千军万马沿着河面特设的行进标志，全部渡过了淮河，匆匆飞来的敌机和姗姗来迟、正赶上洪峰的追兵，都只好望河兴叹。几十年后，邓政委谈起抢渡淮河的情景还如在眼前，他以历经艰险而后特有的自豪口气说：“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

豫南地处大别山北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党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刘邓率军进入豫南，到达大别山，是为了立足大别山。但历史证明，在大别山站稳脚并非易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主力曾4次从这一根据地撤出来。有鉴于此，邓政委在渡过淮河的当天，即8月27日，就以中原局名义向部队发出了《关于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今后任务，是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指出，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必须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应向全军分析有利条件，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应向群众说明，我军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8月31日，邓政委在光山县北向店向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时，

慷慨激昂地说：“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十分光荣的，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

邓小平不仅是大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军事家。他的作战格言是：“不敢白刃格斗算不了优秀部队，不能制胜强敌是无能的指挥员。”

刘邓率军进入大别山区，立即分遣各部迅速向预定地点实施展开，于8月底先后占领了豫南地区的固始、光山、潢川、经扶、商城县城，并将主力摆在商城、光山、罗山之间，扎下御敌阵势。9月上旬，蒋介石心急火燎地以23个旅的兵力紧跟刘邓过了淮河，分途扑进大别山区，他的如意算盘是乘刘邓大军立足未稳，将其歼灭或逐出大别山。根据中央指示，刘邓采取避开桂军主力，先打较弱的滇军的作战方针。9月4日，滇军鲁道源第五十八师为抢占商城，兵分东西两路沿固（始）商（城）公路由北而南进犯。刘邓以第一、第二、第六纵队一部，在商城以北河凤桥至商城以东鄠家集地区的高斛山，摆开东西30余里、南北10余里的宽大战场，围歼该敌。这是刘邓指挥部队在豫南、也是在大别山与敌军打的第一仗。激战从5日到8日，由于我军初到南方，不熟悉山地水田作战，仅歼该敌一部。

9月18日，敌五十八师新十旅第二十九团出商城至城西15公里的钟铺一带构筑工事，企图阻止我军再取商城。当日午夜，刘邓命上次参战部队对敌完成合围，次日拂晓发起攻击，战至20日下午3时，歼敌2000余人，缴获其全部装备物资，取得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来首次小规模歼灭战的胜利。

9月下旬，国民党五十八师主力由商城退往潢川，刘邓拟歼该敌于运动途中，一纵第二十旅奉命在商、潢间的潘店地区与敌激战一夜。后因敌桂系吴绍周第八十五师增援甚快，刘邓乃决定集中主力，诱八十五师至光山县斛山寨伏击之。26日，敌八十五师在10多架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军发起连续进攻，均被击退。我军一面阻击，一面实施两翼迂回。战至下午5时，敌遭重大伤亡，发现我军合围意图，遂拼命突围西窜。

9月上旬以来，刘邓指挥的在豫南商城、光山地区的3次作战，成功地将军队全部机动兵力调动至大别山北麓，保证了我军在鄂东、皖西地区的展开。9月27日至29日，刘邓在光山县双轮河附近的王大湾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总结进入大别山5个月来的工作，特别是豫南3次战斗的经验教训，解决增强部队斗志，克服右倾情绪，进一步整饬纪律问题，同时针对战局的发展，研究部署了歼灭敌人、发动群众、筹集给养等任务。会上，邓政委对全国形势作了分析后强调指出：“我们有些人只看到自己的艰苦，而看不到全国战局这种新变化，个别人甚至产生了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现象，这种错误倾向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蒋介石对其在豫南地区的损兵失地不甘心。9月底，调集大别山北麓的7个整编师，意欲合击经

扶、光山一带我军主力。刘邓指挥我军，机动灵活地运动歼敌。10月1日，中原独立旅在一纵前卫部队配合下，再克经扶县城，击毙国民党经扶县长和保安团长以下守敌600余人。经过反复争夺，光山、固始县城仍为我所控制。7日到10日，三纵在皖西张家店战斗歼灭敌八十八师师部及六十二旅全部，俘敌少将旅长唐家楫以下官兵4700余人。此期间，一纵一旅在二纵四旅和中原独立旅的配合下，分别在鄂东、歧亭、李家集等地，先后歼敌一六四旅2个营、四九〇团大部、新十七旅旅部及五十二师九十九团1个营。25日至27日，刘邓亲临前线，指挥野战军主力在鄂东发起高山铺战役，全歼敌1个师部、3个旅部、5个整团，共毙伤俘敌副师长以下1.26万余人，取得了挺进大别山以来在外线作战的空前大捷。到10月底，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歼敌3万余人，解放县城24座，建立了33个县政权，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实现了毛泽东所指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一个前途。

眼看刘邓率军在大别山扎下了根，蒋介石坐卧不安，十分恐慌。11月下旬，破天荒的任命其并不放心的国防部长白崇禧组建“国防部九江指挥部”，集中15个整编师又3个旅的兵力，妄图倚赖桂系精锐对大别山进行“总体战”。面对不可一世的敌人，刘邓决心采取“避战”方针。经请示中央同意，决定由邓率前方指挥所，指挥主力坚持内线反“围剿”斗争；刘率部分兵力转入大别山以西的桐柏、江汉一带，实施战略展开。

12月13日，刘邓暂时分开了。邓小平不仅是大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军事家。在作战指挥上，他知己知彼，多谋善断，不拘泥于成法。

他的作战格言是：“不敢白刃格斗算不了优秀部队，不能制胜强敌是无能的指挥员。”面对敌人疯狂围攻，邓政委出人意料的决定“敌进我进”，指挥二纵自光山、罗山一带挥师东进，直趋固始、商城，吸引已进到沙窝、白雀园一带的敌四十八、五十八师匆忙回救，待敌行将逼近时，二纵又自固始插向皖西，迫使敌军继续东调。指挥三纵拖住敌几个主力师在经扶、商城、潢川、固始及鄂东的麻城、黄安地区周围，先后三次摆脱敌人的合击，行程千余里，胜利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困的艰巨任务。12月中旬，各纵队跳出敌人合围圈后，进入指定地区，适时分遣集结，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在鄂豫边区取得很大战绩。12月24日，六纵十六旅从英山经200余里急行军，奔袭广济县城，全歼守敌1800余人。继之，六纵十

七旅在黄陂长轩岭全歼敌保安团1个中队。与此同时，鄂豫军区部队在12月下旬歼敌正规军和地方乡保武装1600余人。从1947年12月中旬刘邓分开，到次年2月下旬，邓小平北渡淮河与后方指挥所会合，这两个多月中，邓政委有时只率一个警卫团在豫南崇山峻岭指挥反“围剿”斗争，环境十分险恶。此时的邓政委，总是站在整个中原乃至全国战局的高度来思考问题。12月22日，他在商城南部以刘邓名义向中央军委作出的《关于和华野、陈谢兵团协同粉碎敌人围攻的作战意见的报告》便是明证，其中写道：“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一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豫陕鄂和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极为有利。”历史发展正是这样。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内外紧密配合，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的“总体战”。



胜利到达大别山后，邓小平在干部大会上讲话

占据中原大部地区，吸引和调动了大量敌军，对全国战局发生了深刻影响。

毛泽东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新区斗争策略，向全党批转了他的报告，并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邓小平富有远见卓识。他与刘伯承把地方党政军组织建设，作为开辟新区、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关键环节来抓。8月下旬，刚刚突破汝河防线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就在息县的彭店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进入大别山后的行政区划和党政军组织建设问题，决定成立下辖固始、商城、潢川、光山、经扶、罗山、礼山等7个县的豫东南工作区。固始、光山、潢川、经扶、商城县城相继被我军攻占后，各县都成立了县委和县民主政府。10月，中共罗山县委和县民主政府亦宣告成立。展开在这一地区的刘邓大军各部，对各县建党建政工作都奉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随着解放区域逐步扩大和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10月12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决定撤销豫东南工作区，建立鄂豫区党委、行署和军区，豫南商城、固始和潢川、光山、经扶、罗山、信东各县，分属鄂豫区一、二两分区。

建立政权后，头一件大事就是进行土地改革。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2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要求部队把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看成是自己的头等任务。据此，豫南各县首先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斗争。11月到12月，光山、经扶两县大部地区，固始、潢川、商城、罗山、信东部分地区都进行了土地改革。本来农民盼土地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但由于豫南解放区土改是在国民党军队实行重点“围剿”的情况下进行的，群众又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分配土地得而复失的惨痛教训，加之在政策和策略上犯了“左”倾急性病，如侵犯中农利益等，造成一些地方田地明分暗不分，未能收到预期效果。邓政委及时察觉了这些问题，纠正态度很坚决。1948年1月，他率“前指”到商（城）金（寨）边区检查工作，发现有的区乡在分浮财中，贫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而果实却落到流氓地痞和地主狗腿子手中，还发现少数干部存在着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当即将此情况通报，并指示各区“严重注意”。同月30日，邓政委在新县（即经扶）写给毛泽东的《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政策问题》的综合报告中，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了大别山区的土地改革状况、阶级状况，第一次正式提出不同地区的土改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的观点，即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游击区则不能急于平分土地。2月8日，他在《复毛主席征询新区斗争策略与群众组织形式问题》的报告中，根据大别山解放区在土改运动中所犯急性病错误的教训，提出“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要。①根据地之建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两载所能达到。②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实于农民

有利，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毛泽东立即向全党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3月25日，中原局发出《关于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全面阐述了大别山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政策思想和策略观点。随着这些正确政策的执行，豫南各县土改工作一度出现的“左”倾急性病错误很快得到纠正，从而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数九寒天，滴水成冰，警卫员要拿点稻草给首长烧堆火烤烤手，邓政委连忙说：“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来之不易呀！”

邓政委一向非常重视部队纪律，对于部队进入新区因供给困难、生活艰苦而可能出现的纪律松懈早有预料。他认为：“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因此，在部队刚进豫南地区的9月2日，他和刘伯承在经扶县小姜湾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了整顿纪律问题，他严肃地提出，“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成是枝节问题，而是一个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事”，“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的大事”。会上宣布了“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的三条纪律。会后向部队颁发了整顿纪律的紧急命令，对于一些严重违反纪律的问题，都做了严肃处理。之后，全军纪律肃然，真正

做到了秋毫无犯。因此在豫南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如邓政委率“前指”于1948年1月5日进驻商城南部五里山村，由于数日前第一次驻这个村时纪律严明，这一次群众不仅不“跑反”，反而高兴地向指挥员们说：“解放军真好，水满缸，房子打扫得亮堂堂。早知解放军这样好，我们还跑什么呢？”

在严于带兵的同时，邓政委极其重视部队思想工作。1947年10月的一天，他在一个小山坡的草坪上，向二纵连以上干部作政治报告。他绘声绘色地说：“我们进军大别山，就像打篮球一样。蒋介石看我们到大别山投篮，要得分了，他就把前锋后卫都调来跟着我们。这样，他顾了南就顾不了北，他不让我们在南面投篮，不惜用几十万大军缠着我们，可他北面的篮板就空出来了，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北面就可以投篮得分了。”他又说：“要讲困难，我们有，蒋介石也有。我们的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前进中、胜利中的困难。而敌人呢，他们面临的是解放区、蒋管区人民的重重包围，他们的困难是全局性的，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不可克服的困难。眼下，我们虽然困难一点，我们身上还要掉几斤肉，我们还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很光荣的。”这幽默风趣而富有哲理的讲话，大大鼓舞了部队了士气。

其实，邓政委最关心干部战士的冷暖。1947年10月，天气逐渐寒冷，指战员还穿着南征时的单衣转战。邓政委与刘司令员为减轻老解放区的负担，决定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指示各部队派出采购人员，向商人和农民购买布匹和棉花。没有弹弓和染料，就用树条和草木灰代替。不会裁缝，除了请老乡家的



解放军通过黄泛区

妇女帮忙，刘司令员还亲自到连队示范。刘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一定要有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以烂为荣，不是光荣。”邓说：“我们这个军队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只要自己动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久转战豫南的指战员都穿上了自己动手做的新棉衣。

邓政委时时刻刻关心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人民。1947年12月29日，“前指”冒雨抵达商城南部山区熊家畈宿营，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年轻人都冻得搓手跺脚。邓政委穿着同样单薄的灰粗布棉袄，自然也挡不住寒，警卫员要拿点稻草给首长烧堆火烤烤手，邓政委连忙说：“不用烤火。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来之不易呀！”30日，邓政委与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前往安徽省金寨县漆店区视察工作，途经商城南部黑河村时，一位农民反映他的一头牛被剃匪的解放军牵走了。第二天遇上解放军工作队，邓政委得知是他们牵走的，便命令他们赶快把牛送还老乡，并批评说：“你们怎么不

想想土匪的牛是从哪里来的，凡事一定要多动脑筋，一切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看到豫南农民饱受地主剥削，吃粮都很困难，1948年1月10日，邓政委以刘邓名义签发了《关于节约粮食、爱护民力、维护群众利益、度过春荒的指示》。2月初，再过一天就要过年了，有几个战士为了改善生活，放掉池塘里的水捉鱼吃。大家正在为捉到活蹦乱跳的几百斤鲜鱼欢呼雀跃时，邓政委来了。他表扬了战士们在艰苦条件下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之后，严肃批评道：“池塘的水是群众防旱用的，你们‘竭泽而渔’，贪图眼前，损害了群众利益。”水是不可失而复收了，但事后部队为此向老乡道歉，并赔偿了损失。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动人的故事，还在豫南大地广为流传。

(责任编辑 王 恂)

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

● 李维民

年近九旬的万毅将军，虽因眼疾双目失明，但头脑却非常清楚，记忆力尤其惊人。当我向他谈起想写一篇关于他的访问记时，不料却勾起了近几年一直使他不安的一樁心事。

万老缓缓地说：“写文章我不反对，不过写历史要完全真实，不应该有任何虚构。我没有写书，但是有些书里写到我，有的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人家不了解的，可能还以为我在吹牛呢！”

接着，他举出几个例子。前些年曾在国内刊印的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其中第三册297~298页，5处提到万毅的名字，其实是张冠李戴，把东北军619团团团长高福源写成了万毅。最使万老不安的是，1989年出版的《国防部长浮沉记》一书，当时发行10万册，流传很广。有一天，曾任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总后勤部顾问的王政柱同志，向他谈及书中涉及到他的一些内容，万老听了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从未向该书作者谈过这一段经历，而书中的描写竟是那样绘声绘色，几乎从头到尾都是虚构。书中说，在庐山会议之后召开的继续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万毅担任总参和军委办公厅小组的组长，并说在他“诱导”下，大家纷纷发言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根有据的。万毅宣布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可批的，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最后还写到，万毅对人说，批彭步步升级，轮番轰炸，真是岂有此理。万老说：“也许作者是出于好心，是想表扬我。但这段叙述（有1700字）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在庐山就被点了名，在军委扩大会上是被批判的对象，怎么可能当组长！再说，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已作出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军委扩大会上谁还能公开唱反调。我现在还活着，如果我不更正，说不定后人还以为事实呢！”

为了澄清史实，万老详细叙述了他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亲身经历。

人们通常说的庐山会议，实际上包括两个会议，即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第一个会议开了一个月。前半个月，各小组集中讨论学习形势、任务等19个问题，气氛比较轻松，被人们称为“神仙

会”。本来，万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留在北京，在国防科委处理日常工作。1985年调整后的二机部管核工业，宋任穷是部长。有一天，宋任穷匆匆来到国防科委，告诉万毅，苏联以与美、英等国进行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为由，突然停止了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从而打乱了原来的工作部署，宋任穷很着急。万毅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建议宋任穷直接去庐山，向参加庐山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等首长汇报。因为国防科委还有许多事要做，万毅本不想去庐山，但宋任穷执意要他同去，万毅只好与宋任穷同乘一架飞机飞抵九江，然后换乘汽车上了庐山。他们到庐山的那天是7月15日，他俩先向聂荣臻元帅作了汇报，聂帅又和他们一起到了彭德怀元帅那里，因为7月14日，彭德怀刚刚给毛泽东主席写那封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信，所以在他们谈完工作以后，彭德怀很自然地说起给毛主席写信的事，讲到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万毅听了，认为彭德怀的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并且补充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口号，是唯心主义的嘛！”

万毅在彭德怀那里说的这句话，在庐山会议后期被列为万毅的一条重要罪状，见诸于会议文件。下面引用万毅的发言，也是根据当时的文件，并非仅凭万老本人的回忆。

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一周，并且通知留住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参加讨论。还转告林彪，如果他身体情况允许，也请他一起上山。宋任穷和万毅也被留下来参加会议。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组，组长没有变动，组员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

毛泽东的批示，小组的重新划分，与会人员的增加，预示着会议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但是万毅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参加小组讨论的第一天（7月17日上午），毛泽东的批示和彭德怀的信正好发下来要大家讨论。当时，人们还不理解毛泽东要大家讨论的用意，更没有想到这会演变成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所以在17日至22日的6天讨论中，大多数人赞同彭德怀的一些



万毅将军

看法，许多人还说了不少相似的事例。在第六组中，张国华讲了他爱人回江西探亲时，看到农村中出现的问题；手工业管理局局长邓洁讲了手工业中的一些问题。董必武和聂荣臻在第六组参加讨论，对彭德怀的信也没有提出批评。据万毅记忆，只有一位青海省委书记，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说他们那里的小麦亩产7000多斤。万毅不知道，在毛泽东的批示发出之后，以柯庆施为首的一些“左派”分子，虽然在公开场合讲话不多，但已在积极准备发难了。万毅不是那种善于看风使舵的人。他没有反复推敲毛泽东批示的真正用意，也没有留意已经日益紧张的气氛。

7月22日上午，小组讨论已进入第六天，不好抢先发言的万毅，在小组会上作了第一次发言。他直率地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增产无限论等”，他认为这是搞精神第一性”。他说：“对于重点与一般，注意多快忽视好省。”他还讲到：“没有认真掌握主席久已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抢先思想，比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是作为今后考虑的，但是有的就抢先实行，加上报纸一宣传，就变成较普遍的行动。放‘卫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号的提出慎重考虑不够，如有的说‘粮食基本过

关’，‘放开肚皮吃饭’等。”

在万毅的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他的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

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对于当时已遭到非难的彭德怀的信，他表示“我基本同意彭总的信”。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表态竟酿成他20年坎坷的遭遇。不过，万毅的发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是和他的看法相似，只是表态可能没有那么鲜明。在其他小组，讨论的情况和万毅所在的第六组差不多。黄克诚在第五组，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在第二组，赵尔陆（一机部部长）在第四组，都讲了一些与彭德怀的观点相同的看法。特别是张闻天21日在第二组的长达3小时的发言，系统地阐述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观点最为鲜明，分析最为透彻，阐述最为精辟。就连周恩来总理，当时也以为彭德怀的信“没有什么”，没有料到会引起一场大祸。

然而，就在万毅发言后的第2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早晨，与会人员临时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当人们来到小礼堂时，气氛还和往常一样。但是表情严肃的毛泽东，只讲了几句话，就使人们警觉起来。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他虽然讲到“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但是，很快便把话锋转向另一种倾向。他说：“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对于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小资产阶级狂热有一点，不那么多。……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全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

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毛泽东的这段话，显然是针对彭德怀的信。因为那信中提到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越说越严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他在这里引述的是对敌斗争的原则，而不是对人民内部不同意见采取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毛泽东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富有政治经验的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听到这里，很自然会联想起毛泽东两年前（1957年）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在前一天刚刚表示过基本同意彭德怀信的万毅，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感到十分震惊。而对彭德怀来说更是晴天霹雳。这位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此时真有些坐不住了。散会以后，当万毅走出小礼堂时，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泽东走出小礼堂后，他立刻迎上去，贴近毛泽东，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万毅近在咫尺，对彭总的话听得一清二楚。而林彪恰好站在万毅身旁，手里拉着一棵小树的树枝，从他那木然的表情里，看不出他是漫不经心还是幸灾乐祸。



▲ 万毅将军（左）与本文作者

在个人崇拜盛行、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那个年代，毛泽东的一篇讲话，完全改变了会议的内容和气氛，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彭德怀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万毅因为同意彭德怀的信，很快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23日以后，以批彭为主要内容的小组讨论又持续了一周。

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8月2日接着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47人，列席15人，人数几乎相当于前一个会议的两倍，会场移到庐山人民剧院。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明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二是路线问题，这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他说：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什么事。前半个月是“神仙会”，没有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有些人所以觉得没有自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求有批评总路线的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都做坏了。57年不是有人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嘛？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内分裂。当时还没有明显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把彭德怀的问题上升到分裂党的路线斗争高度。按照这个调子，各小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批判的内容已经不只是彭德怀的那封信，而是向纵深方向延伸开去。一方面是清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另一方面是追查“军事俱乐部”成员和对那些在前段会议期间发表过“错误”言论的人进行揭发、批判。万毅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8月7日的小组会上，万毅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但是在回答他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时，他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他说：“我与彭德怀同志的来往，除工作外，没有单独在年节到他家去过。因谈工作，在他家吃过几次饭。1955年出国代表团我是顾问，朱可夫送他的和平牌收音机，我向他要，他给了我。如果说有物质上的拉拢，也只有这个，但这是我要的。”

在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万毅作为中共中央的一名候补委员，争取到一个发言的机会，想解释一下他在小组会上那个发言。可是他刚讲了几句，那天主持会议的李井泉就打断他的话说：“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

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万毅只好尴尬地坐下了。坐在旁边的薄一波，可能觉得李井泉的话过于生硬，便打圆场说：“万毅同志，回去到军委会上讲吧！”

万老在回顾这段往事时，深有感慨地说：“那时候，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8月16日，八中全会闭幕的那天，通过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时，会上的气氛异常紧张，真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毛主席念完决议后，问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人讲话，也没有让大家举手，就宣布决议通过了。”

八届八中全会8月16日在庐山结束。万毅与彭德怀同乘一架飞机离开庐山，先在济南停了一下，19日回到北京时，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已在前一天开始。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1070人，规模是空前的。各大军区的全部领导（只留一人值班），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军政主要领导都来了；全军师以上单位也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会议传达学习庐山会议以后，把原来的15个小组编成两个规模很大的综合小组。第一综合小组，有170多人（还不包括一些列席人员），光组长、副组长就有14位，负责揭发批判彭德怀。第二综合小组负责揭发批判黄克诚。在举行军委扩大会议的同时，在北京还召开了揭发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湖南省委则开会批判周小舟。

军委扩大会议由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的批判，从庐山会议一直延伸到炮击金门、高饶事件、抗美援朝、保卫延安、百团大战、长征途中……。按照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讲话中定的调子，彭德怀被批成30几年阶级立场没有改变，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投机革命的。而且从国内发展到国外，无中生有地给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

军委扩大会开到9月5日，又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对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4人进行揭发批判。邓华曾接替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有人给大会主席递了条子，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从而成了被批判对象。洪学智是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因为他与彭、黄关系密切，对彭、黄的揭发又很少，也成了批斗对象。当时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则是因为当人揭发黄克诚破坏一、三军团团结，错杀了一个干部时，他站起来证实，枪毙那个干部是根据×××的决定，因此而被扣上包庇黄克诚的罪名。

对万毅的揭发批判，也向纵深发展了。最为可笑的是，有人揭发万毅在西安事变时，把东北军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东北军120师师长赵毅。西安事变时，

万毅还没有入党，怎么会有共产党的名单！当时，赵毅还活着，也完全可以证明此事。

9月11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林彪在会上宣布了撤销万毅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但是，批判并未结束，军委扩大会后，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全体干部和总参、总后等有关单位代表共有220人，参加了批判斗争万毅的大会，持续了25天。最后给他作的结论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相当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

1960年4月13日，万毅被迫离开部队，到陕西省担任建委副主任，不久又改任林业厅副厅长，一去十几年。邓华、洪学智、钟伟也都被撤了职。邓华被贬到四川省任副省长；洪学智被贬到吉林省任机械工业局局长。万毅因彭、黄而受株连，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的一些同志又因万毅而受株连，有的被撤职，有的被迫转业。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无辜的万毅再次遭到迫害，被加上更多的莫须有的罪名。1946年春，吕正操曾根据中央意旨，主持搞了一个由42人署名致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的电报，当时是准备公开发表的。万毅根本不知此事，仅仅因为其中有他的名字，就被扣上企图勾结国民党、恢复东北军的罪名。从1967年11月被监管，1959年他患上的青光眼在被监禁的头4年，不给任何治疗，因而迅速恶化，1969年左眼失去视力，1973年被放出时，右眼的视力也只剩下0.08。1977年党的十一大之后，万毅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看到他的信后，写了：“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的批示。从此，万毅才得到适当安置，同年10月，他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顾问。但是他的冤案直到1979年10月才得彻底平反。1982年9月，万毅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叙述完这一段经历之后，万老深有感触地说：“1959年那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左’的错误继续蔓延，以致造成‘文化大革命’更严重的后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如果我们切实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断加强民主建设，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长治久安，兴旺发达。”

（责任编辑 凌辰）

捍卫真理 矢志不渝

—罗瑞卿从复出到辞世

● 黄 瑶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罗瑞卿从福州赶回北京，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自从1965年11月在上海同毛泽东分别以后，他一直未见到毛泽东。罗瑞卿在解除“监护”后曾给毛泽东写了信，但未获回音，不知毛泽东是否看到了这封信。自从上海一别，如今11年过去，毛泽东已安卧在鲜花丛中，罗瑞卿不禁痛哭失声。

9月18日，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的追悼大会，但在“四人帮”控制下，竟然不通知他参加。经罗瑞卿坚决要求，才同意到广场去参加追悼会。但只给罗瑞卿、谭政、陈再道三个人派了一辆车，陈再道愤慨地说：“他妈的，罗瑞卿一个人就得一台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三个人怎么去？”谭政比较好说话：“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经过斗争，给他们增派了一辆车。下车后，罗瑞卿坐着轮椅，由罗宇推着，穿过中山公园，将轮椅停在广场西北角。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见他待的地方烈日暴晒，便劝他找个阴凉地。他愤慨地说：“连这里也不让我

来啊！还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要我参加追悼会。我对他们讲，你不派车，我自己去，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啊！”

追悼会开始，罗瑞卿在罗宇扶持下，走下轮椅，拄着双拐，坚持肃立。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无论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他这个老卫士，对共产党、对毛泽东一直是赤胆忠心，九死不悔。他的崇高气节犹如嘉陵江两岸的苍松修竹，历经千磨万劫而依然坚韧如初。

毛泽东逝世后27天，“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恶梦终于结束。但是，中国前进的脚步依然十分蹒跚。

在“两个凡是”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罗瑞卿又只担任军委顾问的情况下，他仍然时时不忘揭批林彪和“四人帮”。他采用写信等方式，对一些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力求使读者在思想上划清同林彪、“四人帮”的界限，从而拨正军队建设的航向。

1972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1964年林彪又策动大比武”，罗瑞卿立即给军报

写信，指出：这是“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那篇文章把射击“打鸡蛋壳”和翻墙头也当作“花架子”批，罗瑞卿提出了异议。他说：“前者是为了练习对隐蔽在战壕内之敌的精确射击，后者同我们现在练兵中还在实行的超越障碍也差不了多少”。他认为，江青提出的让部队学习样板戏中的耍大刀，才是花架子。

1977年3月，罗瑞卿出席了中央军委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叶剑英提出，全军要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把部队建设好。他提出，要在全军开展“十个应该不应该”^①的讨论。随后，《解放军报》组织撰写了10篇文章，在当时最迫切需要同林彪、“四人帮”划清界限的10个问题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以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罗瑞卿对这一讨论非常关注。《解放军报》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他都认真阅读。他还亲自写稿参加讨论。5月31日，他在住院期间写信给《解放军报》社长华楠，提出准

^① 十个应该不应该是：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应该不应该搞好战备、准备打仗。

备搞两个短篇，题为《戳穿“四人帮”在民兵问题上的鬼把戏》和《林彪全盘否定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是个阴谋》。随后，他同军报帮他记录整理的记者详谈了自己的构思。在记者按他的想法整理成文后，他又精心修改，然后以“本报记者”名义分别发表于《解放军报》6月17日和7月9日。他还以“一读者”的名义为军报写了《江青破坏学雷锋运动由来已久》一文。这些文章对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起到了指导作用。

在这一期间，他还给许多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向中共中央和军委转信，为平反这些案件而引线搭桥。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罗瑞卿到任时，军队由于在十年浩劫中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问题成堆，百废待兴。当时，“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实事求是的作风遭到背弃，说大话、空话、假话盛行；军队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派性猖獗，内耗严重；有些科研项目被迫取消，拉大了武器研制和装备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机构臃肿，员额膨胀，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废弛，纪律松懈，各类事故层出不穷，部队战斗力下降。1975年，邓小平曾将这种状况概括为“肿、散、骄、惰、奢”，并提出进行整顿，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被冲掉了。

罗瑞卿作为邓小平的助手，一复出便首先抓整顿，并将邓小平所说“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作为军队各项工作的纲。

当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和

“文革”中“左”的错误的影 响，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用以整顿为纲来取而代之，既要有清醒的认识，更需要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

1977年秋季，罗瑞卿负责筹备军委全会，他曾多次对起草文件的工作人员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其实是一根打人的棍子。林彪、‘四人帮’阶级斗争为纲不离口，就是为了打人。”他在向叶剑英、邓小平请示报告后，对《解放军报》社长华楠等说：“军队还是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这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有人如果要挑刺也挑不出来。”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的基石。撼动这块基石，是破除“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从1977年秋天开始，罗瑞卿即围绕整顿，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在思想上，他力主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他大力支持《解放军报》冲破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所设置的只提批右不提批“左”的障碍，主张揭露林彪、“四人帮”极“左”的面目。当他在一份文件中看到提及活跃在“文革”期间的“风派”和“震派”^①人物后，他对起草文件的同志说：“我考虑再加一个，叫‘溜派’，也应该揭露。这种人当年紧跟林彪、‘四人帮’，欠下了不少帐，却装得一贯正确，企图溜之大吉。这种人遇到一定的气候条件，又会兴风作浪，也是一种危险人物。”他建议《解放军报》撰写

专文揭露这三种人。当他看到这些文章后，高兴地说：“这样的文章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得用着。因为在政治斗争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种人。必须提高对他们的鉴别力和抵制力，不让他们败坏党的风气，危害党的事业。”

在作风上，他主持开展了以三查三整（即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整顿“软、懒、散”、整顿官僚主义和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整党整风运动。

在组织上，他积极批转信件，主持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同时清查了“三种人”。随后调整了领导班子。但是，他却从未提出给自己平反的要求。当夫人郝治平问他时，他说：“不要急。党有难处。我们不能给党增加困难。”他感到，让他出来工作就行了。

在军事工作上，他主持战略委员会，重新分析研究了国际形势，调整了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

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上，他对军委决定的重点抓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的研制组织大力协调，同时抓紧常规武器装备的改进，以逐步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在基层工作上，他强调从严训练和管理，恢复和发扬光荣传统，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正规秩序，减少和消灭各类事故。为了推动部队建设，他十分注意运用先进典型。在他的倡议下，航一师、硬骨头六连、神枪手四连等单位都受到了表彰。

罗瑞卿在开展这一系列工作时，曾经遇到相当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主张维持“文革”后形成的使国家面临经济崩溃边缘

^① 风派：指“文革”中看风驶舵、投靠林彪、江青一伙的人物。震派：指受江青指使，在各单位闹“地震”的人物。

的万马齐喑局面的人。“两个凡是”就是这种主张的概括。显然，要使党、国家和军队迈开前进的步伐，必须破除“两个凡是”的禁锢。

早在提出“两个凡是”的社论发表之初，邓小平便直率地对此提出了批评。他在5月24日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当时正在住院的罗瑞卿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观点。他向华楠等人详细询问了这一社论发表的前后经过，然后对华楠说：“对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要坚持科学的态度，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小平同志强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决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到处搬用，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首先是对我们党的学风的破坏。”1977年8月，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精通目的在运用，背诵词句等白费。实事求是方本色，万勿空喊最最最。”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不显著的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1000多字的思想评论。罗瑞卿立即发现了此文的重要意义。他把军报负责人找去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也很重要。”罗瑞卿要求军报注意宣传这一观点。

1978年5月10日，经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

审阅定稿，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光明日报》供稿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此文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报纷纷转载。此文立即在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能否从“文革”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迈开前进步伐的思想大讨论，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此文发表后，有的人反对。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罗瑞卿则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篇文章。他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又说：“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

就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引起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时候，在军队内又出了一件从表面上看与此次讨论无关而实际却有着密切联系的事情。4月12日，当时的海军主要领导人向华国锋汇报工作，华提出，要在访问朝鲜回国后，到大连看望海军。海军主要领导人准备调集大量舰艇北上旅顺参加检阅，但未向军委报告。

4月13日，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向萧劲光报告，萧指示：“这样大的事情，要正式报告军委，你要亲自去向军委和罗秘书长报告。”

17日，正在301医院试用假腿的罗瑞卿接见了杨国宇，在听了杨的报告后，罗向杨提出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

么样的影响？二、既然12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杨国宇向罗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因。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杨国宇走后，罗瑞卿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表明自己不同意这一行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罗的意见。在邓小平支持下，此事终于被制止。

后来，到1979年7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再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以后，也谈及此事。他说：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海军大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很好。罗瑞卿同志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制止。

此事处理完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在党内仍相持不下。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这一番话显然是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中肯的批评。然而，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

仍然不肯接受。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仍然批评《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推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如果翻了就是反毛主席。

此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正在撰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此文是专为反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而作。显然，经过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那么一讲，此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乃至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都不可能发表了。吴江等想到，《解放军报》曾向他们约稿，便决定将此文送给《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社打好清样后，立即送给罗瑞卿。罗瑞卿读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他不仅具体指导，而且直接参与文章的修改。他亲自查阅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重读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华楠、姚远方等人去同吴江商量，建议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此文进行全面修改后，他再次审阅，并亲自动笔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修改期间，他就如何改好这篇文章的问题同胡耀邦通过6次电话，同《解放军报》社通了5次电话。

文章基本定稿之后，罗瑞卿又第三次进行审改。这时华楠决定随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华楠出国前，罗瑞卿又给他打电话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

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6月2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罗瑞卿主持修改、定稿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

这篇文章一发，天平便迅速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一方倾斜。尽管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有的还不承认错误，但大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尽管罗瑞卿未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盛会的胜利召开，但是，他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迸发出的光辉，就象那照亮长空的夕阳，喷吐出满天绚烂的晚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罗瑞卿复出仅仅过了11个月。这是异常紧张的11个月，他每天工作时间之长、工作量之大都是十分惊人的。他虽然身残年迈，但壮心不已。他一复出就又同“文革”以前一样，进入了不分上班下班，没有白天黑夜的状态。他的家庭从他出狱以后形成的短暂的平静不复存在，一切都围绕着他而快节奏地运转。秘书来不及调来，曾患癌症动过手术的郝治平也上了阵。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断，来访的客人一批接着一批。他平时需坐轮椅，行动不便。为了节省时间，他工作时便不喝水，以减少去盥洗室的次数，午休时，他连假肢也不摘，便和衣躺着休息一会。他生病住院，病房便成为办公

室。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总参作战部长谭旌桥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几乎每天深夜12点左右都要接到他打来的询问情况和交换意见的电话。《解放军报》的夜班编辑下班后，也习惯性地要等到报社领导传来他的指示后才去休息。战友和亲属担心他累坏身体，劝他放慢工作节奏，他却说：“《水浒》中有个拚命三郎。我们今天就是要当这个拚命三郎。”他还常常说：“我今年72岁，要当27岁过。”面对国家、军队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想赶快干，趁自己头脑仍然清楚，精力还算充沛的时候，多干工作，以追回他因受迫害而失去的10余年时间，弥补国家和军队在十年动乱中所遭受的损失。

罗瑞卿常常说：“做领导工作光坐办公室批阅文件、听汇报，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是危险的。”“文革”前，为了视察陆海军边防，他的足迹遍及除西藏外的沿海和边疆各省。他到过许多国防工程所在地和工厂。复出以后，他在短短一年内视察过京郊、天津、徐州等地的国防工事和部队。有的地方坑道太窄，轮椅难以通过，他便拄着手杖走。一些领导同志出于对他的关怀，便告诉部队，以后罗秘书长到什么地方，汽车、轮椅通不过时，就组织人抬。而这反而使罗瑞卿感到于心不安。他不愿意麻烦人，渴望着走出轮椅，扔掉手杖，大干一场。

1977年，党组织请了两位西德专家来给罗瑞卿安装一个更轻、质量更好的义肢。这两位医生告诉他，可以安装人造股骨，从而改善左腿功能。罗瑞卿怦然心动。

1978年3月，郝治平检查身体时，被发现肺部有一处阴影。连续观察，未好转。3月13日动手术切除了一叶肺，证实是原患乳腺癌转



罗瑞卿（中右）和谭政（中左）视察装甲兵部队（1977年）

移到肺部。罗瑞卿听了这一消息忧心如焚。他对孩子说：“我不能就这个样子。我要出国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照顾她，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

随后，罗瑞卿请出访西德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驻西德大使张彤，协助了解西德做安装义肢手术的情况，搜集一些有关资料。4月间，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写报告，准备去西德治腿，中央同意。5月中旬，301医院将罗瑞卿病情材料及左下肢、股骨头伤残部位X光照片，交信使送到我国驻西德大使馆，由他们同西德方面交涉。6月，去西德治腿事已定，并开始着手筹备。

7月初一个上午，罗瑞卿在西山办公的地方接见了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和民航局长沈图。当他们来

到时，罗瑞卿坐在轮椅里带着歉意说：“我不能站立起来迎接你们了。”

他们互致问候后，罗瑞卿说：“中央批准我去西德治病，要坐民航飞机去。”他边说边将中央批准的报告递给张廷发。张廷发看了一下又交给沈图。“没有腿真不方便。”罗瑞卿等沈图看完，一面轻轻抚着残腿，一面说，“不要说下去调查研究，就是生活自理也困难。”他露出一丝苦笑，“这次中央为我出国治病，作了十分仔细的安排，国家又为我花这么多钱，我心里过意不去……”

这件事张廷发可能早已知道，未说什么。沈图是头一次听说，不禁问道：“有把握吗？”

“王炳南和钱信忠同志都做过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残疾人很多，安装义肢恢复行走功能的也很多。在这方面，他们的医疗

技术和经验都是一流的。我的病历已经寄去了，他们的答复是做这样的手术没有问题。”

为了安全到达波恩，张廷发、沈图又向罗卿汇报，使用波音—2408号飞机，15日在北京西郊机场起飞，走经乌鲁木齐、布加勒斯特的航线。

7月15日晨，沈图了解到北京至乌鲁木齐航线完全适航。8时许，罗瑞卿夫妇及随行人员和医疗小组，到达专机停机坪，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等也到达。在飞机扶梯前等候的机长向坐在轮椅上的罗瑞卿敬礼，并向罗瑞卿夫妇一一介绍了机组人员。罗瑞卿夫妇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起飞前，罗瑞卿的小孙子和小外孙一直在罗瑞卿膝盖上坐着，同爷爷、外公又说又笑。

预定起飞的时间9点钟快到

了。送行的人都劝罗瑞卿上飞机。罗瑞卿摇摇头，他要等王震。

“爸爸，走吧，不要等了。”他的女儿劝说道。

“王胡子说来送我，他一定来。我要见到他再走。”

正说着，王震到，他一下车就快步走到罗瑞卿面前，一面同他紧紧握手，一面说话。在场的人无不在这两位老将军的亲密情谊而感动。

飞机要起飞了。罗瑞卿吻别了他的孙子和小外孙，举着双手对送行的人说：“再见了！等我回来时，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和你们一样站起来走路！我还要到全国各地走走，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送行的人都热烈鼓掌。

9点57分，飞机起飞。郝治平坐在背对飞行方向的椅子上，坐在对面的罗瑞卿猛然想起郝治平有晕车、晕飞机的毛病，便要同她换座位，郝治平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我能坚持。”罗瑞卿摇摇头，然后站起身来艰难地扶着桌子往郝治平这边走，郝治平忙站起身把他扶过来，然后坐到对面去。

郝治平看着对面而坐的、已是白发苍苍的罗瑞卿，不由得想起一件件往事。她想起了新婚之夜那一碗鸡汤，想起了反“扫荡”中他盖在孩子木筐上的那块油布，也想起了他在天安门上给孩子带来的那把糖果……她想：在革命斗争中他意志如钢，可对待家人，又是柔情似水啊！

飞机于当日13点30分钟在乌鲁木齐降落，新疆军区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到机场迎接。

当晚，新疆军区负责人请罗瑞卿看秦腔影片《火焰驹》。这部电影写奸臣王强诬告边关武将李彦荣投敌，其弟彦贵被逐出汴梁，在丫环芸香帮助下，与未婚妻黄桂英相

见。被撕毁婚约的岳父黄璋发现后，派人杀死芸香，嫁祸于彦贵，彦贵被判死刑。即将问斩时，李彦荣赶到刑场，救了弟弟，彦贵与桂英结婚，结局是大团圆。经历了被林彪迫害、蒙冤七载余的罗瑞卿，对这一出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戏很感兴趣。看戏时，他猛然想起文化部长黄镇曾问他，《穆桂英大战洪州》这出戏还能不能演。他当时感到没有把握未回答。看完戏后他立即打电话给黄镇，向他推荐此戏，并告诉他，《穆桂英大战洪州》亦可上演。

7月17日，罗瑞卿夫妇继续在乌鲁木齐休息。罗瑞卿同张爱萍通话，告诉他，治好腿有99%的把握。他说：“现在我还坐轮椅。等我回来就可以扔掉拐杖了。”

7月18日8时，罗瑞卿一行10人、驻西德大使馆武官林干及机组13人，乘B2408号飞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16时13分在布加勒斯特加油，19点40分到达波恩。驻西德大使张彤和文化参赞齐怀远到机场迎接。

在波恩，罗瑞卿夫妇受刘伯承夫人汪荣华之托，为刘伯承买了一箱药。然后亲笔给杨勇副总长写了一封信，托返回北京的专机带回。当机组人员向罗瑞卿夫妇告别时，机长林长福代表机组全体人员对罗瑞卿说：“我们等待首长的好消息，到时候我还来接您回去。”罗瑞卿爽朗地说：“好，我们一言为定，你们送我来，再接我回去。”

到波恩不久，罗瑞卿住进了距波恩200余公里的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7月29日，经内外科检查，情况良好，决定8月2日动手术。

7月31日，郝治平在张彤大使陪同下，坐汽车到医院看望罗瑞卿，并让他给家里写几个字。罗瑞卿写道：

儿女们、媳妇们，并两个小孙孙：

妈妈和我身体都好。只是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总有些感到不惯。再加上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我们虽接触不多，但也看到一些等级森严，也感到有些看不惯。好在这里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大自然也多少给了我们远离祖国，并且有些想家的人以安慰。

……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动手术了。据观察可能如愿以偿。虽然要冒点风险，但大致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们放心！

这里的我国大使及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的阶级情谊实在使人感动。

医院里的教授专家们，因为我们大使馆的工作做得好，虽然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但就医疗这一点，他们是全力以赴的。

其余由妈妈写。亲你们，亲我们两个小孙孙。

这封信，罗瑞卿就写到这里了，但谁也料不到这竟是他的绝笔。

下面由郝治平接着写道：

今天我从大使馆到医院看爸爸。（两百多公里，汽车走2点30分）要他写几个字给你们。他一写就是一大篇。爸爸现在一切情况都正常。有的比在国内还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里少，也容易些。可能这里气候好有关系。医生经过各方面检查后说，比他们原来想的要好。2日决定动手术。爸爸和妈妈都有信心。因为教授、医生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但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治好。大使馆的同志都对我们很好，你们也放心好了。一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住几天。这样看护爸爸方便些。等动完手术后妈妈再写信给你

们。

……

祝你们进步、健康！等候爸爸的好消息！

爸爸、妈妈

1978年7月31日

8月1日，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在张彤大使陪同下，去医院看望罗瑞卿，同罗瑞卿在病房合了影。郝治平待得很晚还不想走。罗瑞卿对她说：“走吧，走吧，你回去休息吧，我已经服了睡前的药，明天就作手术。你放心，一切都会好的。”说完，他微笑着摆着手，目送着郝治平出门。这就罗瑞卿给郝治平留下的最后的印象。

8月2日上午，医生给罗瑞卿动了手术。中午，从手术室传来消息，手术成功。守候在室外的郝治平激动得掩面痛哭。但因怕感染，医院未让郝治平看望。傍晚，又传来消息，罗瑞卿已苏醒过来，还用英语对给他做手术的医生说：“Good evening, Thank You!”

看来一切顺利。经劝说，郝治平回旅馆休息。她刚躺下，突然听到了不祥的电话铃声，接着便有人敲门。等她赶到医院，罗瑞卿已因突发心肌梗塞而与世长辞，时间是凌晨2时40分，北京时间为上午9时40分。

罗瑞卿这一生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且不说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也不说他在解放战争年代，既经历过翻车的车祸，也经历过在高空飞机突然出事。他这一生中觉得必死无疑的大难，就经历过3次。每一次他都从死神手中挣脱了出来。然而，到了1978年8月3日，正当党和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正当他的亲人为他的手术成功而庆幸的时候，他却突然离去。同志们万万

惋惜、亲人们悲痛欲绝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

噩耗传来，举国震惊。邓小平扼腕长叹：“太不幸了！太不幸了！”从老将军杨勇、杨得志、张爱萍、萧华到部队文工团的一些著名演员，从抗大的学员、野政的干事到解放军广大官兵，从公安战线的领导人到国防科工委科学家，大家纷纷写文作诗，悼念这位可亲可敬的罗大将。

8月5日，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柩迎回北京。这一天，西郊机场细雨蒙蒙，似乎苍天也在落泪。许多白发苍苍老将军、老干部都冒雨仰望着天空，等待着运送罗瑞卿遗体的专机到来。当专机破云而出，徐徐降落时，许多人已泣不成声。解放军战士将他的灵柩缓缓抬下飞机。在杨勇等的扶持下，已经长眠的罗瑞卿大将的灵柩被送上灵车。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悲痛地握着郝治平的手，劝她节哀保重。1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罗瑞卿追悼大会。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为他致哀。在追悼会上，邓小平致了悼词。他说：

罗瑞卿同志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罗瑞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维护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革命学风，对林彪的所谓“顶峰”、“最高最活”等假左真右的货色进行抵制和斗争。他坚决保卫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对林彪结党营私、分裂党和军队的阴谋诡计，深恶痛绝。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和技术的辩证统一，积极

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倡导和组织全军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同林彪制造军政对立、取消军事技术训练、破坏战备等罪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罗瑞卿同志对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的领导人非常崇敬和热爱。他具有光明磊落、刚直不屈、明辨是非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因而，林彪把他视为篡党窃国的障碍，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捏造罪名，加以诬陷，使罗瑞卿同志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这是林彪、“四人帮”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林彪、“四人帮”加给罗瑞卿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和种种迫害，恰恰从反面证明了罗瑞卿同志是正确的，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罗瑞卿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罗瑞卿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沉痛悼念罗瑞卿同志，要学习他对党忠诚，无私无畏，政治敏锐，忘我工作的高贵品质；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对敌狠，对己和，不怕鬼，不信邪，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力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善于接受新事物，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学习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讲求效率，勇于负责，处事果断，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干部的工作作风……

罗瑞卿同志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 王 恂）

“为人民服务”光照千秋

——追忆毛主席得知张思德牺牲后

● 曾加顺

半个世纪前的9月5日，是张思德同志牺牲的日子。这位普通战士的死，却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度悲痛，他亲自部署张思德追悼会，现场发表了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随后，“为人民服务”被概括为我党我军的唯一宗旨，明确地写进了党的七大报告。这位普通一兵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宗旨的形成涂写了光彩的一笔；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托出了跨时代的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影响着代代后来人。

参加过张思德追悼大会的老首长、老同志，一缕缕珍贵的追忆历历在目，道不尽延安宝塔下那鲜为人知的历史，述不尽毛主席那平凡而伟大的感人丰彩。……

哪里艰苦到哪里去。张思德是毛主席警卫员，他带头去安塞山烧炭

古远兴，是位戎马生涯的老红军，负责过那些指挥千军万马的领袖们的安全工作。他当年担任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队长，是张思德牺牲前的直接领导。他激动地追忆着那段不寻常的历史——

1943年3月，中央警备团组建直属警卫队、骑兵连、宣传队。其中，警卫队直接负责毛泽东主席的警卫工作，当时也称毛主席卫队。这个队共有25人，张思德等6人是直接从团直属手枪连调来的。我担任警卫队队长，受李克农、叶子龙和吴烈同志的直接领导。警卫队共分为一班和二班，张思德分在一班，负责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张思德这个人个头很高，平时不爱多说话，工作积极，服从领导，表现很出色。他把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项项具体工作，都和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天上岗，总要多站一个时辰。每天一起床，他轻手轻脚地把毛主席窑洞前的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主席经常走的土路上，有一点坑坑洼洼，他

就铲来黄土，把它垫平、踏实。主席外出开会，张思德总是把冲锋枪和马灯擦得锃亮，提上水壶，早早地等候在车子旁。

1944年，中央准备于次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从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相隔17年之久的、规模空前盛大的一次党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700多人。为了给代表们及当时参加整风运动的同志准备防寒烤火用炭，同时也为了解决中央领导同志的取暖问题，中央办公厅决定，组织人员到安塞山中烧炭。我们警卫队也抽调3名同志参加。张思德服从组织分配，他和石仓，王玉森同志一起，从毛主席身边走上了挖窑烧炭的新岗位。

炭窑崩塌时，张思德把生的希望让给了战友

人民解放军某政治部原副主任杜泽洲同志，长征途中曾和张思德同志在一个连，后到延安又一起被编入中央警备团；狄福才同志是人民解放军某部原政委，与张思德同志是同班战友。追忆起张思德当年牺牲的情况时，他们记忆犹新——

安塞山离延安有十多里，到那里烧炭也是很苦的。中央机关和警卫队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张思德担任小分队副队长。1944年9月5日，队长和张思德商量后，决定临时组织个突击队，进石峡峪赶挖几个新的炭窑，又具体分了组，张思德和战友小白一组。这一天，两人干得热火朝天。窑越挖越深了，但里面一直不能直起腰来。张思德钻在里面，猫着腰，累得满头大汗。留在外面清土的小白一再要求他出来休息一会，他都不答应，直到里面能容纳下两个人，张思德才同意小白下去。快到中午时分，炭窑将要挖成的时候，突然，窑顶上“啪啪”掉下几片碎土。张思德发现情况不好，大喊一



张思德同志正在安塞山中烧炭（左为张思德）

声“快出去，有危险！”没等小白领悟过来，他一把将小白推到窗口。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由于山坡土质松散，两米多厚的窑顶塌了下来。小白的生命得救了，而张思德却被埋在了里面。在危急关头，他把生的希望无私地让给了战友，而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他是四川仪陇人，1916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负过伤，立过功。他以自己的光辉行动，实践了“为革命，为人民，要敢于献出一切”的誓言，用火红的青春谱写了壮丽的诗篇。

警卫队队长古远兴向毛主席报告了张思德同志牺牲的消息后，毛主席悲痛地站起来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办法的，后方生产劳动死人是应该的！”

道出毛主席对张思德的牺牲为什么极度重视这一史实，长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古远兴同志沉思片刻后，动情地回想起当年的情景——

考虑到张思德是毛主席的警卫员，我就直接把这

件事报告了毛主席。我来到毛主席办公室，见主席正聚精会神地伏案批阅文件，就在门内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不得不鼓起勇气沉痛地说：“报告主席，张思德牺牲了。”并把牺牲经过向主席讲了一遍。主席惊讶地放下手中的笔，双手按着桌子站起来，心里很难过，沉默良久后对我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办法的，后方生产劳动死人是应该的！”说完，主席又沉默了，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着。我一听主席说这话，知道主席是在批评我工作不周密，对张思德的死应负有责任。毛主席走到窗前，停住了步子，透过窗子望着安塞山所在方向，接着问我：“这事你向上级报告了吗？”我说：“没有，我想直接报告主席就行了。”主席说：“这不行，你要向你的上级报告，什么时候开追悼会告诉我，我参加。”于是，我就把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向中央社会部负责人李克农和警备团团长吴烈同志报告了。

主席为啥对张思德这个战士的死那样重视？主要原因是，主席这个人很关心战士，爱护战士。主席那样忙，那样操心，还想到警卫战士的生活，请教员教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当时的警卫队有20多名队员，都是从部队挑选来的优秀骨干，主席很关心他们的成长。无数革命先烈，在硝烟战火中，在雪山、沼泽、大草地上，永远地倒下了！对于他们的死，主席心疼，但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那些不必要的牺牲，主席却不能容忍。他从内心深处热爱着自己的每一个士兵，把他们视为革命的火种，有了他们，革命的烈火才成燎原之势。主席听说张思德牺牲了，心里很是悲痛的。毛主席亲手缔造了人民军队，在这个军队里，官爱兵，兵爱官，官兵平等，这是我们军队的性质决定的，是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

在毛主席办公室，主席来回踱着步子，半晌不说话，他是在想张思德安葬的事。这时，毛主席问我，张思德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还被压在窑里。主席听了很生气，他双手背在身后，对我说：“要很快挖出来。要放哨看好，山中狼多，不要被狼吃了，要是被狼吃了，你队长就当不成了！”我回答说：“是！”我知道，主席是在批评我太不关心战士，因为我打算把张思德刨出来就安葬在那里算了。主席严厉地说：“不行！”他还亲自部署了张思德的追悼会，掰着指头明确地指示说：“一、给张思德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二、搞口好棺材；三、要开追悼会，我去讲话。”我的眼睛当时就

潮湿了。毛主席身居要位，运筹着中国革命的每一步发展，繁忙的工作中，他却为着一个战士的死，做了如此具体而细致的考虑，这是只有忠实地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同甘共苦共命运的革命领袖才能具备的品格。

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并亲手题写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吴烈同志是原中央警备团第一任团长兼政委，是张思德的老首长。当年，他亲自主持了张思德的追悼会，回忆起在延安枣园操场上开追悼会时毛主席发表演讲的情景，他禁不住热泪盈眶——

张思德同志牺牲后，全团同志都很悲痛，战士们主动到山上采集野花，编成花圈，寄托对烈士的哀思。按照主席的指示，警备团将张思德擦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新衣服，又买了一口好棺材。毛主席在追悼会的前天晚上，透过延安窑洞的灯火，挥毫泼墨，亲笔为追悼大会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寄托自己对这位普通战士的无限哀思。

1944年9月8日，陕北初秋的天空一片灰蒙蒙。在延安凤凰山脚下枣园沟口的操场上，张思德同志追悼大会庄严肃穆。会场的土台搭起了棚布，台前挂着“追悼张思德同志”的横幅，周围放满了花圈和战士们采来的一束束山花。在一面鲜红的党旗下，悬挂着张思德同志遗像。在遗像的旁边，挂着毛主席题写的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下午一点多钟，参加追悼会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共1000多人刚刚到齐，毛主席就从枣园的住所里面缓缓走了出来。主席问我参加追悼会的共有多少人，哪些单位来了，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主席点了点头。这天，主席的脚步比往日缓慢而沉重，和蔼的面容显得严肃而庄重，那身青粗布衣服补了好些补丁，穿得褪了色，但看上去却整齐而干净。毛主席默默地走进了会场，会场被一片沉痛的气氛笼罩着。追悼会由我主持，宣布向烈士默哀后，毛主席亲自抬着他题字的花圈放到了张思德同志遗像前，默哀了许久，很多同志此刻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随后，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张廷禄同志致悼词，对张思德同志的生平及主要事迹详细进行了介绍。张主任致悼词后，毛主席走到台前，他没有发言稿，完全

是早已酝酿在心的讲话。主席站在一个土墩上，打着手势，一开口就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毛主席的话语有力而深沉，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接着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说到这里，毛主席把手臂向空中一挥，气势磅礴地讲：“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毛主席的演讲声音宏亮，字字千钧，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大家被这时代的最强音激励着，鼓舞着，周身热血奔涌，充满了力量和信心。

追悼大会后的9月21日，延安的报纸就登了这个消息。在延安各界，在各解放区战场，在全国，在全世界，毛主席在张思德追悼大会上发表的《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演讲，迅速传开，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张思德同志的崇高形象，随同毛主席《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著作，象一座光彩夺目的丰碑，永远耸立在人民的心中。

张思德被安葬在延安的枣园，后来又移葬到王家坪烈士陵园。

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指战员，集会于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的北京卫戍区某部张思德铜像前，仍为毛泽东亲自参加张思德这位普通士兵的追悼会而感奋不已，为毛泽东那篇经久不衰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而拍手称绝。他们惊叹：这恐怕在世界政坛要人中也是十分罕见……

（责任编辑 焕 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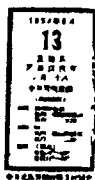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内容提要

麻城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福建海尾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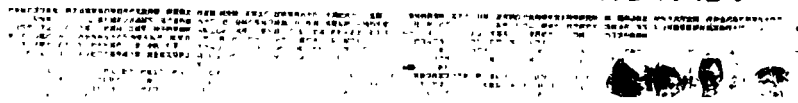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社编委会编
社址：北京前门大街2号
电话：251141
电挂：2135
零售每份五分



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福建海尾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纪录



图虚名招实祸的 “天下第一田”

● 章跃兵

1.016亩水田创下了亩产早稻干谷36956斤的世界纪录，这是真的吗？《人民日报》曾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专题报道了这件事（见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前苏联《真理报》也登载了介绍此事的文章照片。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及朝鲜政府副总理等贵宾曾亲临现场，并给予高度评价。然而，无情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席卷全国的浮夸风中的一场闹剧。当时在全国，它曾被许许多多受蒙骗的人广为传播，也曾被许许多多明知是假的人津津乐道。为什么这样一场闹剧能层层被区、县、地、省领导机关通过，并堂而皇之地登中央党报

头版头条？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走访了原麻城县白果区麻溪河乡建国第一高级农业合作社（现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龚家埠村）的部分干部和群众。

一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是“敢想敢干”的年代。当时只有31岁的原中共麻城县白果区委宣传委员王乾成，受组织重托，来到原白果区麻溪河乡建国第一高级农业合作社任社主任，以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王乾成是194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1957年被评为黄冈专区劳动模范，同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作为新中国的优秀

农民代表，慰问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初到建国一社，他一心只想认认真真地工作，把农业合作社的生产一步一步地搞上去。年初，根据头年本社上报亩产稻谷1002斤（两季）的情况，他表态：“去年亩产千斤谷，今年争取一千五。变过去的全社每年吃国家供应粮32万斤为今年卖国家余粮30万斤。”（见《麻城报》1958年1月1日）当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能放出亩产稻谷36956斤的大“卫星”。

二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逐步展开，浮夸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抬头。1958年6月16日，报纸报道

了湖北谷城县沈湾乡星光社亩产小麦4353斤的消息；6月18日，报纸报道了河南双楼社亩产小麦4412斤的消息，并配发了《“报高产，天外更有天”》的社论；7月25日，《麻城报》报道了本县黄市乡前进五社早稻亩产5665.62斤的事迹；8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早稻亩产15361斤的消息，各级报纸都相继开辟了万斤高产榜。真是锣鼓越敲越响，风声越来越紧，一切有创新精神的人都再也坐不住了。

8月3日，中共麻城县委书记处一位书记，在白果区主持召开全区早稻生产现场报喜表彰会，表彰了梁家畈乡燎原四社的早稻亩产10237.127斤，当场颁发奖旗一面，奖金300元。此情此景，直令王乾成眼热心跳。正在这时，当时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曾是王乾成人伍介绍人的领导，直接点了王乾成的名：“乾成呀，人家早稻亩产都搞到了五万多斤，你还是区委下放的干部，能不能拿点硬东西出来呀？”王乾成鼓了鼓勇气答道：“我们有点硬东西，过几天再向领导汇报。”

三

其实，建国一社能有什么硬东西拿出来呢？这一点，王乾成自己心里很清楚。当时，当地一亩早稻单产不过600来斤，打个灯笼戴副眼镜寻找，顶多寻块亩产千斤的田，再虚报也翻不了10倍的产量过万斤呀！但当着那么多老领导和兄弟社的面，自己能服这个软吗？

当天夜里，王乾成无精打彩地回到社里，找来社会会计罗文存，讲了当天开会的情况，叹了几遍自己社里亩产稻谷超不过梁家畈的苦处。比王乾成小了几岁罗文存问：“梁家畈亩产稻谷一万多斤？说得

鬼都不信！你到过现场，看他们是怎么搞的？”王回答说：“哪个说他们是真能亩产一万多斤，说真话，我看到他们是把别处成熟的稻谷扯起来，都放到那一块田里密挨密地摆起来的。”罗文存一听乐了：“这还不好搞，他们能挪谷禾，我们未必不能挪？他们搞个一万斤，我们也来搞个一万五千斤，超过他。”王乾成一听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转念一想，他又为难起来：“这办法好是好，时间这么紧，找哪个队搞好呢？”正说着，第二生产队队长罗学江来了，罗文存把这件事跟他一说，他满口答应由他们生产队搞。

时间不等人，早稻成熟就要收割了，县委也在等着他们的“硬东西”。王乾成马上召集社委会，统一了思想，迅速布置罗学江他们连夜突击挪稻禾。第二生产队所在的河北垵有400多人，分为4个生产队。光靠第二生产队，田不集中，劳力不够用，社委会决定四个生产队一起上。真是人多力量大，当天夜里，他们用手扯，用门板抬，硬是将七、八亩稻田已成熟的稻谷全部连兜扯起，移到一块1.016亩的水田里，密匝匝地排列起来。

四

8月4日一早，王乾成急忙用电话向县委领导作了早稻亩产的汇报。县委书记处那位书记听了汇报后，8月5日亲自赶到建国一社田头检查，当场叫人拿来一个鸡蛋，放在大田谷穗上一滚，鸡蛋在谷穗上滚了一尺多远，仍稳稳地摆在谷穗上。这位书记满意地笑了，讲了很多鼓励的话。后来，这位细心的书记又问王乾成：“你们放了一万五千斤这么个‘卫星’，马上参观学习的人很多，你们介绍经验

一定要讲清楚讲好。哎，我问你们，这么多稻谷挤在一起，你们通风问题是怎么搞的，通风搞不好，谷子可是要捂烂的哟。”王乾成随口答道：“稻谷不通风，我们用竹篱捅。”县委领导忍俊不禁，说：“这样不行，赶快到县里去借台鼓风机来暂时用一用。”王乾成连忙派人拿着领导写的条子，到县城借来一台当时还十分罕见的鼓风机，用社里的一台8匹马力柴油机带着，日夜不停地鼓起风来。

8月5日，县委领导上午刚走，下午，县城就来了一队又一队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参观队伍，四乡八畈都震动了，男男女女的人群在建国一社川流不息。

8月8日，已成熟的稻谷再也不能等了，经请示县委批准，他们开始收割。收割这天，为慎重起见，由省、地、县三级领导同志组成的早稻高产验收团亲自到场参加丈田，过秤验收。参加验收的领导有湖北省人委副秘书长、黄冈地委第一书记、麻城县委书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领导和专家，还有武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现场摄影，新华社记者现场报道。

8月11日，这块田收割、打场、晾晒完毕，连夜过秤入库，社里特意买了两盏大汽灯点在稻场上。尽管一亩田里摆了七、八亩田的谷，但也不过四、五千斤干谷，为了凑数，社里偷偷将别的稻场上的谷调了一部分过来。称秤时，一杆秤不够用，共用了十几杆秤，省、地、县验收团的干部称，当地生产队的干部、社员也称。验收团的干部称累了，干脆懒得称，半箩筐谷估重60斤。当地干部、社员看了，胆子更大起来，一箩筐谷干脆报二、三次秤，三、四次秤。这样一夜下来，这1.016亩田竟产出干谷37547斤，折合亩产36956斤，真是一举成名

天下惊啦！

五

36956斤单产，真是前无古人（还不敢说后来者）。很快，县、地、省、中央四级党报作了重点报道。前苏联《真理报》还转载了该社一幅四个小孩站在早稻田里谷穗上跳跃的照片。王乾成、建国一社乃至整个麻城县，一夜之间名扬全国，名扬世界，出尽了风头。原来只指望搞个15000斤，超过梁家畈乡，在本县出出风头，没想到竟风光到了全国，这是王乾成所始料不及的。高兴之余，他有些后怕起来：这样的弥天大谎，一旦被揭穿追究起来，谁个承受得了？一连几天，他称病躲了起来，社里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小组，由社委副主任冯福炳每天出面接待，介绍经验。

36956斤出笼后不久，建国一社先后接待了各地参观访问者10多万人次。其中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朝鲜政府副总理李周渊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前苏联、东德、波兰、捷克、越南等国家的专家学者。

为了接待好中外来宾，做到了不漏破绽，建国一社的社委们对这块田的面积进行了精确丈量，几分几厘几毫都算准确了，他们请教了农业专家，算出这一亩多田里的谷穗是768万穗。同时，社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统一扯谎的口径，谁敢乱说打谁的“右派”，吃不了兜着走。

在那种环境，那种年代，参观的人一部分根本不相信，但不敢提出异议，一部分人将信将疑。当时，湖北省直机关和武汉市直机关曾有一个参观团前来参观学习，一位青年干部提问：“你们这么密的稻禾是怎么通风的？”答曰：“先用竹篙捅，后用鼓风机。”问：“苗长得

这么密，需要大量养份，你们是怎么下肥的？”答曰：“在水田四周开沟，用管子往田里灌水肥。”这位青年干部还是不信，跑到留下专供参观的二分多高产稻田边，随手提起几蔸连根都没有扎住的稻禾说：“这样也能生长吗？”作介绍的社委尴尬地笑了。参观团带队领导忍无可忍，当场喝令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拖到垅子边的竹园里，狠狠地开了一通现场批斗会，给他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六

建国一社出了名，王乾成更出了名。当年8月，他就被提拔为白果区区委副书记、区长，还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先有了早稻亩产五千多斤，就有了之后的五万多斤、一万五千多斤；有了三万六千多斤，还会不会有更高的产量呢？8月中旬，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视察建国一社时鼓励该社社员：“争取明年大面积水稻单产一万斤，高产五万斤”（见《麻城报》1958.8.15一版）。结果，等不到明年，当年8月下旬，麻城县明山乡第一农业合作社妇女主任姜延怀等3人，就创造了亩产中稻4.3万斤的新纪录；8月28日，该县建新六社一亩多中稻报出了亩产52599斤；9月17日，《麻城报》报道了易家大垅乡高潮三社亩产中稻10万斤的最新纪录，报纸同时还配发了题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的社论。也许是麻城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中央和省级报刊不再奉陪麻城往下吹。结果，以后的4万多、5万多、10万多的产量再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建国一社的亩产3.6

万斤也就登峰造极，有幸成了名闻于世的不朽经典之作，真正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来者。

七

建国一社很是风光了一阵，王乾成也很是风光了一阵。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三年自然灾害临头，建国一社先是按谎报的产量超卖了大量粮食，接着是吃公社食堂：“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摘自当时公社食堂对联），再接着是天灾人祸饿肚皮，连《人民日报》也发出了《赶快加工利用野生植物》的社论（见《人民日报》1959.11.30一版）。建国一社的社员们真正是吃了“三万六千斤”的亏，到公社粮管所称口粮，遇到的是营业员的冷嘲热讽：“哦，你们是建国一社的，有三万六千斤粮食，还称什么口粮哟。”到周围借粮，遇到的尽是白眼：“就是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搞个三万六千斤，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要借粮？没门！”真是见人矮三分。这以后，建国一社的人出门都不敢说出自己是建国人。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仅建国一社河北垅的400多口人，就饿死了70多人。

“三万六千斤”的主要创造者——王乾成的日子也不好过，反浮夸风时受到党组织的严厉批评，检讨写了几大捆，受到降职处分。同时，“三万六”成了他的浑名，走到哪里别人喊到哪里。

如今，“三万六千斤”的当事人大多数已经作古，那个荒唐的年代也已一去不复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永远不再出现“三万六千斤”那样的闹剧！

（责任编辑 丁 末）



敢讲真话的戏曲评论家

景孤血

●朱复

编者按 且看当今报刊，“明星”、“名家”纷然登场，溢美之词连篇累牍。这同一些趋时媚俗的所谓评论家不无关系。

本刊这里介绍的已故戏曲评论家景孤血先生，却与此完全相反。他坚持讲真话，讲实话，不管你是有多大名气的艺术家，成就和不足有几分就写几分，决不曾过其实，即使遭到讥讽和冷遇，也不改初衷。

何尝写戏曲、文艺评论，推而广之，各行各业亦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讲真话，讲实话，而不报喜隐忧，文过饰非，才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力量所在。

我自幼喜爱皮黄和昆曲艺术，在书刊杂志、海报戏单上屡屡见到景孤血先生的大名。

我初次和景孤老见面，却不是因为戏曲，而是在1968年，替皮黄男旦臧岚光先生向景孤老叩贷。虽然他也经济拮据，却慷慨解囊相助。热诚心肠，感人至深。

此后我便常到景家，就各种戏曲问题向他请教，成为他孤独寂寞的最后十年里，唯一追随其左右的学生。并根据他对戏曲史料精心写下的札记、注解，整理成多篇论述发表。

景孤老教导我研究和甄别戏曲史料时，要注意“假似真”和“真似假”两种情况。所谓“假似真”，指的是经过考证可以断定为不是真实情况的材料，初见时往往诱人深信不疑，而放弃了必要的考证，致使谬种流传。例如，郝寿臣的师傅是谁？有人说金秀山，理由是听郝寿臣亲口所讲曾拜金秀山为师云云。这似乎应成定论，但实际并非如此：郝寿臣非梨园世

家，幼入小福盛科班，师从吕福善，此人并不出名；后来郝闻关东，得唐永常的指导；回京后，刻苦私淑金秀山和黄润甫，熔铜锤和架子花脸于一炉，直到为谭鑫培配演《捉放曹》的曹操，得老谭赞许，才开始红起来。但在门第观念很深的戏曲界要站住脚跟，无名师不行，时金秀山已死，便违心地说曾拜过金秀山为师，而实无此事。这是“假似真”的一个例子。至于“真似假”，则是指某事或某论点，听到的人很容易断为无稽之谈而予以否定，但仔细考证后却会断定是真。例如著名汪派老生王凤卿，一直标榜自己的汪派是私淑汪桂芬，但否认和汪桂芬有正式的师生关系。出自当事者本人之口，似可定论，但事实上汪桂芬与王凤卿的师生名份的确是真，王凤卿之兄王瑞卿确曾为其弟请客正式拜汪桂芬为师。王氏后来隐讳此事，原因在汪桂芬幼时曾为“相姑”，其名不彰，故王氏兄弟后来否认正式拜师一事。戏曲史料的研究必须拨开层层迷雾，

才能得到史实的真谛。

景孤老在极艰难的境况下，对后学仍谆谆教导，所花费的大量心血，使我永志不忘。

景孤血先生，原名增元，字叔伟，满族正黄旗籍，系出瓜尔佳氏。1910年生于北京。景先生后来更名“孤血”，概括了他自己凄苦的经历和身世。他7岁起拜海淀名儒马述古为师，学习诗文，聪颖好学，记忆力惊人，读书几乎能过目不忘，诗文下笔成章。15岁时能背诵《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因其接受能力迥异于一般少年，深得海淀文坛名宿庆博如先生的器重，被庆先生誉为“海淀三杰”之一（三杰之龙首是张艳葵、龙腹是景孤血、龙尾是张慕雨）。后来又拜清末民初文豪樊樊山先生为师，向樊樊山老人学习诗词。景先生笔名“拜樊室主”由此而来。

景先生17岁就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卖文糊口，以其杰出的文采，向各报刊投稿。当时由郊区寄往城里的信件邮费较贵，为节省邮



在《打督邮》剧中，著名戏曲报刊编辑哈杀黄（右）饰张飞，景孤血（左）饰督邮

资，年轻的景先生常常由海淀步行到西直门外高粱桥，将稿件投入邮筒，再步行返回海淀。由于他的文章才华出众，立意深刻，见解独到，很年轻便知名于新闻界。被军阀杀害的《京报》主笔邵飘萍先生的夫人重组京报馆时，赏识景先生的文才，聘其担任《京报》编辑。这是景先生投身新闻评论界的开始。21岁时，他为唐伯毅编著的《富连成三十年史》一书撰写序言，充分显示了他在戏曲评论方面丰富的才华。此后各报刊陆续为他开辟戏曲评论专栏，《北平新报》聘他为特邀撰述。

他的戏曲评论文章，与当时捧角消闲文人或文字游戏墨客不可同日而语，其特点有二：第一是具有高度的学术性。用字冷僻，用典精到，固然是景孤老剧评的特色，而考据之深，征引之博，更足以使其剧评文章纳入学术之林。如四十

年代初，《立言画刊》辟有[孤血谈剧]专栏，这些剧评今天读来仍具有相当高的戏曲史价值。第二是评论具有深刻性和尖锐性，不趋时媚俗捧场，故人们每以“刻薄”二字讥景孤老之剧评文章。如1943年余叔岩逝世，景先生在《游艺画刊》[剧坛杂述]栏目内发表《正义评余叔岩》，其中云：

“余叔岩逝世，各剧评人一致哀悼，了无异言，几如叹凤伤麟，愚窃以为过矣。

“昔者言菊朋先生逝世，吾为文以评之，而京中一部票界孳生友好以为过苛。其实‘盖棺论定’之文可以不为，而不可以舍却正义。人为动物，有流通性，生前演剧，如果评之过严，安知后来无改过之一日？是以不能绝其自新之路。逝者则而已于斯，如果专尚感情可不必评，评则须与其人皆致千古。吾岂不知言三爷之为老辈，然而其唱终

有不能跃尔者，此其意，岂一部票界孳生所能知哉？”

这是由余叔岩逝世引出言菊朋逝世时的一段文字公案。景孤老对言派唱念分析精到入微，这有六十年代初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介绍言派特点的讲座录音可证。但景孤老坚持对尚活跃于舞台的演员，评论不可过严，以期其艺术的进步。而对于去世的艺术家，评论必须恰如其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只有敢讲实话和真话的评论，才可能和已故的艺术家同样流芳百世；而文过饰非、揄扬过甚的文字宁可不作。这就是耿直的评论家的骨气。景孤老半个世纪前的这些见解，拿到今天不也同样掷地有声么！那些一味拔高古人、今人，实际上是借以抬高自己的人，在景孤老这段文字面前将自羞自惭，无地自容也。

1945年6月，景孤老的朋友、

中共地下党员、《现代日报》排字师傅张瑞贤，透露了日寇即将投降的消息，希望联络起报界有识之士，一旦日寇投降，马上办起新报。盟弟白宝华动员景孤老任主笔，联络石信臣、贾兰坡（即硕果仅存的古人类学家）、梁子明等位，筹款6万元，于日寇投降后立即创办了《中新日报》，这是光复后北京第一张民营报纸。当时没接电力，大家就手摇印刷机的大轮，坚持出版。由景孤老倡议，该报发起了“回忆吃混合面的苦”社会征文活动，得到各界响应，几天之内收到来稿数百件，字字血泪，是对日寇罪行的愤怒控诉。这次征文，对刚刚挣脱亡国奴命运的北京人民是一次极大的激励。办报期间，景孤老写了一大批有份量的社论文章。一次景孤老所写社论送审，被国民党接收当局新闻检查所查禁，报纸显要部位开了“天窗”，景孤老愤而在空白部位写“予欲无言”四个大字，以示抗议。《中新日报》艰苦支撑了49天，景孤老结婚时的铜床也卖掉了，终因亏损而停办。

景孤老不仅精于剧评，也时常现身红氍毹，彩串戏曲。他因身材矮胖，专工丑行，对丑行艺术有较深的造诣，曾撰述名丑肖长华艺术特点的长篇文章（今佚）。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拍摄100出丑戏剧目的照片，名曰《百丑图》，想为后人留一份珍贵的资料。他与张慕雨等位合作拍了数十张后，因故中辍，所拍照片也遭散失。

1949年，延安平剧研究院迁进北京，改组为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研究院，景孤老参加了工作；1951年该院扩建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景孤老在戏曲文学组工作；1955年该院所属单位独立，成立中国京剧院，景孤老任中国京剧院文学组编辑。他还是中国戏剧协

会会员、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五十至六十年代，景孤老在戏曲剧本创作和改编上发挥了才能，擅长于编写神话剧、鬼怪剧。沦陷时期，即应沈秀水之邀，为富连成科班整理过五本《混元盒》和头二本《普天乐》；在中国京剧院期间，又创作了保留剧目《无底洞》，改编的《大闹天宫》享誉国内外；根据《百草山》创作的《锯大缸》，更化腐朽为神奇。其它题材的剧本也不乏成功之作，如《百花公主》、《杨四郎之死》、《还我河山》、《五侯宴》、《六郎探母》、《余赛花》等；现代戏编写了《南海长城》等（以上剧目合写、合编者恕未一一注明）景孤老还撰写了《由四大徽班时代开始到解放前京剧编演新戏概说》长文，对剧目来龙去脉条分缕析、如数家珍。

然而，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景孤老仍以从事戏曲评论为主。由于敢讲真话，敢讲实话，人际关系和工作境遇皆不能左右逢源。一些原订的捧场会，有景孤老参加，每每便开成了交流会、探讨会，甚至是批评会。他以真话、实话撰述的戏曲评论，也往往被冷落和湮没了。

景孤老以史实和评论家的良心，向“左”的思潮所作的抗争，是他坚持“刘赶三不曾嘲讽李鸿章”说。1965年《辞海》（未定稿）艺术分册送景孤老征求意见。在晚请名丑【刘赶三】条内有“因讽刺李鸿章的丧权辱国而受杖责，郁愤而死”的内容，是指传说中刘赶三在台上打诨，用摘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嘲讽李鸿章在中日甲午之役战败受朝廷处分一事。景孤老经考证认为此事根本不存在，因为精忠庙档案载，刘赶三以77岁卒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初十日（公元1894年8月10日），而据《光绪朝东华录》，李鸿章受朝廷处分是在

甲午八月十八日（公元同年9月17日）。一个死去月余的人怎么会在台上讽刺刚受处分的权贵呢？因此景孤老断定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所谓“嘲讽”事件。他申述理由，建议《辞海》编辑部删去这部分不确的内容。当时的答复是：您的理由固然是实，但考虑到此事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已久，具有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积极政治意义，因此将做为美谈而保留。出于稳妥，冠以“据传”二字。景孤老针对这个答复，又谈了两点意见：首先，让史料的真实性屈从于“政治意义”，不敢苟同。本来不确的事，仍要强调有“政治意义”而大加颂扬，则“政治意义”岂不建立在子虚乌有的基础上了？而与“政治意义”相抵触的即便是史实，也转弯抹角不敢正视。这种取舍的“政治标准”，不是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态度。其次，《辞海》是资料总集的工具书，如果充塞着“据传”、“或云”之类的“美谈”，还有什么真实性可言？因此，景孤老仍然坚持在正式出版《辞海》时，必须删除这部分不确实的内容。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对“政治意义”提出异议，连续发表以上的见解，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景孤老后来向我叙述此事时，表情坦然而平淡。我被他的这种评论家的风骨大为震动，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遗憾的是，直到景孤老去世后的1980年2月，《辞海》艺术分册正式出版，第65页【刘赶三】条内，“据传”云云赫然在目，没有更改。我愤而将景孤老的两次意见整理成《刘赶三何曾嘲讽李鸿章》一文，以“景孤老血述”的名义发表，公开要求《辞海》编辑部删除不确的内容。当时的政治空气并不轻松，《解放日报》将此摘要收入大字政治内参文摘，以期首先对这种论点做出

批示。不意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景孤老不但善于剖析别人，也时时注意审视自己，对自己的失误和错误也是从不原谅的。如景孤老著有《京剧的行当》一书，1960年由宝文堂书店出版，因为材料丰富，论述精细，销路很广。但他并不满意自己的著作，不断地探讨、钩沉其中的不足。1975年底，他在题赠我的该书扉页上密密麻麻书写了作者题识，全文如下：

“予撰此书颇致审慎，但以一人之力有限，故错误终不可免。今谨摘录三条如下：

①《搜孤救孤》中之屠岸贾确有勾老紫三块者。但不普遍。一般多勾白膛子、脑门正中勾红通天柱、虎眉子，略如《红通官》中之司马师。髯口亦挂黑满，不挂转满（此脸谱亦属于红花脸范围）。

②《假金牌》中救孙安者虽亦为‘定国公’，但非徐延昭。马连良

演此剧时曾以萧生李洪福扮演。

③《柜中缘》旦角名刘玉莲，非‘刘玉兰’。

作者自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表明了景孤老严谨不苟的治学之风。

1978年春节；我去看望景孤老，他特别高兴，要师母炒了好几个菜，招待我在他屋里吃饭。他不住地往我碗里夹菜，而他自己却星星点点略扒了几口饭。我知道他多年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饮食受到限制。他也看出我的心思，叹息道：“我现在吃饭，跟受罪一样！”我望着他瘦骨嶙峋的身影，憔悴不堪的面容，和早年白胖的照片判若两人，不禁暗自替他担心，只有再三祝愿他保重健康。不意这一年初冬，他终于被突发性心力衰竭夺去了生命，终年68岁。

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

景孤老追悼会那天一早，我先去景孤老的挚友、著名戏曲家翁偶虹先生寓所，将讣文禀告。翁老做了前列腺手术，刚刚出院，正在屋里洗脸。听我冒失地报告了景孤老去世的消息，屋里一片沉静，突然翁老嚎啕大哭，声音凄恻，连院子里的人也为之动容。良久，翁老勉强止住悲哀，告诉我，手术后尚不能站立和走动，无法亲向老友告别，坚嘱我在追悼会场代写花圈上的挽带，寄托哀思。从翁寓出来的路上，翁老的哭声总是回旋在我耳际。我想，以翁偶虹先生的资历和学识，多少名流已知过眼云烟，何独痛哭景孤血先生的辞世？他是痛惜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才子，悲哀戏曲评论界缺少了一个敢讲真话的评论家。

（本文摘编自武汉艺术研究所内部刊物《艺坛》）

（责任编辑 王 恂）



三位当代著名戏曲研究家合演《取洛阳》。翁偶虹（右）饰马武，吴幻荪（中）饰邓禹，景孤血（左）饰岑彭

刘仁静的是非功过怎能说没有定论？

刘仁静
的
作者
陆立之
商榷
——
与《我们知道的中共“一大”代表

●
洪
焰

《炎黄春秋》1994年第12期发表了陆立之写的《我所知道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文章开始就说：“刘仁静‘坎坷一生，蹉跎半世，有关他的是非功罪，迄今尚无定论’；接着又说，“年轻一代人不了解他，研读历史的人找不到真实可信的资料，千秋功罪，无人评说”。

我认为，陆立之的这一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刘仁静的是非功过，就其要者而论，是清清楚楚的：他早年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去莫斯科学习，参加了托派组织，1929年回国后与陈独秀一起进行反党的分裂活动，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九一八”事变后，托派因坚持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立场而遭国民党政府镇压，刘仁静于1935年被捕后投靠了国民党，曾前后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仁静曾发表声明，承认错误，从而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前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人民出版社工作。

这一段历史是刘仁静自己写下的。其功过是非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刘成为托派后，一手创办的油印刊物《十月》、《明天》，亲自撰写的《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等小册子，甚至他与托洛茨基的通信，至今仍保留在已陆续开放的国内外的托派档案中。即使今日刘仁静在世，也是有口难辩的。

陆立之置这些基本事实于不顾，竟说刘仁静“未损及党的利益”甚至混淆不同的问题性质，贬斥虽曾一度犯过“左”倾错误，但一直忠于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陆立之一文的目的是明显的，即原则承认刘仁静是托派，但他这个托派分子，不是反党而是反对党的错误路线的。我认为，如此粉饰刘仁静是历史不容许的。现就我从事托派问题研究所掌握的资料中，摘出关键的两个问题，同陆立之商榷，亦就正于广大读者：

一、关于刘仁静转向托派问题：1928年6—9月，中央“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先后在莫斯科召开，刘仁静因在苏留学被派参加大会工作，得见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路线的文件，于是转向托派。1929年秋刘仁静回国时，不接受党的教育和分配，自行脱党，并帮助陈独秀等一大批党的干部转向托派，大搞分裂党的活动，因而被中央组织部在党刊《红旗》上公开通报除名。

陆立之文却把刘仁静的转向说成是反对斯大林及李立三、王明、博古错误路线的英雄行为。这是现在某些人为托派辩护惯用的手法。而陆立之走得更远，竟然褒贬分明地说：“刘仁静以为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滑得很远，那一伙人唯唯诺诺顺风倒，没有自己的主见，成

了官僚主义者，是权势圈子的奴才。个别人刚愎自用，凭匹夫之勇，不顾国内实情，蛮横任性，把革命陷入绝境。刘仁静傲岸地鄙薄这些人，甚至回国后也不向当时的党中央报到”，“甚至早年结识的恽代英劝诱他顾全大局，按组织纪律应向党中央报到，他也倔强地和恽吵闹，认为当时党中央就是官僚主义集体”。如此，把整个党中央都骂倒了。对这样的行为，难道今天应该歌颂？

实际情况是，1928—1929年底刘转向托派，自行脱党并被党除名时，李立三路线还未形成（李立三“左”倾路线1930年6月形成，9月结束），王明、博古错误路线（1931年1月形成）更是没影。当时党执行的是基本上正确的“六大”路线，主要内容是肯定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坚持农村武装斗争。正是这条路线，后来发展成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路线。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刘仁静和托派表示强烈反对，他们的观点是：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革命道路是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议会斗争）。由于中共中央不接受他们的错误主张，他们就搞分裂活动，成立托派小组。

所以，刘仁静转向托派要害是反对中共“六大”的正确路线。在“以城市为中心”这个基点上，刘仁静托派与后来出现的两次“左”倾路线倒是是一致的。

关于这个历史事实，在刘仁静回国时绕道土耳其小岛上拜会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托他带回的被视为中国托派政纲的文件——《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共产主义左派——列宁派的任务》，刘当时撰写的《反对派统一运动之过去与未来》小册子和他主办的《十月》、《明天》油印刊物，说得很清楚。因此，把刘仁静打扮成反对“左”倾路线的英雄，是了解历史的读者不能接受的。

在这个问题上，刘仁静本人倒比陆立之诚实得多。他在195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说：“中国革命之能胜利，当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毛主席能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融合到中国革命的实践”；“我的思想总倾向于把群众的力量估计很低，因此总批评党的路线是冒险的，在这种路线下革命必遭失败，实际这只代表我的落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并传播这一思想的影响以阻止革命的前进”；“我自以为是，不肯服从组织的纪律，因此当我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时候便闹分裂的派别活动，实际是削弱革命的力量，让反革命势力更容易巩固起来。”

二、关于刘仁静投靠国民党的问题：“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东三省之后，托派虽不同意中国共

产党的路线，但仍持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立场（过去说“托派即汉奸”是不对的，《毛选》1991年6月第二版有关注释已改正），因此不断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刘仁静也在1935年3月被捕。但是刘被捕后变节了，国民党把他安排在苏州反省院，并担任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国民党当局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好几篇文章，宣传“先经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幻想。”而此前，他是一直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自居的。

狱中的托派见了刘仁静的变节文章，不齿为伍，建议托派中央将刘开除。于是在1936年12月15日托派中央机关报《斗争》（第14期）上，刊出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

抗日战争爆发后，托派虽主张抗日，却竭力攻击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各界民众的谴责。但这时刘仁静从反省院出来后却要求返回托派。托派因其变节而拒绝，他又写信托曾来华充任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之间联络员的美籍托派分子格拉斯及伊罗生向托洛茨基求情。托洛茨基亦回信予以拒绝。于是，刘仁静竟然跑到西安，投靠当年留苏同学、曾为托派、当时是军统头目的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乔，并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及胡宗南的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担任职务，为国民党封锁延安等反共活动服务。

这段历史事实，例如刘在《半月刊》上发表的文章、《斗争》上谴责他“反动与叛变”并开除他的《通告》、以及他与格拉斯、伊罗生的通信，托洛茨基的回答，刘在西安的活动等物证，都在国内及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中比较完整地保存着。

可是陆立之文却不谈刘仁静在国民党“反省院”三年的真实表现，把其出狱后服务于“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说成是“找到了安定的职业”，甚至把胡宗南扣留、搜捕、迫害去延安的爱国青年的罪恶，说成是“收容爱国青年”。连现在已经反省的国民党军统人员也不敢这样说。当年投奔延安的革命干部更不能容忍。

仅以上两端，足以说明刘仁静在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在中国革命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应当怎样给他“定论”。总之，党提倡对待象刘仁静这样的历史人物，应取宽容的态度，不要“过分纠缠历史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搞颠倒是非。否则就失去了“大家向前看”的前提。

（责任编辑 洛松）

地下斗争二十年

——向警予的助手陈恒乔与胡允恭
夫妇的传奇生涯

● 王炳毅

一

1926年10月。广州。年轻的女战士陈恒乔，到周恩来夫妇寓所作客，并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学习情况。这天，正巧碰上从苏联归来的向警予（那时她已是党的中央委员，知名度较高）正在楼下一间有吊灯的房间里给军校及两广区委20余位同志作政治报告。这位年轻的女革命家衣饰朴素，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浓眉大眼，英姿勃勃。要说有什么与众不同，那就是她穿的那双黑色苏式短皮靴，广州女性极少有人穿。此外，她的衣襟上还佩有一枚铜质列宁雕像纪念章。她侃侃而谈，一口湖南口音，理论水平很高。陈恒乔无形之中也被她的报告所吸引，坐在角落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向警予作完了报告，逐个回答了同志们的提问。她眼睛很敏锐，注意到独自坐在屋角小凳上的陈恒乔，没顾上休息，端着一只白茶缸踱过来，与陈恒乔亲切交谈，问了陈的情况。陈才参加革命不久，已闻向警予的大名，知道她几年前曾与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李富春、蔡和森、聂荣臻等赴法国勤工俭学，是仅有的3名女革命者之一。入党很早，善于作宣传鼓动，充满火一般的热情，能力非凡。陈恒乔不免拘束和紧张，向警予对她很和气、友好，称她“小陈”，拿她当个小妹妹。陈恒乔出于尊敬，称她为大姐。周恩来上前又介绍了陈恒乔的家庭情况，特别强调陈恒乔的父亲陈协五先生是在两广有一定影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其子陈孟吾也已加入共产党。向警予频频点头，与陈恒乔交谈，无疑已对她留下好印象。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汉三镇，全国震动。以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1927年2月中旬，中央调向警予去武汉工作。她临行前选择了陈恒乔作助手。他俩结伴搭乘火车北上。在武汉，向警予主要抓工运和妇女工作。带着陈恒乔东奔西跑，深入工厂、港口、码头和学校，发动女工、工人、学生参加革命斗争，工作颇

见成效。

不久，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枪。宝山路上，军队悍然对工人游行示威队伍开火，死伤千余人。血流遍地，积尸成丘。周恩来作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一度被捕，又被北伐军中同情中共的高层军官释放，死里逃生，被迫隐蔽起来，转入地下斗争。

反共逆流席卷南北各地，很快，又出现“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武汉及湖北、湖南的中共党组织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向警予和陈恒乔化妆为家庭妇女，租住在汉口法租界三德里96号的小楼上，主办党的地下刊物《大江》。向警予编写文章，刻印蜡纸，陈恒乔负责油印，并常把油印好的对开小报传递出去。无事时常坐于楼下门口望风，装作擦鞋底或织毛衣。遇有异常动静，即向小楼上报警。她心细而机警，几次遇上险情，都巧妙地应付了过去。以致房东家一直不知道她们的真实身分。自1927年底以后，武汉反动势力气焰凶狂，在武汉三镇天天出动成批军警、侦探，捕杀共产党员和左派进步人士。抓住人，往往只由军事法庭草草审一次，即绑赴刑场砍头或处决，行刑号声分外凄厉。陈恒乔胆大心细，她外出望风时，发现捕房的便衣侦探，已在他们住所附近频繁出现，张张望望。她意识到危险，就力劝向警予暂停出版报纸，先躲起来，深居简出，避一避风险。但向警予是个性格很倔强的人，拒绝了她的劝告。从斗争角度出发，认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大屠杀，革命已转入低潮。特别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同志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已在广东北部受挫，起义军溃散或败退，敌人弹冠相庆。汉口更有必要出版中共地下报纸，以鼓舞士气。结果，不几天，她俩就被已被捕叛变的地下交通员宋若林出卖，而遭捕房侦探逮捕。

在法租界看守所里，向警予临危不乱，机警沉着，利用放风时间与陈恒乔串供，假称向警予名叫夏易氏，湖南人。陈恒乔名叫易陈氏，是广西人，丈夫为湖南长



胡允恭（左）、陈恒乔夫妇在福州，摄于1946年

沙人，以经商为生。夏易氏（向警予）是她丈夫的大姐。法租界的法庭，因缺少人证、物证，难以判定她俩的真实身分。后来那个叛徒当堂指认夏易氏便是赫赫有名的向警予（他似乎并不认识陈恒乔），法官又找来向警予几张照片对照，于是，事态急转直下。向警予和陈恒乔被从法租界看守所引渡到武汉卫戍司令部后，多次遭到刑讯拷打，坚不吐实。向警予自知身分已暴露，不免是一死。她设法保护陈恒乔，把什么事都承担下来，教她不可改口供，一定要挺住。陈恒乔装作是一个不懂政治又没啥文化的无业女子，成天价哭哭啼啼，口口声声冤枉了。

1928年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反动派选择这一天屠杀了几十名共产党员，连十二、三岁的少年“赤共分子”也不能幸免。全城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刑场上，杀人号声一次次响起，阴森凄厉。向警予在牢门打开后，就高呼革命口号，凛然无畏。她留给陈恒乔两条白毛巾作为诀别的纪念，叮咛陈恒乔今后如能出狱，一定得去看望她留下的妮妮、博博一对小儿女……向警予英勇就义了。陈恒乔侥幸地活了下来，后来被以“政治犯嫌疑分子”罪名判重刑15年。不久，风云突变，蒋桂战争爆发。我地下党组织利用这混乱机会，设法将陈恒乔等一大批党员、团员营救出狱。

陈恒乔饱受折磨，面黄肌瘦，又染病在身，身体很弱，在一战友家稍作休息，便化妆成一女教师，搭乘招商局民生轮沿长江东下上海，向党中央负责人、军委书

记周恩来同志详细汇报了向警予被捕壮烈牺牲的经过。还应中央要求，写出有关书面报告。她悲痛无比，深为向大姐的英年遇难而痛惜。一向坚强的周恩来也落泪了……

二

1929年春，地下党员胡允恭从家乡寿县经芜湖来到上海。他一身靛蓝布长袍，黑布鞋，头戴一顶旧礼帽，打扮成一个跑码头的皖帮小商人。“宁汉合流”后，他在武汉转入地下工作。对他有所不利的是他在北伐中左足受重伤，走路微跛，走路有别于健康的正常人。再说他曾担任任何键部35军政治部主任，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认识他。何键就秘密下令抓他，还悬赏通缉他。他按党的指示避往家乡，做地下工作。由于得到安徽国民党元老朱蕴山、柏文蔚等人帮助，他得以立足，并策划柏文蔚的三十三军酝酿反蒋，撒下革命火种。一年多后，党中央调他到上海。一天，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胡允恭坐黄包车来到浙江中路北头一深巷里，看没有特务盯梢，才按接头暗号在一石库门院宅外敲门五下，三长两短。不一会儿，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姑娘打扮的青年妇女。她嗑着瓜子儿，机警地打量胡允恭一阵，又对了暗号，而后，她才略略放心，带胡允恭进去。

堂屋里，烟雾缭绕，几个人在津津有味地打麻将。西厢房里，周恩来已在等候他。周恩来化了装，几乎叫胡允恭认不出来。他已蓄了络腮胡，鼻梁上架一副茶色玳瑁架眼镜，一身深灰色西装，风度凝重。身边还放一根“司的克”（手杖）。俩人紧紧握手。周恩来关心地问道：“你路上是不是被盯上梢？”

“不会的。”胡允恭摇摇头：“拉车的车夫就是我们老乡。是王亚樵安排保护我的。我与亚樵是同乡，比较熟。”

周恩来又询问胡允恭在上海的社会关系。当他得知胡允恭有一本家名叫胡硕猷，在上海端闸北阜丰面粉厂当职员，而且胡允恭在1922年读上海大学时，为解决生活困难，曾在该厂高级职员于瑞生家当过家庭教师。周恩来挺感兴趣，有意由胡允恭出面，找几位皖籍旅沪同志办个书店，作为党中央对国际宣传联络机关和地下联络站。这样不易引起敌人注意。因为沪上敌特及警方档案中，找不到有关胡允恭的什么材料。他是才进入上海工作的。

胡允恭欣然同意。过了几天，周恩来又找到胡允

恭、熊受暄（安徽英山人，黄埔三期生。后曾任鄂豫皖苏区红一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惨遭张国焘一伙杀害）王步文（安徽人，任过安徽地下省委书记，后被捕牺牲）等同志，具体商量如何开办书店。不久，秋阳书店正式开张。胡允恭担任董事长，但他因同时兼任中共江苏省军委秘书（军委书记为罗迈，即李维汉同志），不常在书店，日常事务由王步文等同志负责。另聘一位名叫王仲龄的人为总经理。书店业务开展顺利。鲁迅先生几次光顾这家不怎么显眼的书店，他还与过去就认识的胡允恭打过招呼。他大概多少了解秋阳书店的背景，也了解胡允恭的真实身分，他的微笑与握手都令胡允恭感到意味深长！便衣特务、捕房侦探多次登门，东张西望，可又找不到什么可疑之处，怏怏而去。

1929年秋天的一天，周恩来同志紧急约见胡允恭，代表军委任命他为中央驻烟台军事特派员，命他速去烟台做小军阀刘珍年部的工作。还调了刘满溪、郝道述、陈恒乔、唐嵩、贺果等地下党员及几位旅居沪上的青年男人（均是中共党员），与胡允恭一同乘船去烟台。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胡允恭化名胡克波。军委交待的任务，是通过应刘珍年之邀，帮他办军校，设法影响他向左转，并控制他的约两个师的军队，改变山东所处的不利于我党的局势。

胡允恭的助手，刘满溪与刘珍年弟弟刘锡九是广州黄埔军校的同学、好友。刘珍年为了对抗咄咄逼人的韩复榘，急于扩充势力，训练军事干部，想利用中共人士帮助他办一所正规的军校。他委托刘锡九代为活动。刘锡九立即想到广州暴动中智勇双全的好友刘满溪，极力劝刘满溪去烟台。刘满溪向组织作了汇报，于是周恩来等领导人当机立断，作了这一部署。

在烟台，胡允恭（胡克波）并不直接出面，而是领导同志们活动。刘满溪被安排到师部。其它同志先后进入警察局、侦缉处等部门任职。陈恒乔主要办夜校和做花边厂女工的工作。与她一块工作的是原在刘珍年一师军训处当参谋的彭守道（即后来担任新四军四师师长的彭雪枫将军）。陈恒乔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改说山东话，改变生活习惯，换上北方妇女常穿的衣裳，吃起煎饼、大葱、窝窝头，倚里倚气。

陈恒乔与胡允恭过去就认识，只是并不熟。共同的革命生涯使他们俩相恋，并经组织上批准，在烟台结婚。婚礼仪式可说非常之简单，几碟花生、红枣、糖果，包上些水饺，再弄上几样菜、一瓶酒。新郎新娘连衣裳也都是平时穿的。胡允恭与陈恒乔的结合可说心相印。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使她们的恋爱与婚姻没有浪漫色彩，他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胡允恭对妻子是很

信任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武汉和长沙都难以存身，奉命潜回家乡寿县搞地下工作，几近一年。他从报纸上看到向警予英勇就义的消息，非常悲痛。同时对向警予的女助手、讲一口广西话的陈恒乔的处境也深为担忧。他明白：当时如再有认识陈恒乔的叛徒当堂指认，她肯定也会被当作“共党女要犯”而处决。他常为这位只见过几次面的年轻女同志祈祷。胡允恭知道，经历过那次疯狂大屠杀考验的陈恒乔，不会背叛革命。而陈恒乔对胡允恭是由敬重而产生爱慕的。他稳重、老成，处理事情有条不紊。同时又坚决、果断，严于要求自己。对生活一点也不讲究，书却是一天也离不开。与这样一位职业革命者结合，陈恒乔感到荣幸而自豪。

胡允恭等地下党员，在烟台的工作很出色，发展了不少同志，播下革命火种。但也引起刘珍年的猜疑。一天上午，刘珍年召见了警察局长李绍轩、师长吕本田、侦缉处长马英彪等十余位亲信，共商对策，决定提前动手。吕师长附和刘珍年的看法。他说道：“这班人很不好对付，前几天又公开发传单，在市中心贴标语，什么‘打倒祸国殃民的蒋介石！’‘韩复榘是蒋介石的反动走狗！’‘大特务头子张葦村滚出烟台！’这不是存心跟咱们过不去么？”

众头目连连称是。他们开这个秘密会议时，国民党中统驻山东省特派员兼党部主任委员张葦村正在烟台进行调查。并给刘珍年施加压力。刘珍年乃目光短浅之辈，唯恐惹火烧身，决定待张葦村离开烟台就对胡允恭等人动手。在这个会议上，他只打算留下刘满溪，劝其归顺，并予以重用。如对方坚决拒绝，那就礼送出境。总之，刘珍年看重这个人才，不忍杀害他。

刘珍年怎么也没想到，与会的一个名叫李素若的部下，已经胡允恭等人耐心做工作转变了立场，并秘密加入中共，专做情报工作。李素若在散会后，立即以事先约定的联系暗号向胡允恭、彭守道等同志报警。他们也预感到要出事，只是没想到刘珍年会如此不讲信义，如此狠毒。他们迅速撤退，在尚未暴露的同志们掩护下，分两路离开烟台。等刘珍年得到部下报告，已迟了，他气得大骂一通。后来，刘珍年被蒋介石以“贪污”罪名处决，军队被改编，落个身败名灭的可耻下场。

三

胡允恭夫妇撤回上海后，经周恩来同志安排，胡允恭重新担任秋阳书店的董事长，并参与中央军委的工作。

不久，曾在九江、南昌等地搞地下工作的张国焘夫

妇(张是张国焘的胞弟),在上海被捕。张国焘经不住酷刑,出卖了他认识的胡允恭、王逸常等同志。英帝巡捕房巡警和侦探立即根据口供出动,逮捕了胡允恭等同志。在看守所里,几个被捕者搞串供。胡允恭一口咬定自己并不认识那个穿西装、留分头的“小开”(指张国焘),自己是从安徽乡村来上海,到秋阳书店找人的,果然骗过了审判官。但审判官狡诈多疑,最后又突然提出:“你既是安徽乡村的教书先生,那就当堂背诵背诵《诗经》和《礼记》中的几段吧。”这一诡招,倒是正投胡允恭下怀,他不急不忙,熟练地背诵起来,审判官完全释疑了。但危险还未完全过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行文给英国租界工部局,要求紧急引渡这几个被捕的“赤共嫌疑分子”。

工部局的律师范宝驹应聘为胡允恭等人辩护。范律师是党的同情者,极力辩护,取得成效。半月后,胡允恭等同志被从工部局看守所保释出来,但被查封了的秋阳书店却没能恢复开业。

一年后,党中央又调胡允恭为山东省委书记,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济南开展工作。陈恒乔担任济南市委组织部兼胡允恭的秘书……

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徐徐进了泰安站。化妆成商人的胡允恭,心中憋闷得慌。妻子陈恒乔坐在他对面,脸色憔悴而忧郁。他们不是担心山东的地下工作难搞,而是对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白区工作的李竹声的主观专断深为不满。李竹声是王明(陈绍禹)的亲信,他左之又左,跟得很紧,一向反对稳健的周恩来、陈赓等同志。他命令胡允恭夫妇去济南开辟工作,打开局面。而胡允恭对山东情况很了解,他认为省委设在青岛较有利,回旋余地大。但李竹声和王明坚持要把地下省委设在济南。胡允恭只好勉强服从。在济南工作是艰苦的,因为济南是韩复榘的统治中心,我党地下机关、联络站迭遭破坏。

1931年4月6日,韩复榘突然下令处决邓恩铭、吴丽实、郭隆真(女)等22名中共党员,其中不少是党的高层干部。遇难者遗体不准收殓,暴尸三日!烈士们壮烈捐躯,血洒齐鲁大地,令胡允恭夫妇异常悲愤。加上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又推行起左倾盲动路线,动不动下令搞“飞行集会”、“公开斗争”。这更便于敌人的残酷镇压。胡允恭反对这么干,尽力抵制,几次指令助手们临时撤消济南街头的革命集会,要求地下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们注意隐蔽,保存实力,相机行事。他和陈恒乔、姚第鸿同志还深入工厂、乡村,在基层集聚力量,开展活动。胡允恭和陈恒乔每天外出,都作好随时被捕的思想准备,互相叮咛,置生死于度外。由于

党的活动经费太少,仅剩下的一点经费主要用于接济烈士及被捕者的家庭。而胡允恭夫妇一天只吃两餐窝窝头加咸菜,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尽管物质条件很差,他们并不消沉,坚持开展斗争,发展了党的力量。然而,胡允恭得到的不是肯定与表彰,而是来自党内某几个权势人物的打击和报复。

四

1932年4月,胡允恭夫妇突然被调回上海。当时中央大权被王明、李竹声等人所把持,他们以“马列正统”自居,大搞宗派活动,排斥打击与他们意见相左的同志,手段相当残酷、卑劣。他们还与鄂豫皖苏区根据地的实权人物张国焘等相勾结,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杀害了成百上千的优秀红军指战员。许继慎、曾中生、刘满溪等高级指挥官均遭清洗、杀害。胡允恭与许继慎等同志是同乡和战友,自然受猜忌,被撤了省委书记之职,召回上海,听候发落。这是极不公正的处理,胡允恭想不通,感到气愤。

在上海,胡允恭因残疾在身,又不能暴露身分,暂时找不到工作,常寄宿于闸北苏州河畔的亲戚胡硕猷家。有时为防暗探盯梢,他又不得不变换住处,住在友人租的亭子间。而生活主要靠在安徽中学当教师的妻子挣的一份微薄工资。几个月后,安徽中学的党小组被一个叛徒告密,陈恒乔和教导主任蒋泾开、学生范进均被捕。陈恒乔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判刑三年,关进漕河泾监狱。胡允恭知道妻子生病,身体虚弱,很不安,几次设法探监,鼓励她经受住考验。陈恒乔含泪点头。胡允恭天天担忧妻子的安危,担心时局一旦变化,敌人会下毒手。

后来,胡允恭听说同乡老前辈、国民党左派著名人士朱蕴山先生有事来上海,住在复兴路单家花园里。他生出希望,忙去求助。

朱蕴山听胡允恭说了陈恒乔坐牢的情况,沉吟一会,说道:“你别急,我和龙华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是熟人,可以卖个面子,找他说说情。”胡允恭自然宽心多了。

朱蕴山办事很细心,为了万无一失,他又把具有侠肝义胆的老友李少川先生请去。果然,戴戟见朱蕴山、李少川都出面说情,便下令开释了陈恒乔等3人……

胡允恭在王明等人排挤打击下,被迫脱党。但他仍默默地忍受着委屈与痛苦,坚持不懈地从事革命工作……

五

“五十年来老战士，东江粤海早知音。
是非到此真明朔，不负当时一片心。”

这是1973年夏，朱蕴山老先生寄赠胡允恭的两首七绝的一首。那时，胡允恭的历史已经初步查清，“文革”中对他的专案审查也已告一段落，胡允恭的心情舒畅了些，特写信告知北京的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朱老表示欣慰，特作诗赠之。胡允恭尽管还未被正式恢复名誉，但他并不介意，扪心自问，他感到自己一生光明磊落，是忠于人民忠于党的。

解放初，胡允恭担任过福建师范学院院长。1952年，他调到南京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直到1990年6月，他因病逝世。

陈恒乔也是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只在南京大学担任机关中层干部，直到七十年代退休。她从无怨言，很少对人提及自己那风风雨雨、惊心动魄的革命经历。她认为那一切都属于已经凝固的历史，无须向世人炫耀。

1964年国庆节前后，陈恒乔到北京出席一次会议。见到周总理夫妇、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副主席康克

清、杨之华等同志。邓颖超在与陈恒乔的交谈中说到：“记得是1929年秋，你到上海向恩来同志汇报了向警予同志被捕牺牲的经过，还给党中央写过一份报告，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你不妨再多写点革命回忆录，用以教育广大青少年……”

陈恒乔心情激动，连连点头。邓颖超又亲切地说：“恩来同志几次提到你和允恭同志，他托我向你和允恭同志问好……”

邓颖超的一席话，使陈恒乔觉得犹如春风甘霖，沁入肺腑。这一席话，比任何表彰功勋或平反冤案更珍贵，更诚挚，更宽慰人心。20年地下斗争的生死甘苦，得到了最好的报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党中央拨乱反正的一系列措施，使这一对老革命夫妇心情舒畅。进入八十年代，他们分别撰写了一些回忆革命生涯的文章。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允恭的20余万字的回忆录《金陵丛谈》。胡允恭去世后，陈恒乔与在江苏省老干部局工作的孙子一家共同生活。墙上老伴的遗照，朝朝暮暮陪伴着她。交织着血与火、炼狱与磨难、失败与胜利的英雄交响乐章时常在老人的心扉回荡……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王 愉）



胡允恭（后左一）、陈恒乔（前中）夫妇，1986年摄于南京大学家门口

“杀了邝廓，还有邝廓！”

——北伐军歌作者与蒋介石的师生纠葛

● 罗林远

军事考核场上， 孙中山赞扬邝廓：“人矮志不矮。”蒋介石也开始注意他

1924年初夏的一天，广州黄埔长州岛上，阳光灿烂，椰风习习。在陆军军官学校门前的大操坪上，排列着一队队整齐、威武的学员队伍。此刻，他们正在进行军事操练。10时许，从东山方向的简易公路上驰过来一辆小车，车中坐着孙中山和军校党代表廖仲凯。

小车在校门前停下，孙中山手拄拐杖走下汽车。校长蒋介石一身戎装，率领军校一班教员，早已迎了上来。

孙中山对蒋介石说：“我是看看你们的训练。”

蒋介石立即传令：全体学员集合。顿时，司号员吹起了紧急集合号声，学员们很快站好队列。孙中山在蒋介石、王柏龄、李济深等人的陪同下，检阅了队伍。孙中山看到500多名学员，个个富有生气，欣喜地对蒋介石等人说：“训练还可以，我想看看射击，抽查一下。”

负责军事训练的王柏龄忙递上学员花名册：“请总理任意挑选。”

“好！”孙中山接过名册随意点

名，每点一个，被点名的学员立即大声答“到！”当点到最后一个名叫邝廓的学员时，只听从队列前排中响起一声宏亮清脆的应答声，随即，一个身材矮小的学员，象离弦之箭，射出队列。孙中山举目一望，见这个小小个子学员，充满着朝气，看模样在26岁上下，天庭饱满，额头宽阔凸突，特别是那一双圆而大的眼珠，蕴藏着两束火光。

孙中山点名完毕，被抽查的10几名学员被带上靶场。射击开始，学员们那精湛的射技，使孙中山感到十分欢喜。轮到邝廓射击了，全场又是一片寂静。

邝廓不慌不忙俯身卧倒在射击台上，瞄准百米外的胸环靶，“哗哗”三颗弹丸，击中靶心，报靶员报告：成绩优等。

孙中山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示意蒋介石唤邝廓过来。邝廓闻悉孙总理召见自己，迈着军人步伐跑到观察台前，恭敬地朝孙中山行了一个军礼。

孙中山亲切地用手拍了拍邝廓的肩头说：“小伙子，你是哪地方人？”

邝廓见堂堂的孙总理说话十分和蔼，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他如实地报告说：“我是湖南人，今年27岁。”孙中山颌颌首：“小邝：你们射技很不错嘛，不过可不能自满哟！”邝廓连连点头：“我一定牢记。”邝廓行了军礼，返身跑回射击

队列。孙中山望着邝廓那虎虎生气的身影，笑着对身边蒋介石说：“中正，这年轻人军事技术很好！是块料子。”

“只是他个头太矮了！”蒋介石翘眉头说。

孙中山白了蒋介石一眼：“你这个说法不妥。人不可貌相，我看他人矮志不矮哩！”

蒋介石默然无语。

自从孙中山视察军校后，蒋介石对邝廓特别关注，每次军政考核，他都要过目，经常在军人大会上表扬。一时，邝廓同蒋先云，贺衷寒等成为军校注目的人物。

蒋介石拉着邝廓的手说：“你加入我们国民党吧。”邝廓却执拗地说：“我这一生只信仰共产主义！”

1924年深秋，一个晴空如洗的早晨，陆军军官学校还笼在晨雾中，起床号还没吹，只有海里的早潮，不断地发出哗哗的浪声。这时，在大操坪东北角那株樟树下，蓦然响起一个人背诵书声。这个人就是邝廓。他正在学背孙中山先生的训词。就在他吟诵时，从操坪另一方向走来两个模糊的人影，前面一个头戴巴拿帽，腰挂指挥刀；后边一

人个子稍矮一点，也是一副戎装。这不是校长蒋介石吗？他常常是在学员晨起之前来校的。邝廓不由全身一紧，想避入树后，可他来不及了。蒋介石已大步走近他，用浓重的江浙口音说：“邝廓，你又破坏校规了，谁让你这么早起床的？”邝廓心里一怔：糟了，谁都知道，蒋介石对学员严厉，订出许多使学员难以适从的清规戒律。举例说，蒋介石经常同学员共同就餐，他不先拿筷子，谁都不能先拿；他不落坐，学员都得直挺挺地站着。因此，学员望见他的背影都惧怕他几分。今天给撞上了，只好硬着头皮任他训斥。

谁知道蒋介石不但没有训他，却微笑地上下打量着邝廓说：“早晨天气凉，穿这么一点衣服，不冻着？”邝廓说不冷。

“你在读什么书？”蒋介石问。

“背诵孙先生的训词。”邝廓回答道。

蒋介石一听，感兴趣地说：“你背给我听一听。”

“是！”邝廓一字不漏地背了一遍。

蒋介石听完，点头称赞：“挺流利的。”说完，停了片刻，又略有所思地说：“邝廓，今晚操课后，去我家里一下。”蒋介石郑重地说罢，同卫士朝校门口走去。

邝廓见蒋介石邀自己上他家，心里倒忐忑不安起来。要知道，蒋介石是从不让学生去他家的，这其中，怕真有什么子名堂？但是又不能不去。

这天黄昏，邝廓洗过澡，穿戴整齐，踏着皎洁的月光，走进蒋介石的别墅。抬眼一看，蒋介石早已笑盈盈地从内室走了出来，很热情地拉着邝廓在身边沙发椅上坐下，同时，扭头吩咐夫人陈洁如筛茶拿点心。邝廓见蒋介石一反在校时那副严肃不可侵犯的形象，仿佛换了一个人，心里更是不安。

“邝廓，来我这里可不要客气，来！吃糖果？”蒋介石说着，递给邝廓一颗纸包糖。

“校长，叫学生来有什么训

导？”邝廓小声地问道。

蒋介石含笑地说：“没别的事，随便谈一谈。你是我印象里最好的学生，当今国民革命，都得靠你们呀！”说着，伸手抚摸着邝廓的手，亲切地说：“为了你的前途，我希望你入我们国民党，怎么样？”

邝廓一怔，原来今晚叫自己来，是为了这件事。他知道我已是共产党员呀，这是什么意思？邝廓一时很不明白。

蒋介石见邝廓沉吟不语，摸了摸脑壳，叹了口气说：“我都是为你好呀！你仔细想想。”

生性耿直的邝廓却不理睬蒋介石，执拗地说：“校长，我这一生只信仰共产主义！”

蒋介石微微一怔，接着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房间里的空气，顿时沉闷凝固起来。

邝廓见话不投机，站起身来：“校长，我要回校晚自习了。”

“好吧，人各有志，我不勉强。”蒋介石显得极不高兴似地挥了挥手。邝廓向蒋介石敬了个军礼，转



邝廓（前排右二）和蒋介石（前排中），与黄埔军校第一期优等毕业生合影

身出了门。

啊！外边好一派月色。邝廓顿时感到轻松，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气，一路小跑回到军校。

为打抱不平，邝廓顶撞了蒋介石，校长竟原谅了学生

1925年，国民党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凯旋归来，学员们开始了训练生活。邝廓在战斗中，受了一点轻伤，住在医院治疗。一个星期天，邝廓正在房里散步，突然，从门外走进一个高个子军人，抬头一看，是老乡学员李汉藩。邝廓立刻迎过来，打趣地说：“汉藩，什么风将你吹来的！”

李汉藩气嘟嘟地往病床上一坐，说：“我今天特来告诉你一件事，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太猖狂了！”

“怎么回事？”邝廓一听李汉藩提起孙文主义学会，警觉地挑眉头急问。他知道，自从军校一批先进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组织革命军人联合会后，国民党的右翼份子也打出孙文主义学会的旗号与之抗衡，两个组织经常争吵，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果然，李汉藩讲述：昨天上午，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份子林振雄，以宣传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为名，公然污蔑孙中山先生是周公孔孟的继承人，大肆散布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适逢李汉藩从门前路过，听了极为气愤，冲入会场欲与其论理，孙文主义学会的人立即围上来，挥拳就打，把李汉藩的鼻子打出了血。邝廓听罢，气炸了肺，两只圆眼珠喷出了火苗。他不顾身上有伤，手一挥，大吼一声：“他奶奶的，找林振雄算帐去！”

经邝廓和李汉藩联系，段子中等等一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人蜂拥

来到林振雄的住地。邝廓见了林振雄，一把抓住质问道：“姓林的！你为什么打我们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人！说！”

“他干扰我们的会场！”林振雄不示弱地翻了邝廓一眼。

“屁话！你为什么攻击孙先生！”邝廓火蹦蹦地质问。林振雄回顾邝廓等一伙群众，知道形势不妙，便先发制人，放开喉咙大吼起来：“联合会的人打人喽！”这一喊，惊动了教职员工，纷纷跑来劝架。林振雄乘机溜出房门。

邝廓气愤地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同学一挥手，喊道：“找校长去！”于是，以邝廓为首，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对邝廓说，“你留下，其他同学都回去。”这样，办公室只剩下邝廓一人。蒋介石喝了一口茶水，坐下来对邝廓说：“什么事？慢慢说嘛！”邝廓把李汉藩挨打的事说了一遍。蒋介石听了沉吟了一阵，不置可否地说：“林振雄打人不对，但你们也要反省自己方面的问题。”邝廓见蒋介石如此说，心里直冒火，忍不住冲口而说：“校长，我们有什么不对？”

蒋介石一怔，斜眼瞟了瞟邝廓，想不到面前这位优等学生竟胆大妄为，顶撞自己，心里很不是味，但又不好发作，只好压低声音劝导说：“我当校长的只能劝你们相亲相爱，精诚团结呀，不要闹出意见。”邝廓一听，心里明白蒋介石偏袒孙文主义学会，气冲冲地扭身就走。

“邝廓！”蒋介石一见邝廓不顾师生礼节，发怒地唤了一声。可是，邝廓依然扬长而去。气得蒋介石把手里的茶杯摔碎在地下。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校务会上作出了查办林振雄的决定。有人也提出对邝廓的横蛮态度要作处理。蒋介石摇了摇头说：“他是正义的，就算了吧！”

蒋介石最后一次劝邝廓随自己回南昌，却遭到严词拒绝

1926年春末夏初，北伐军分东西两路向北挺进。邝廓离开军校政治部宣传科，担任李济深的第四军的宣传科长。北伐军唱着由他创作的军歌，一路攻关夺寨，很快拿下武汉三镇。就在这时，从南昌城传来蒋介石镇压工农群众的事件，使国人为之震惊。武汉黄埔学生闻悉校长蒋介石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以蒋先云为首的黄埔学员们纷纷举行讨蒋集会。

1927年1月，蒋介石迫于形势和反革命策略需要，随身带领亲信学生曾扩清乘飞机抵汉口。他一到下塌处，就打电话约邝廓见面。邝廓一听，觉得是劝说蒋介石的好机会。他按时来到蒋介石的住地。

蒋介石一见邝廓，很热情地让卫士倒开水递烟。邝廓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便不卑不亢地说：“校长！叫我来有什么事？”蒋介石笑着说：“我同你分别半年多了。好想你哩！这次我来汉口，主要和同学们见见面。”

“可同学们都对你有意见。”邝廓直通通地说。

“难道你也对我有意见？”蒋介石一双目光盯住邝廓，惊讶地说。

“是的，你违背了孙先生生前的意愿。”

“邝廓呀！你也跟他们一起胡闹，我可是对你印象不错的，你这样做我可不高兴啊！”蒋介石摇头叹气。

“我是对你讲的真心话！”邝廓说完，望了一眼蒋介石，只见蒋介石阴沉着一张脸，锁紧眉头。房里空气顿时凝固起来。隔了好一阵，

蒋介石转过头，瞅住邝酈说：“你跟我回南昌去，我不愿看到你越陷越深，怎么样？咳。”

“不！我留在武汉很好！”邝酈坚定地拒绝说。

“我可是为你着想！”蒋介石进一步劝说。邝酈别转头，冷笑了一声，讥讽说：“我不愿被人家咒骂！”

“放肆！”蒋介石在茶几上“叭”地猛拍一掌，气红了脸。卫士见他们师生活不投机，忙走过来对邝酈说“邝先生，总司令要休息了。”

邝酈白了卫士一眼，扭身扬长而去。把扔在房里的蒋介石气得连声直骂：“娘希匹！”

翌晨，蒋介石硬着头皮来到汉口游艺场，面对200多个黄埔学生，用嘶哑的嗓音说：“同学们！我们应当服从领导，团结一致，同心同意完成北伐大业，为党国效忠。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孙总理在天之灵……”他的讲话未及一半，台下的同学便发出一片唏嘘声，有的吐唾沫，有的扔纸球。蒋介石身旁的曾扩清，见势不妙，悄悄地拉了拉蒋介石的衣角。蒋介石会意，草草收场，忙走下台，钻进小车，溜回住地。

夜里，蒋介石正熟睡之际，忽听卫士笃笃敲门响。蒋介石问什么事，卫士悄声报告，黄埔学生中有一伙人要来行刺。蒋介石大吃一惊，忙唤随从立即转移。第二天，蒋介石登上飞机，返回南昌。当即令人究查谋杀一事。获知那天晚上谋杀他的人中也有邝酈，气得蒋介石七窍生烟，狠狠地对曾扩清说：“今后一旦抓住邝酈，一定要杀了他！”

邝酈被捕。临刑前，刽子手对邝酈说：“你还有什么话要

说。”邝酈大义凛然地说：“转告蒋癞子！杀了我邝酈，还有邝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撕下革命的假面具，公开向革命人民群众挥起了屠刀。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的镇压，8月1日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邝酈随叶挺部队参加了战斗。此后，又转战潮汕，与朱德会合。1928年初，朱德为配合湘南起义，指名派遣邝酈回家乡耒阳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

邝酈回来以后，在县委领导下，开展秘密活动。2月中旬，率领农军配合朱德部队攻下耒阳城。为避开蒋介石的军事围剿，4月间邝酈率农军上了井冈山。不久，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邝酈奉命返回耒阳。这样一来，消息传至在耒阳的反动的黄埔学员耳里，当即给在南京的蒋介石写了封信，报告了邝酈的情况。蒋介石读罢信，咬牙切齿地吩咐身边的人说，“速给湖南发个电，俘获邝酈，毋须请示，就地处决！”指令一下，耒阳挨户团总部立即张贴告示：活捉邝酈者，赏银圆一千。

邝酈家乡仁义乡的挨户分团头目姚梦批伙同劣绅李尚德、李佰秋，在各村布置暗探。一天，获悉邝酈在其老师李芝汉家出席生日宴会，姚梦批忙派人混入宾客中，单等邝酈的出现。快开宴时，邝酈同警卫邝光葱化装来到客厅。他抬头一看周围，瞥见宾客中有许多陌生的面孔，知其有诈，立即机警地对警卫说：“此地有狗，我们走！”可是，他俩人的行踪却被人盯上了。邝酈为摆脱敌人的跟踪，快步跑进山间小路。可是已经迟了。姚梦批

带领百余团丁从四面包围上来。邝酈拔枪朝扑上来的团丁一阵猛射。但终究寡不敌众，子弹打光，警卫饮弹捐躯，他落入魔掌。

敌人将邝酈捆绑，押至义兴镇。姚梦批升堂问审。他狞笑地对邝酈说：“听说蒋总司令对你蛮器重的哟，为什么不效忠，却闹什么共产？”

邝酈圆睁着火眼，狠狠地瞪了姚梦批一眼骂道：“蒋介石他是什么东西，我生不能杀他，死了变鬼也要掐死他！”

姚梦批见邝酈如此仇恨蒋介石，心里暗忖，身为总司令的得意门生，竟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

“邝酈，你还有什么话要对蒋总司令说吗！”姚梦批两眼闪烁着凶光，想再一次使邝酈回心转意。邝酈大义凛然地说：“你们拿笔来！”

“拿笔？！……”姚梦批犹豫起来，一时木鸡似地呆立不动。

“哈哈！哈哈！你们这些王八羔子，是怕我跑掉，飞了；这样吧，把笔夹在我脚趾缝里！”邝酈昂首仰天大笑。姚梦批这才放心地分咐团丁取来纸笔。只见邝酈伸腿用脚趾夹住笔杆，在敌人铺在地面的草纸上，刷刷地写下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杀了邝酈，还有邝酈！”写毕，把笔“咔嚓”一声踩碎。姚梦批和其余的团丁，一个个惊愣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好半晌，姚梦批才回过神来，大呼团丁把邝酈拉到村子前，执行刀杀。

邝酈毫无惧色，昂首挺胸，唱起了自己创作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北伐军歌走上刑场。一个黄埔精英倒下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和他创作的北伐军歌一样，仍然在神州大地激荡、飞扬……

（责任编辑 丁末）

何万生烈士和他的革命老妈妈

● 安 捷

何万生（又名何蔓生）烈士1944年光荣牺牲，至今已51年了。每当思念起他，我们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他真不愧是一个名实相符、可歌可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热情好客的李大妈使何万生找到了共产党

1942年6月下旬的一天，同窗好友叶宁忽然对我说：“李大妈（即李毅诒夫人）约你星期六到她家吃晚饭。”我听说李大妈极为热情，那怕典当衣物也要招待好客人，加上她家有青年人，可以做为开展工作的对象，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星期六下午5点多钟，当我来到地安门内铁匠营8号李大妈家，一看被邀请的客人不仅叶宁一个，还有意想不到的两个人：一位修长身材，白净面孔，黑而长的头发，教职员模样，约40来岁；另一位是40开外的学者。经介绍才知道前一位就是叶宁早已提起过的自学马克思主义的何万生先生，后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裴文中先生。李大妈做了十好几个菜，摆了一圆桌。在日本鬼子大肆掠夺中国物资、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1942年，李大妈竟然做出了那么多美味菜肴，很不容易。大家吃得很高兴。

饭罢不一会儿，裴文中先生告辞而去，何万生就同李家的儿女们、叶宁，还有我这一帮年轻人在一起，谈天说地，一会儿骂鬼子、汉奸，一会儿谈对进步书刊的学习，一会儿讲个笑话或掌故，很是开心热闹。大约到11点钟，由何先生提议，李德媛大姐用法语高歌了《马赛曲》，才尽欢而散。

这一晚，何万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热情、坦率；虽然比这些青年年长20岁以上，但思想感情却跟年轻人很合拍；知识多，见识广，谈吐文雅，思想进步。

何万生出生在清朝末年。他的父亲是蒙古旗人，做过道台；母亲是汉族的贫农女儿。他父亲从山西辞职回北京，因所有钱物在路上都被强盗掠去，贫困潦倒，不

久去世。年幼丧父的何万生无钱读书，幸好他的同父异母的大姐嫁给驻藏大臣之家，藏书很多，并设有家馆，何万生就做外甥们的伴读。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无论读书、写文章、书法都很优异，深得家馆先生的赞许。这样，他青少年时代在传统文化方面打下了基础，还对《易经》、佛学的大乘、小乘等等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以后，又自学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

1930年以前，何万生为了谋生和奉养母亲，考入了北平市政府的秘书室统计股当职员。他为了不被辞退，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在统计股的工作中，对情况、资料了如指掌，起草文件都轻车熟驾，得心应手。

30年代初，何万生在李毅诒的启发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起初坚持唯心论观点，李先生用唯物论观点驳倒了他。他非常要强，从此不仅向李先生借进步书籍，还利用在市政府供职的机会，从查抄的违禁书刊中，偷偷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著作，从唯心论转到了唯物论立场上，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

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革命同志

在何万生的邀请下，1942年夏天我开始去看望他和他的老妈妈。何家住西单察院胡同26号。何万生很健谈，对共产党人的敬仰和钦佩更溢于言表。除谈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至今使我记忆犹新的是，他详细描述了1933年李大钊出殡，路经宣武门、西单时的情景：许多学生不畏军警的殴打、追捕，散发传单，并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路边的行人被感动得驻足而立，纷纷落泪。何万生这一番生动描述，激励着我这个年轻共产党员的革命斗志。

这一年暑假，我正在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交通工作，任务是同保定城西游击区蛮子营秘密交通站联系，输送地下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到蛮子营，转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7月中下旬，从北平送出7个人，不料其

中深度近视的王湘（王森昌）和艾力农（张家眷），在由保定到蛮子营的田间小路上，同接应他们的秘密交通员失掉联系，不得已返回北平。艾力农是瞒着家庭出走的。他的父亲张允亮是清末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子，母亲袁若桓是袁世凯的长女。像这样的官宦之家，怎么肯舍得和积极支持自己的子女献身革命呢！艾力农为了等待机会，再次去根据地，不敢回家，东躲西藏，没有适当住处。地下党的同志们要我想办法，我立即想到了何万生家。我同何先生一谈，他慨然答应掩护艾力农。这也就是何万生接受革命任务的开端。

艾力农在何万生的书房住下，起居饮食有何老太太照料。何先生下班后就同他聊天。母子二人都自觉遵守秘密纪律，不打听艾力农的身世，也不谈自己的经历。閒谈中，何万生大都讲的是旧社会的黑暗，伪市政府内部不同派别的钩心斗角，反映了他愤世疾俗的心情。看到艾力农老实、拘谨，就同他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在艾力农离开北平再次赴保定的头一天夜晚，何万生同他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大意是：要想做终身的革命者，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才能革命到底。否则，遇到困难和挫折，会发生动摇，就成了昙花一现的“革命”人物。至今艾力农缅怀往事说：“半个月相处，何万生先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谈吐不凡，性情深沉坚毅，后来为革命壮烈牺牲，绝不是偶然的。何老太太守口如瓶，真是地道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母子是我永志不忘的人。”

何万生母子，还掩护共产党员叶宁和晋察冀城工部派遣干部张大中，为地下党掩护秘密宣传员等等。我来找何万生谈工作，也经常被何老太太热情的挽留就餐。当时物价飞涨，何老太太为了照顾好同志们的生活，暗自典当衣物。

何万生积极参加了北平地下抗日斗争

我经过晋察冀分局城委的城市工作训练，自打1942年11月回北平后，就将所了解的抗日方针、秘密工作原则、根据地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和有关见闻，向何万生做了传达和介绍，他很是拥护和兴奋。当听到党组织要他做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工作时，他慨然答应，立即同我研究如何着手。从此，他热情奔放，利用在伪市政府供职之暇，不遗余力地在亲朋好友中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为晋察冀城工部领导

下的北平地下党完成了以下任务：

一、输送革命知识分子去抗日根据地

何万生介绍去晋察冀城委的有：王西徵及其一家——夫人潘郁彬、子女王恂、王悦、王惕，还有高一光、于爽仁、于澄宇。

王西徵先生是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两校兼课的国文系教授。他曾和陶行知办南京晓庄师范和安徽公学，后任北平市立师范校长、张作霖帅府家庭教师，是张学思革命思想的启蒙人。抗战前，王西徵在阮慕韩（阮若琳、阮崇武之父）领导下做地下工作。1942年底，经何万生介绍，张大中派戈原将他先行接到晋察冀边区。王西徵参加革命后改名王纪新，在《晋察冀日报》发表题为《望眼欲穿的北平市民》一文，揭露日寇、汉奸侵略、卖国罪行，很有影响。后在华北联大及边区政府任职。王纪新到边区后，何万生时常照顾留在北平的潘郁彬及其子女。王纪新从边区带回的信件、生活费用，都由何万生转交。1943年夏天，何万生又送走潘郁彬母子4人，到晋察冀边区。

何万生对党交给的任务高度负责，在送人离京之前，他不仅把接头的时间、地点、联络暗号及应注意事项交待得一清二楚，还叮嘱再三，生怕出事。90岁高龄的潘郁彬老人，念念不忘何万生对她们的无微不至的关照，为了联络、护送她们母子，跑前跑后，累得大汗淋漓的情景。

王纪新到晋察冀边区后，在原燕京大学教师中引起了连锁反应。该校生物系教师林子明（原名崔毓麟）和王纪新是同事、邻居和好友。王离京去晋察冀边区前，同林子明话别，林说：“你先去，那里如果好，你就来信，我也去！”1943年5月，张大中把王纪新邀请林子明去边区的信交给了我，让我负责送林先生。林子明看到王纪新的信非常高兴，将家属安排停当，就毅然奔赴晋察冀边区。以后他曾任华北联大政治班主任。1945年初，经组织安排，也将他的夫人于静贞、子女林尔为、林汝为、林君为、林子为等6人全部接到晋察冀边区。

二、团结革命知识分子

何万生开展地下斗争，首先以李毅诒家为活动点，团结着李德媛、李志媛、李采。其次以思想左倾的廉孔彰先生家为活动点，团结着康明（廉骥）、方程（廉驢）。每逢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何万生不是同李家就是同廉家相聚。他常把社会科学著作、革命文艺作品、《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等等带给大家看。向他

1946年到北平解放前，上述李德媛、康明等十几个青年，有的在地下组织入了党，有的奔赴解放区。他们走上革命道路，都同何万生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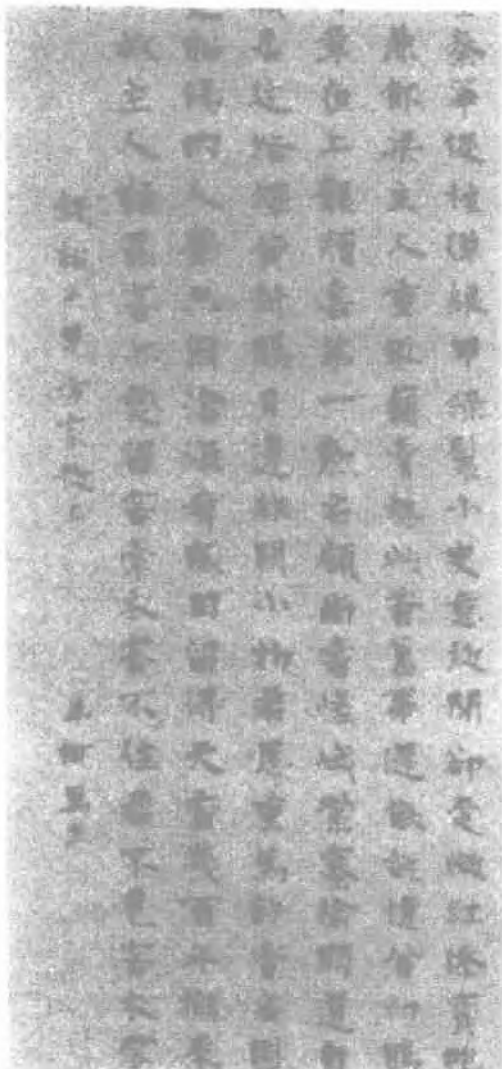
一个真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1944年4月，张大中和我商量的发展何万生入党问题。我正准备同何万生长谈一次，并让他写出自传。不料，何万生于5月初就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东珠市口“1420部队”。同志们焦虑万分，却苦于无法营救。日寇对何万生进行着秘密逼供、审讯。当时我们间接地得以知道，何万生在狱中受尽了百般折磨与拷打。但是，无论日本法西斯施以什么样惨无人道的酷刑——过电、灌凉水、坐老虎凳、压杠子、用烧红了的烙铁烫他那瘦弱的身躯，都丝毫动摇不了他那钢铁般的坚强革命意志。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咬紧牙关，只字不吐，直至被致于死地。何万生先生以他宝贵的生命，保护了党的机密，谱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

他年逾40尚未成家，毅然表示：“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不结婚！”

革命意志坚强的何老妈妈

何万生的母亲何老妈妈，自丈夫死后含辛茹苦数十年，支持她活下来的重要精神支柱，是她有一个贤德孝顺的独生儿子。何万生被捕后，每到黄昏，老妈妈就拄着拐杖，依门而望。她多么盼望着她的儿子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可是，很久很久她都没有等到。日本投降后，我又被派回北平做地下工作。1946年初，当我第一次看望失去爱子的何老妈妈之前，心里盘算着：老人会很悲痛，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对她的安慰呢。没想到，见面时老妈妈仍像何万生被捕前那样，端坐在客房八仙桌下首的太师椅上，沉着、冷静、安详。看问题、谈话还是显得那么头脑清晰和要言不繁。不晓得是亲友们为了不使她悲伤，而将何万生牺牲的事瞒着她呢？还是老妈妈虽已知道儿子不在人世，却不愿意说破，以使自己抱有一线希望和在精神上留着一点慰藉呢？她对我说：“我儿子被日本人抓走，押到东北当劳工去了，他会回来的！”多么叫人心酸！但她没掉一滴泪。我也强忍悲痛，点头称是，不敢在老人家面前哭泣。



何万生遗墨（部分）

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的情况、中国抗战的前途、共产党、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英勇杀敌的斗争事迹。往往长谈到深夜。康明有时还在从地安门步行送何万生回家的路上，依依不舍地倾听何万生的谈论。现在相聚在一起，他们都说：“我们深受何大叔的影响，他是我们的革命带路人”；“他的英勇牺牲，更增强了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更坚定了我们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根据何万生生前提出的团结抗日青年的要求，康明、方程在1945年日寇投降前，在北平和他们的家乡秦皇岛，还团结了魏玉珍、王健、李瀛、李常荣、韦木（韩西文）、廉家训、廉隅（廉宣民）、康有为等青年。从

从1944年下半年起，张大中看望何老妈妈，并通过艾友兰、沈汛送一些钱给她。后来，也由我送钱。李毅诒、廉北彰也给她一些钱。这些接济断断续续，不可能都很及时。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一日三涨，这位刚强的老妈妈却从来不叫苦，不向地下党组织提任何要求，但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却异常关心和十分乐观。

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1946年初冬，尽管对于何老妈妈来说，心爱的儿子还是生死茫茫，音信杳然，可她还是那么立场坚定，说出的话掷地有声。她对我说：“蒋介石国民党贪污腐败，压迫老百姓，不搞和平打内战，不得人心，肯定要失败；共产党、毛泽东代表穷苦人民的利益，老百姓真心实意地拥护，一定会胜利！”

1947年冬天，何老妈妈身上起了许多水泡，艾友兰和我先后带她到同仁医院和北大附属医院，请大夫诊治。医生遗憾地说：“她得的是‘天疱疮’，这种病没

法治！”我和艾友兰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都心如刀绞，又不敢表露，只有默默无言地把她送回家。1948年初，这位对共产党感情深厚、革命意志无比坚强的老妈妈，没有等到天亮，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北平解放前夕，和我们永别了！

何万生先生惨遭杀害，51个寒暑过去了，他壮志未酬身先去，何老妈妈也含恨而终。他们母子，一个没有坟茔，两人都没有墓碑。但是，他们以自己高尚的品质、气节和情操，以对党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实际行动，早已矗立起了无字的丰碑，它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党和人民对他们也必将永志不忘！

（本文是作者根据叶宁、李采、李德媛、李志媛、艾力农、王纪新、潘郁彬、康明、方程、艾友兰、王彤等同志访谈整理）

（责任编辑 焕 然）

海南颂

（外一章）

陈 雄

琼岛珠光映碧空，
百花争妍四时同。
父老不知水何物，
享尽春分乐融融。
古来蛮荒多谪臣^①，
今朝宝地舞东风。
人阵穿梭忙下海，
乐在天涯望故宫。

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日

参观宋氏祖居

宋氏荣耀声名扬，
祖居原在天一方^②。
槟榔林立托日月，
山花飘拂四邻香。
曾为黎民志轩昂，
敢战惊波下南洋。
发财致富解国难，
愿献血汗扶中山。
莫道村寨隔云海，
浩浩青史赋新章。
陋室三间今犹在，
当歌此地飞凤凰。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日

① 古代，海南被称为蛮荒（也称南荒），意为尚未开发、荒凉落后的地方。

② 宋庆龄同志（一八九二——一九八一），祖籍海南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其父亲宋耀如出生在这里，祖父祖母也安葬在离村子不远的山坡上，并且至今还保存完好。耀如九岁跟随哥哥飘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后转赴美国开创新业，从此闯出了一条迷人之路。他因养育宋庆龄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以及宋蔼龄、宋美龄和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这样几位在我国近代现代史上声名显赫的儿女，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父亲”。如今，宋氏祖居由政府拨款按原貌修复开放来自国内外的游人络绎不绝。

老作家冰心的海军缘

● 袁华智 唐 宏

犹豫再三，最终我还是拨通了冰心老人家里的电话。冰心老人的女婿陈恕先生告诉我，老人近来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医生嘱咐谢绝客人来访。不过，海军的人来看她，她一定会很高兴的。近几年来，我有幸多次拜见、采访这位与世纪同龄的老人，她对大海、对中国海军的一片深情，令人刻骨铭心。

出身于海军之家

第一次来到冰心的家里，我就发现她的卧室兼书房里有一排高大的书架，书画和工艺品中间摆放着一张用玻璃镶嵌的黑白照片。冰心告诉我们，照片上的老人是她的父亲——谢葆璋。

谢葆璋，字镜如，1865年出生于福州。在这个世代不问兵事的书香之家，谢葆璋却叛经逆道，参加了水师，也就是当时老百姓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海军。这家庭史上的转折，和冰心的爷爷不无关系。冰心的爷爷是城里一名颇有名望的塾师，与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严复是情同手足的同乡好友。17岁那年，谢葆璋经严复引荐，考取了天津水师学堂，从此踏上了长达一辈子的海军生涯。冰心的家从此与海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天津水师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筹建北洋海军过程中创办的。李鸿章通过他多年洋务活动的实践，认识到“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材为水师根本，而学

生又为人材之所自出”。于是，1880年他奏请在天津建立水师学堂，第二年便开始招生入学。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赴英国留学归国的严复任总教习。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本想就地培养人材，没想到当时北方风气极为保守，很少有人报考，以致招生不能满额，不得不到上海、福建等地广为招徕。谢葆璋就这样从南方到北方，成为天津水师学堂第一届舰艇驾驶班学生。3年之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留在了北洋舰队任职。1886年3月，清朝政府选派谢葆璋等33人，前往英国和法国学习海军技术。他们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第三批出国留学的学生。

谢葆璋是一位极出色的海军军官。英国留学归来后，他担任北洋舰队“来远”号巡洋舰的枪炮二副，参加了甲午海战中著名的黄海海战和威海保卫战。甲午战争之后，他先后担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海军军部司长、海军部参谋、海军副部长以及海道测量局局长等职，曾被授予海军少将和中将军衔。

冰心有如此显赫的家庭背景，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很多熟悉冰心老人的人，对谢葆璋的名字却十分陌生。其实，连冰心本人对父亲的历史也不全部知晓。当我和我的同事从浩瀚的清末和民国的海军史料中，整理出一份谢葆璋的生平简历时，冰心说，小时候父亲常给我们讲大海、海军和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但很少讲到他自己的过

去。从中我们也许能够悟出，这位身居高职海军将领的故事不曾为后人广为流传的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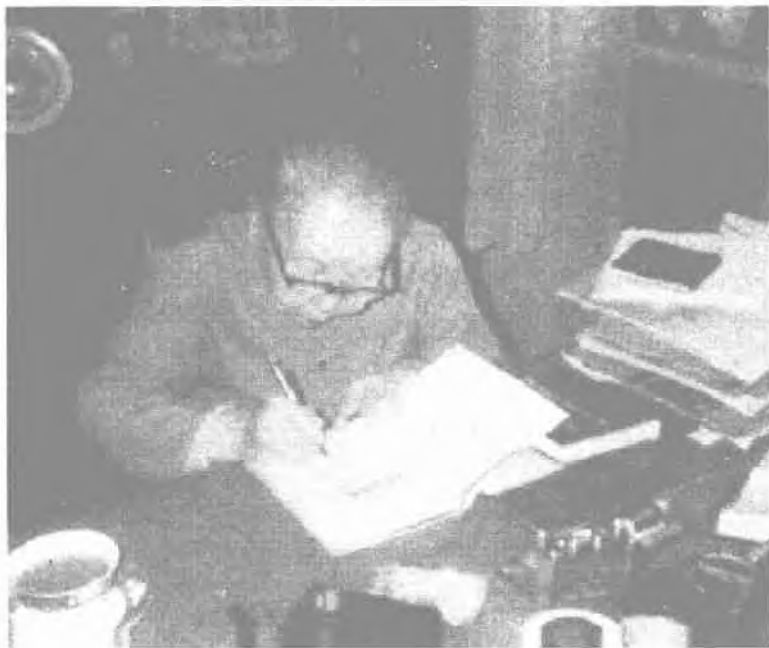
从小在军营长大

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海军被遣散，谢葆璋带着失败军人的沮丧回到故乡。这一年，他恰好30岁。对于已有妻室的谢葆璋来说，这也算是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海上生活，全家人希望他能操持一份家产，过一过平静的日子。但是，甲午战败的耻辱从精神上折磨着这位爱国军人。

1900年，冰心出世。年过35岁的谢葆璋这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在这之前，北洋海军重建，谢葆璋抑制不住一阵欣喜，穿上压在箱子底层的军装，又一次抛家舍业来到了海军军营，并担任“海圻”巡洋舰的副舰长。

1903年冬，谢葆璋奉他的同乡和教师、北洋舰队帮统（副司令）萨镇冰之命，创办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一所海军学校——烟台海军学校。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冰心说：“甲午战争后，海军学校所剩无几。要发展海军，没有海军人才怎么行？所以父亲下决心要培养更多的海军人才，来复兴中国海军，雪洗甲午之耻。”

因为学校生活相对稳定，谢葆璋把妻子和孩子接到烟台。年满3岁的冰心，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军营生活。



冰心老人

烟台海军学校选址在烟台东郊，与大海毗邻。海浪、军舰、水兵构成了冰心童年眼里的景色基调；舰艇的汽笛、嘹亮的军号、水兵操练的口令，是冰心生活中最有感召力的声响。学校旁边有一个军港码头，这几乎是冰心唯一的最好去处。冰心回忆说，学校附近有个村子叫金沟寨，妈妈常和金沟寨的妇女一起做针线活，有的农村小女孩四、五岁就开始学针线活，妈妈也想让冰心学一学。但是，冰心似乎对针线活没有任何兴趣，她可以在大海边的岩石上遥看远处的军舰和灯塔，一坐几个小时，而绝对不愿意坐下来摆弄针线。她的母亲总担心，这孩子长大后不会针线活，嫁人时怎么办？

生活在军营中，冰心最开心的朋友就是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水兵。冰心有时候和父亲一起进出军营，水兵们庄重地给他们举手行礼，而到了休闲的时候，水兵们则领着冰心舞枪弄炮，做一些摸爬滚

打的游戏。当然，冰心最喜欢的还是水兵们给她讲爱国英雄英勇杀敌的战斗故事。

有一次，冰心和父亲一起在海边散步，看到晚霞映红了碧波荡漾的海面，青山白云下海鸥翻飞，大海恬静而美丽，她禁不住告诉父亲：“烟台的海真美”。父亲的脸上却没有笑意，望着远处的海，似乎陷入了痛苦的沉思。父亲告诉她，中国的海都很美，但是有好多地方我们还不能去，威海被英国人占了，青岛被德国人占了，旅顺被日本人占了……。在冰心幼小的心灵深处，她从此似乎懂得了大海在军人、在水兵心目中的位置。

冰心在军营生活了8年，如果不是一件意外事件的话，她可能还会和水兵一起相处更长的时间。因为烟台海军学校教学极有成效，在所有海军学校的统一考试中一直名列前茅，这引起了满清政府的重视，所以专门选派了满族贵胄子弟来校学习。满族贵胄子弟在学校的

种种特殊待遇，早就引起了汉族学生的强烈不满，矛盾终于在1910年秋天的一次体育竞赛中为争夺锦标激化。处事公正的谢葆璋拒绝袒护贵胄学生，这当然得罪了朝廷，加之他一向思想开明，学校学生中订有不少革命报刊，甚至还有部分学生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建立了联系，因此，清政府中有人怀疑他是“乱党”，便派海军官员郑汝成前来查办。郑汝成是谢葆璋在天津水师学堂的同班同学，他告诉谢葆璋，北京风声很紧，劝他赶紧辞职，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的下场。谢葆璋对清政府已不抱幻想，遂愤然辞职，与家人一起离开烟台返回福州。

“我永远崇拜保家卫国的海军军人”

采访中，冰心几次都给我们讲述了她父亲鲜为人知的一段经历，使我们为先辈们保家卫国的壮举而血涌心颤。

这是一个十分悲壮的故事。1894年7月25日，中国历史上永远也不能忘却的日子。天刚拂晓，两艘中国军舰“济远”、“广乙”从朝鲜牙山港起航，驶至丰岛附近，3艘悬挂太阳旗的日本军舰突然一声号炮，不宣而战的丰岛海战爆发，从而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

决定甲午海战胜败的关键一仗是黄海海战。冰心的父亲谢葆璋亲身参加了这场被誉为上个世纪最大规模的海战。中日两国军舰在中国黄海海面上开战不久，北洋舰队的邓世昌率领的“致远”、林远升指挥的“经远”等舰相继沉没，方伯谦所在的“济远”、吴敬荣指挥的“广甲”舰先后逃走，形势十分严

峻。北洋海军的“来远”舰与另一艘巡洋舰“靖远”号结成姊妹舰，相互仍恃，奋力抵抗日舰的疯狂进攻。在与号称“帝国精锐”的“吉野”号等4艘快速巡洋舰的战斗中，“来远”舰中弹200多处，弹药舱被击中，引起爆炸，全舰燃起熊熊大火。危急关头，作为“来远”舰上枪炮二副的谢葆璋，亲率士兵冒着日军的猛烈炮火，奋力扑救舰上大火，终将大火扑灭，保住了战舰。

冰心老人向我们描述说，黄海海战那场仗打得很残酷。我母亲的一位堂侄在“来远”舰上当兵，炮弹打穿了他的腹部，肠子被炸了出来，飞溅到军舰的烟囱上。目睹亲人的惨死，谢葆璋把泪水咽进肚里，化成一股抗敌的勇气。直到战斗结束时，父亲才含着泪将烟囱上烧焦的肠子撕下来，放回这位海军英烈的遗体中。

第二年年初，谢葆璋又随舰参加了威海保卫战。2月5日深夜，潜入威海海湾的日本鱼雷艇，用鱼雷袭击了受伤的“来远”舰。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来远”舰顷刻翻倒，露出红色舰底，很快沉没。谢葆璋不得不跃入冰冷刺骨的海中，凭着一身好水性，拼命游上刘公岛，这才又一次死里逃生。几天后，北洋舰队在刘公岛全军覆没。

当时，北洋海军中，福州人最多。海军的惨败，使整个福州笼罩在一片悲恸凄惨的气氛中。冰心老人回忆说，我们住的那条街上，在甲午战争中阵亡的海军将士很多。按照福州的乡俗，对死去的亲人，家里人要在门上糊上白纸门联，以示祭奠。战争期间，今天这家糊上了白纸门联，明天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想，这白纸门联迟早要糊到我们家的门上。于是，她悄悄买了一盒鸦片膏，准备一旦接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就服毒自尽。

这个故事母亲不知给她讲过多少遍。在冰心的童心中，除了那份伴有泪花的伤感之外，更多地留下了她对海军军人的崇拜和爱戴。冰心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为父亲有这样的壮举而欣慰。有一次，她给来自海军的几位客人题字是这样写的：“我父亲是一名海军军人，我永远崇拜保家卫国的海军军人。”对父亲的情感，对军人的挚爱之情跃然纸上。

少了一个海军女战士，多了一个著名女作家

冰心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个女水兵，驰骋在辽阔的海疆。这个理想源于她对父亲的崇拜和挚爱，也源于她对海军的认识和理解。海军军营的耳濡目染，使她过早地懂得了大人们都不一定弄懂了的道理。她知道，甲午战争中国败在海上，外国军舰之所以在中国海横冲直撞，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海军。冰心时时都渴望着水兵的生活，能够沿着父辈那样的路走下去。

然而，父亲面对她的软缠硬磨，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海军一律不收女兵。其实，不仅海军中没有女兵，封建的中国所有军营中都没有女兵。

由于父亲得罪了朝廷，冰心全家离开烟台返回福州，她只好将向往水兵的一片憧憬留在了深夜的梦乡。她们一家人从烟台行至上海时，辛亥革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震撼着一颗过早成熟的心灵，当时只有11岁的冰心，看到以黎元洪名义发表的革命檄文，热血沸腾。她拿出自己积攒下的10元压岁钱，跑到申报馆，捐给了参

加起义的革命党人。谈及此事，冰心老人笑着说，当时，申报馆还给了我一张收据，上款写着“幼女谢婉莹君”字样。这张字条我曾珍藏了好多年。

没有实现水兵的梦想，这大概是冰心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了，好几十年过去，她至今仍念念不忘此事。她每次总要特地询问现在海军中女兵的生活情况。有一次，我们给冰心老人带去了几张现代女水兵生活照片，她真是爱不释手，好生羡慕。

少了一个女水兵，多了一个著名女作家。这是对冰心童年理想的补偿。生活是一切创作的源泉。冰心写出的“海”，不也正是她真正生活的体现和升华吗！

我们曾问过冰心老人，如果方便的话是否会到海军部队去看一看，她说，一定要去的，应该看一看现在的海军军舰。但是，冰心老人一直没能成行，因为一次摔伤骨折，剥夺了她行走的能力。10多年来，冰心老人下肢瘫痪，取消了几乎所有的外事活动。根据医生吩咐，她需要安静的休养。冰心告诉我们，少年时没有当成水兵，年老之后，不能亲自到海军军舰上去看一看，只是留有一丝遗憾的海军缘份。

冰心老人把对水兵的情感寄托给了现代海军军人。这几年，不管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只要有海军的人来看望她、采访她，她都欣然同意。每次见到海军，就象见到了亲人一样，总要问长问短。她的家人曾经风趣地说，我们家和海军是亲戚。

冰心的海军情情长悠悠。这份情是珍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是寄托给现在和未来的期望。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共产党人的怀祖之情

——记党和国家领导人瞻仰炎帝陵

● 王锡堂

湖南省酃县（今改炎陵县）塘田乡洙水江畔，有一片蜿蜒起伏的山坡，古时候经常有白鹿出没，人们把它叫做白鹿原，又叫鹿原坡。坡上的茂密森林中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古墓，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的安息地炎帝陵。古往今来，无数炎黄子孙到此谒拜。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不少领导人来这里瞻仰，表达中国共产党人对我们民族始祖的崇敬之情和继承、发扬我们祖先的创造精神、献身精神、锐意改革，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决心。

要象炎帝一样 为人民多做好事

1962年12月5日，正值初冬，茶花馨香。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驱车来到酃县。陪同前来的还有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同志。

晚上12点，县委招待所已是夜阑人静，然而胡耀邦的住室仍然是灯火通明，他正聚精会神地阅读《酃县志》有关炎陵的记载。第二天早饭过后，他便找到县委书记郭步书说：“你们酃县有个炎帝陵，炎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我到了酃县，就得去敬拜敬拜。”

郭步书难为情地回答说：“炎帝陵主殿，1955年春节前夕失火烧毁了。”胡耀邦连声叹息，但坚持说：“殿不在，墓还在吧？我还得去

敬拜。”郭步书再次内疚地说：“解放10多年了，还没修通去塘田的公路。”胡耀邦坚决地说：“有一双脚，那就走路吧！”

郭步书陪胡耀邦行走3个多小时，中午时分终于到了炎帝陵。此时，不少群众正在炎帝墓前朝拜，他对陪同前来的同志说：“炎帝神农氏死了几千年，人们至今还在朝拜他，就是因为他一生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12月7日，胡耀邦在座无虚席的县委小礼堂里，向县级机关党员干部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这次我到酃县，看了《酃县志》，昨天又瞻仰了炎帝陵墓。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就葬在你们酃县，这是酃县人民的骄傲。炎帝一生勤勤恳恳，发明创造了很多的东西，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比如，教人创造农具，种植五谷，为寻药给人治病而尝百草，哪怕一日遇七十余毒，也不畏缩，

终于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发明了医药。他又倡导交换，发明了商业，促进了交往，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几千年来，大家都还记得他，尊他为中华民族文明之始祖，亿万人民则皆以炎黄子孙而自谓。今天，我们共产党人的事业更伟大，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就要求我们具有比前人更大的志气，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毅力，更多的才智，下决心迎着困难朝前走，好好为人民服务，多做好事，多干实事。如果这样，人民也不会忘记我们的。”

一年多以后，1964年4月5日，胡耀邦再次来到酃县，再一次拜谒了炎帝陵。当天下午，他在塘田乡社教工作队员会议上说：“炎帝神农氏是我国古代一位德功卓著的部落首领，他治天下不纷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力而不杀，法省而不烦，务利之已矣，不望其



炎帝陵午门

极，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乐之。”胡耀邦一边说，一边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接着他又说：“炎帝十分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永远为炎黄子孙所尊敬，如今炎帝陵只剩下断壁残垣，人们还是络绎不绝来烧香朝拜。我们都是革命干部，是共产党员，只要我们真心诚意地为人民办事情，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

20多年后的1986年6月，经国家文化部批复，湖南省人民政府拨专款重修炎帝陵。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十分高兴，欣然挥笔题写了“炎帝神农氏之墓”；1988年炎帝陵竣工以后，胡耀邦题写的这七个大字已刻成高3.2米、宽1米的汉白玉墓碑，树立在炎帝陵的墓碑亭中央。

修复炎帝陵，是为炎黄子孙作了件大好事

1988年5月20日，晴空万里，炎帝陵的修复工程已接近尾声，建设者们正在进行紧张的装修。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宋任穷来到了炎帝陵。

在修复炎帝陵工程指挥长唐家钧等的陪同下，宋老一边参观，一边听着重修炎帝陵的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要求重修炎帝陵的呼声越来越大。1983年5月，在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出席会议的23名湖南代表向大会提交了“重修炎帝陵”的议案，很快得到了国家文化部的答复。1986年6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拨出专款，正式动工修复。陈云、胡耀邦、耿飏、周谷城、赵朴初、周培源、杨静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为炎帝陵题了词。广大人民群众闻此消

息，更是喜上眉梢，他们慷慨解囊，捐资相助。许多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也纷纷寄来捐款。

宋老在参观中，高度赞扬了建设者们的辛勤劳动，并夸奖工程设计精心，主体突出，造型美观。他说：“炎帝是中华民族始祖，修复炎帝陵，这是为炎黄子孙做了件好事。”

“应该有炎帝那种精神，敢于探索，敢于开发”

1991年4月11日，春光明媚，百花盛开。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赴湖南的平江、茶陵、酃县和江西的宁冈、井冈山等地考察，4月13日来到酃县。车未进县城，就直奔炎帝陵。

重修后的炎帝陵，在春天的装点下，显得格外壮观。宋健一行在当地领导同志的陪同下，一边看，一边听着炎帝陵管理局负责同志的介绍，回到休息室，县长卢耿民简单汇报了酃县经济建设情况和酃县八五计划。宋健听完，很有感慨地说：“炎帝教民耕种，发明了五谷，普尝百草，发明了医药，倡导交换，发明了商业，这是对人类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也是科学上的一个大发展。今天，我们发展经济，就应该有炎帝那种精神，敢于探索，敢于开发。发展农业是永恒的，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一万年以后也要发展，当前一定要抓住机遇，搞好农业科技开发。”

在汽车开往酃县县城的路上，卢耿民接着向宋健汇报了进一步开发炎帝陵的打算。宋健高兴地说：“你们的打算很好，开发炎帝陵，既可弘扬民族精神，也可以吸引海内外游客和客商来酃县投资开发，变旅游优势为资源优势，这

确实是一项利在当今，造福子孙的事情。”

“炎黄子孙，数典念祖”

1991年6月6日，一阵大雨过后，仲夏的酃县山城显得格外明净。这一天上午，炎帝陵又迎来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一行。

年过古稀的王任重神采奕奕，健步来到了主殿。殿内的仙鹿、神鹰石雕和栩栩如生的卧龙浮雕吸引着王老的双目，炎帝陵管理局的同志向王老说起了许多有关炎帝陵的美妙传统。相传炎帝年幼时，母亲经常外出打猎，采取野果，将他放在向阳草地上酣睡。炎帝有时醒来饿得嚎啕大哭，声音有如幼鹿哀鸣，又像山鹰啼叫。母鹿和山鹰听后急忙赶来，母鹿给他奶，山鹰张开翅膀为他遮日挡雨。后人纪念炎帝，也不忘母鹿和山鹰，用石料雕成母鹿山鹰，安置在炎帝陵之前。王老听着介绍，时而发出欢快的笑声，时而吟诵几句《史记》中有关记载炎帝神农氏的文字。

行礼殿的门楣上悬挂着陈云题写的“炎黄子孙，不忘始祖”的金字横匾，跃入眼目。王老看后，连声称赞：“这词题得好，表达了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随后，王老即兴挥笔，写下了“炎黄子孙，数典念祖”八个遒劲、洒脱的大字。

一定要把炎帝陵管理好

1991年10月12日，秋风送爽，金菊盛开。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萧克将军，在江西永新县参加湘赣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活动以后，兴致勃勃来到了炎帝陵。

轿车在湘赣公路上奔驰，将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同车的同志说：“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从古到今，凡是中国人，不论走到天涯海角，有的可能记不住自己三代祖宗的名讳，但忘不了自己是炎黄子孙。今年4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后，我就想到炎帝陵拜拜老祖宗，今天如愿以偿，终于来到了这里。”

在炎帝陵管理局同志向萧老介绍历经沧桑的炎帝陵得以重修的经过后，将军十分感慨地说：“国家和人民花这么多钱来修复炎帝陵，表达了人们对民族始祖的崇敬之情，今后一定要把炎帝陵管理好。”当管理局同志谈到近几年来不少台湾和港澳同胞来炎帝陵瞻

仰、祭祀时，将军很有感受地说：“干革命，统一战线很重要。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两次到酃县。1928年7月，我随朱德攻下酃县城，由于湖南省委代表和代理特委书记杨开明坚持执行湖南省委错误决定，附和二十九团部分官兵想回湘南的思想，强行把部队拉往湘南，结果在郴州与范石生部队发生激战，先胜后败，使二十九团损失惨重，造成八月失败，就是一个惨重的教训。当时驻在郴州的范石生部队向我们党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朱德和范石生都是云南讲武堂的学生，是同班同学，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在最困难时得到过范石生的帮助，朱德离开范石生部队时，曾经有过‘今后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的协议。这次到郴州，如果我们不打范石生部队，范石生也

不会打我们，红军就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将军回顾这一往事，接着说：“今天，我们重修炎帝陵，也可以说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炎帝陵修好了，让更多的台湾、港澳同胞来这里瞻仰，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大陆，就可以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

参观结束，将军感慨万千，欣然挥笔写下了“中华文明始祖，神州农耕先声”的题词。

炎帝陵修复后，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外旅客，成为亿万炎黄子孙向往的地方，1992年，炎帝陵被列为全国33个故土园建设工程之一。1993年9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笔题写了“炎帝陵”三个大字。1994年4月5日，酃县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炎陵县。

（责任编辑 洛松）

欢迎为《炎黄春秋》杂志踊跃投稿

《炎黄春秋》杂志，是以周谷城为会长、萧克为执行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所主办，是历史纪实为主的综合性月刊。本刊坚持以展示炎黄文化成果，讴歌中华历代英杰，回顾民族发展历程，描绘神州人文风貌，歌颂改革开放大潮，宣扬海外华人爱国奉献精神为主旨。高举爱国主义大旗，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讲实话，讲真话，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力求真实地反映其本来面貌。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不任意褒贬，不容无中生有地虚构。

本刊创刊三年半以来，以其思想性、真实性、知识性、可读性和史料价值，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来信来稿不断增多，许多佳作被国内外数十家报刊转载。为了更好地办好刊物，提高质量，拓宽刊物内容，欢迎学者、作家及热爱本刊的作者和读者，根据刊物的宗旨、内容和风格，踊跃投稿。现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为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要深入采访，反复核实，掌握可靠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如根据有关资料加以整理，请注明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二、文字力求简明、通畅。来稿一般不要超过15000字，欢迎两三千字的短稿。最好配有清晰的图片，并写清说明。

三、文字要规范，不要潦草。特别是人名、地名、年月、数字、引文、古文、生僻字、外文等，一定要写清楚。

四、请自留底稿。来稿如不采用，一般不退。如必须退回，请予注明。三个月内未收到采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

五、请勿一稿两投或多投。如发现其它报刊已经采用，本刊恕不再付稿酬。

本刊编辑部

第一个率团访问内地的台湾学者

范光陵

● 江鲲池

我40多年前中学时代的同窗挚友范光陵先生，现在已是台湾科技、文化界的一位名人，也是一位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积极促进者。他现任台湾中华文化协会会长、文化总会国际文化促进委员会副主任、世界文化与诗歌会议会长兼电脑科学主委、台湾工商管理学会理事长及美国加州大学院士、教授、美国著名的IBM公司电脑分析师等职，曾获得美国杰出学者奖、英国国际杰出人物奖、泰国电脑奖等多种奖励。他还是一位中国新古诗的爱好者和倡导者，一直致力于两岸的文化、经济交流。早在1988年由台湾文化、艺术及商界代表组成的第一支海峡两岸经济文化观光探问团就是由他率领的。目前年已60多岁的范光陵，仍不辞辛劳奔波于海峡两岸，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尽心竭力。

我和范光陵的重逢是1994年4月，他回故乡安徽省潜山县扫墓的时候。通过电话联系，我们约定4月11日在合肥见面。几十年不见，他又负有盛名，见面后会是什么情景，我有些忐忑不安。但当我们在安徽省“对台办”见面时，他几十年前那种平易热情、诚恳善良的性格丝毫未变，我们的感情一下子拉回到青年时代，谈得那么高兴，那么无拘无束。他拿出他的两本诗集，分别在首页题字后送给我。在臧克家题写书名的《飞鸟集》上他写了“鲲”字之后，写了个“鱼”字。我说：“你写错了，我的名字是鲲池。”他把右手一甩：“不要慌嘛，我不会写错你的名字。”然后写道：“鲲鱼非池中之物也。一九九四年赠鲲池兄”。接着，又在由冰心题写书名的《爱心集》上题写了“故乡逢故知，人生至乐也”，表达了对故友重逢无限欣慰的感情。写毕，他又从手提箱内取出一纸，说：“我再赠你一首诗，他不假思索，写出一首新古诗：“晓来眼力差，见树不见花，未知明日事，且饮今天茶。”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虽已年届花甲，但仍然才思敏捷，出口成章。

为尽地主之谊，我在省“对台办”附近的一家小餐

馆请他吃饭。他不嫌小餐馆简陋，连声说：“这里好，这里好，与家乡人民大众在一起吃饭感到亲热。”他边吃边说：“我不会喝酒，今天我们共饮三杯，乡情，友情，47年重逢相聚情，一情一杯。”在开怀畅饮中，他还对过去的老同学表达了惦念之情。

范光陵，祖籍安徽省潜山县槎水乡三乐岗。1933年生于安庆，1946年毕业于桐城中学。我当时亦就读于桐城中学，比他低一班。由于当时这个学校学风良好，大家都勤奋苦读，我和他在各自班级中成绩均名列前茅，平时也常在一起嬉戏，可以说，我们是儿时的密友。1949年，他随父去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先在美国斯顿豪大学读完企



范光陵博士（左）在台北赠诗北京梅葆玖先生（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



蒋纬国先生与范光陵博士、何南史博士在台北举行中国诗的复兴——新古诗发表会（1993年5月）

管硕士学位，后获得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复于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光陵对人生和事业有很深切的体会。他说，抓住人生机遇非常重要，然后就是奋斗、拼搏。他在美国留学期间，看到世界电脑科学的兴起，便决心从事电脑研究，并立志进入世界第一流的电脑公司。他刻苦努力，不怕挫折，经受多次失败与冷遇，终于因发明“第三次世界大战棋”而破格地被吸收到他梦寐以求的美国IBM公司，并很快升任为经理。此后他又在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方面下功夫，先后撰写出《电脑管理学》、《工商管理学》、《电脑百科全书》、《电脑和人类》、《电子计算机原理》、《美国企业学》、《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等数十部科技、经济著作，其中有的著作在大陆出版。光陵曾在美国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好莱坞、泰国曼谷，欧洲卢森堡等世界各国和地区20多次担任国际会议主席，其行迹遍及欧、亚、非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还是一个中国新古诗的热心倡导者，著有《透明湖》、《雨树》、《泥河》、《爱心集》、《飞鸟集》等中英文诗集6本，因此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面对取得的成就，范光陵用一首题为《人生》的小诗，作出了小结：“人生如海潮，起落有定时；若不动撒网，潮去恨已迟”。

范光陵“功成名就”之后，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1988年6月25日，由他出任团长的台湾第一支海峡两岸经济文化观光探亲团，风尘仆仆抵达北京。光陵在机场动情地发表了感人的即席谈话：“海峡阻隔四十

年，每一天我都向往着来大陆寻根问祖，探亲访友，追溯中华文化之源泉，了解经济发展之未来。今天有机会和同胞、亲人见面，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我们浑身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家乡、同胞、亲人。我们是捧着一片爱心来的。”探问团于端午节抵达桂林，实现了有意义的探问之旅。在桂林游漓江时，适逢烟雨笼罩，两岸山峰或隐或现。范光陵即景生情，随即吟诗一首：“海峡四十年，历史一瞬间；相思如雨丝，落入漓江去。”这首诗曾被大陆新闻媒体广为宣传，视为台湾同胞怀乡诗文中之佳作。

此行之后，范光陵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与大陆经济、文化、科技各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他还同钱伟长、王光英、汪道涵、唐树备、林佳楣、冰心、臧克家、艾青等科技、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界名人会晤。在北京，他受到了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的接见。在宴会上，他又兴致勃勃地以《两岸》为题赋诗一首，诗云：“两岸同一堂，千宾尽一觞，笑谈统一事，一诗三酒香。”充分表达了他期盼祖国统一的深厚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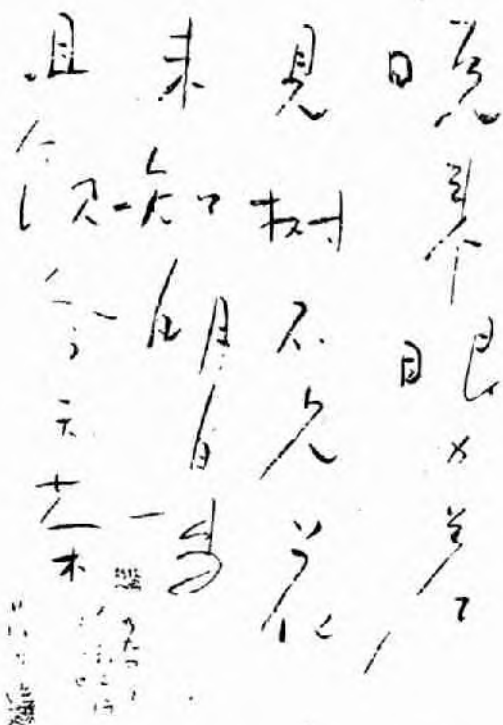
统一大业需要两岸决策者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范光陵在宝岛为促进祖国统一，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台湾政要中有的在范宅与他交谈，有的参加他举办的促进两岸统一的重要活动。《爱心集》中有一首他为祝贺40多年来两岸第一次合作兴建范仲淹忧乐碑而作的“千年一范，海清石灿；先忧后乐，永结两岸。”这座座落在台北的“范仲淹忧乐碑”，揭幕仪式由范光陵主持，蒋纬国先生任主委。范光陵作诗，其父范苑声先生题书，刻于碑上。1991年9月15日，范光陵在北京冒雨拜访冰心老人时告知：台北范仲淹千岁碑的立碑人已刻上冰心的大名。冰心老人高兴地为其父范苑声先生题书：“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

光陵热切期盼统一大业早日实现，还突出地表现在对故乡倾注的浓厚感情上。从1992年到1994年，他连续三年每年回故乡潜山一次。1993年9月，光陵第二次回到故乡，他是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回来的，他要把他父亲的骨灰安放在天柱山麓的野人寨，以了却父亲魂归故土的遗愿。他还把父亲珍藏的文物，如春秋钱币、战国箭镞、唐玉猫、宋玉蝉、元玉狮和各国珍品及名人字画（其中有张大千的绘画和蒋介石、于佑任、蒋经国等人的题字）等200余件（幅），捐赠给当年由他父亲范苑声创建的野寨中学，并参加了野寨中学50周年校庆。1994年4月4日重返故里扫墓，他又带回了一批文物，表示来年再回乡时将把家中全部古董文物捐送给故乡。潜山县委书记赵金苗对笔者说：“范先生爱乡之情特别深笃，他这次回来在紧张的扫墓、探

亲、访友过程中，还在我们潜山的经济界、企业界，作了经济管理报告，并投资5万元给县里。”

“曾读先生书，未识先生面。”这十个字的条幅是范光陵1992年第一次回潜山时赠送给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的。张恨水先生也是潜山人，与光陵父亲是至交。这一年的9月10日，在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该会常务副会长、安庆市委副书记殷成贤向范光陵授予名誉会长证书，他激动地说：“我建议适当的时候，在台湾召开有大陆专家学者参加的两岸共同研讨张恨水的研究会，这是挺有意义的工作，我将在台北机场恭候。”这天下午，光陵与故乡潜山文友吟诗联欢。他先写一首新古诗，赠给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徐继达，诗曰：“茶花醉人小虫鸣，红泥小屋卧白云。莫笑阿郎似木叶，一杯春茶一倍情。”徐继达立即回赠一首道：“皖水泱泱芳草萎，名山有灵落菩提。游子终圆桑梓梦，杜鹃不在耳边啼。”接着，有潜山小才子之称的徐迅若有所思地吟道：“一路乡情一路诗……”才思敏捷的光陵马上接口吟出：“……游子归来何迟迟，长空千里无云处，秋风萧萧我心知。”在座的十几位文友作诗四五十首赠光陵。他说：“我曾参加过三次世界诗人大会，都没有像今天如此陶醉，因为一首首诗中都充满着乡音、乡思、乡情……。”

1994年他第三次返回故乡，又一次与我谈起新古诗运动。他说，现在，新古诗正在台湾、武汉、北京、上海、潜山和美国、欧洲等地开始传播，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希望大家共同来推进中国诗的复兴——新古诗运动，使诗大众化，用诗来介绍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让中国诗走向世界，架起通向世界的桥梁。1991年3月4日晚，100多位好莱坞明星及娱乐界



名流在洛杉矶聚会，欢迎“桂冠诗人”范光陵。他即席以英文赋新古诗一首。在会上，他表示要通过诗的传播，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提倡中国文化。

他还对我说：“倡导新古诗是我现在致力的一件大事之一，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力促祖国统一。我做统一工作很合适，因为两岸的领导人同我都相识，两岸的朋友很多。祖国的早日统一，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重要条件。”

范光陵爱祖国、爱家乡的高尚情操，除他长期在海外的切身经历外，他的父亲范苑声一生的言行，直到生命之烛行将燃尽时之遗愿，对光陵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范老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国民党后，曾任安徽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他到晚年，加深了对家乡的怀念，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但是范老先生的夙愿未能实现，便于1990年7月9日病逝于台湾。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儿子范光陵，已将他的骨灰带回大陆，安葬于他主持建成的176师抗日阵亡将士墓之旁；他曾经住过的景忠亭已修葺一新，成为“范苑声文物馆”。这些都会使范老先生含笑于九泉了。

(责任编辑 林 耀)



范光陵博士访中国大诗人艾青先生于北京

乌兰牧骑走红神州

● 郝玉峰

1964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汇演筹备情况时说，内蒙古的乌兰牧骑搞得非常不错，一个小小的演出队只有12个人，他们常年活跃在草原牧区，既演出文艺节目，又用幻灯和书刊宣传党的政策，辅导牧区的文艺骨干，还帮助牧民们打羊草，挤牛奶，起羊粪……很受牧民群众的欢迎。

周总理听了很感兴趣，问道：“他们的演出你们看过吗？”

林默涵说：“内蒙古成立乌兰牧骑时，乌兰夫专门请文化部派人去帮助做过试点。许多干部不但看过他们的演出，还听过他们的汇报。”

周总理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文艺战线上的新生事物，便说：“请你和内蒙古的同志打个招呼，能不能在少数民族汇演期间，来北京演一场让大家看看？”

“文化部也有这个想法，我和内蒙古的同志联系一下。”林默涵临走时说。

周总理再一次嘱咐他：“一定想办法调乌兰牧骑来京演出，大家互相交流交流经验也好嘛！……”

1964年11月，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汇演开幕了。周总理专程来人民大会堂观看乌兰牧骑的首场演出。

舞台大幕徐徐拉开，天幕上展现出美丽富饶的草原风光，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绿茵茵的草地上牛羊成群。一支由12人组成的乌兰

牧骑，穿着绚丽多姿的民族服装，头戴圆顶花帽，脚踏马靴，在一面鲜红的队旗引导下，踩着欢快的蒙古族乐曲走上舞台。他们演出了歌舞、马头琴、蒙古族说书、微型小戏等……这12个人，每个人都是多面手，一会儿扮演角色，一会儿唱歌，一会儿拉琴，一会儿跳舞，样样都能干。他们演出的节目短小精悍、活泼动人，充满了浓厚的时代气息和草原生活气息。使满场的观众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周总理一边看演出，一边对坐在身边的当时内蒙古文化局党组书记布赫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应当发扬光大。”

布赫谦虚地说：“我们的节目还很粗糙，请总理多多指正。”

周总理摇摇头说：“不能这样讲嘛，我看乌兰牧骑起码有三个优点：一条是发扬了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精神；一条是你们找到了深入基层为群众服务的好形式；还有一条是组织形式短小精悍，一队多用，一手多能，人员少，道具轻便，一驾马车就把整个演出队送到农村牧区去了，多方便呀。当然关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现在，你们内蒙古有多少乌兰牧骑？”

布赫回答有30个。

周总理说：还要大力发展，每个旗县要有一个。全国都要向你们学习，建立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工作队。接着他问林默涵：“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呀？”林默涵点头说对。紧接

着周总理又说：“我建议对乌兰牧骑的经验要大力宣传一下，光宣传还不够，请内蒙古抽调几个乌兰牧骑到全国各地去示范演出，让大家都看看内蒙古的文艺工作是怎样贯彻‘二为’方针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林默涵答应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乌兰夫在呼和浩特关心着乌兰牧骑进京演出的情况。他听说乌兰牧骑在北京一炮打响，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并且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表扬，内心十分高兴。这使他回想起1957年，为解决草原牧区缺乏文化生活问题，创造乌兰牧骑的初期所走过的艰难道路。当时有人说乌兰牧骑不伦不类，简直是四不象，他硬着头皮把乌兰牧骑这条道路坚持下来。一个新事物要得到承认真是难啊！不久，乌兰夫先后接到布赫和文化部的电话，说周总理决定抽调3个乌兰牧骑到全国去作去范演出，这下又使他犯起难来。因为目前虽然有30个乌兰牧骑，但是大多数成立时间不久，他唯恐胜任不了这个任务，最好还是不要去现丑。想到这，他直接给周总理挂电话，电话接通后还没等他开口，周总理首先热情洋溢地说：“乌兰夫同志，我祝贺你们的文艺战线上放了一颗卫星呀！”乌兰夫知道周总理指的是什么，说：“总理言过了，我们搞那些东西还很不成熟，听说让我们抽调3个乌兰牧骑到全国各地去演出，恐怕登不了大雅之堂啊。”

发扬乌兰牧骑作风，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 办洋胡

周总理说：“乌兰夫同志不要谦虚嘛，中央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文教事业的决定，在你们那里贯彻得很出色，我要谢谢你呀。你们的演出我看了，说它是崭新的无产阶级文艺，并不过分。今天，我们就是要这种文艺，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我建议你们抽调一批骨干力量加以训练提高，给你们三到五个月的准备时间，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同林默涵同志商量解决，怎么样？”

乌兰夫完全理解总理的意思，便将任务接受下来。

这样，内蒙古文化局从全区的30个乌兰牧骑中选拔了一批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过得硬的队员，组建了3个乌兰牧骑进行训练。经过勤学苦练，排演了一些思想内容健康、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节目，1964年6月6日，三个乌兰牧骑来到北京。在出发赴全国各地演出前，林默涵又请示周总理还有什么指示，是否再看一下节目。周总理对乌兰夫办事是很放心的，说道：“不用了，出发前你可以向他们强调一下这次巡回演出的意义和作用，也要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

阵。”

林默涵同志遵照总理的指示，向全体队员们讲了这次到全国各地演出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向全国文艺工作者起示范作用，让他们学习你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二是起宣传作用，你们表演的都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节目，特别是表现了内蒙古的生活和斗争，这些节目给广大群众看，他们会得到教育。这两个作用中，更重要的是第一个作用……

为了扶植、培养、推广乌兰牧骑这个新生事物，在周总理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一辆马车的文化工作队》（1964年11月12日）、《乌兰牧骑——文艺工作者的榜样》（同年12月14日）。1965年6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乌兰牧骑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前进》。这期间还发表了《打成一片》等七篇文艺短评和乌兰牧骑在草原上活动的照片。通过新闻媒介反复地向全国介绍乌兰牧骑的方向、精神和经验。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邓小平、陈

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乌兰牧骑。

1965年6月，乌兰牧骑从北京出发，兵分三路，跨过黄河、长江，越过雪山、草原，踏遍祖国山山水水……3支乌兰牧骑巡回演出队，历时7个多月，行程10.5万多里，走遍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祖国的四面八方都曾留下了乌兰牧骑的足迹，宣传革命激情的草原歌舞不但登上了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舞台，还送到福建前线的前沿阵地，大庆油田的钻井架旁，万山丛中的天山牧场和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他们不仅演出，还开展了各种文化服务活动，把各种书刊带到偏僻的山村，通过读报、演幻灯片、展览图片，向广大群众宣传祖国建设的辉煌成就。在农村俱乐部，热心辅导业余文艺骨干。乌兰牧骑队员走到哪里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战壕里为东海前线的战士补衣裳，在深山沟里为农民理发，在火车上他们是义务列车员，在工厂、农村同工人、农民一块参加劳动……

乌兰牧骑用自己的精彩演出，用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当地领导的重视。在边疆山寨，人民穿起节日的盛装，吹起竹笛，弹起大三弦，唱着喜庆的酒歌欢迎他们。阿里高原的藏族人民，跨上骏马，敲锣打鼓，从几十里外去迎接他们。从井冈山到陕北，在当年红军长征的路上，在革命根据地，群众看到乌兰牧骑，就想起了当年的红军宣传队。井冈山根据地的群众，特意从红军战斗过的地方砍来翠竹，送给乌兰牧骑作旗杆，鼓励他们高举红旗永远前进！

乌兰牧骑的精神也得到各地领导的肯定和赞扬。1965年6月29日上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广东从化温泉，接见

了乌兰牧骑演出队。他亲切地询问了乌兰牧骑的情况之后,说:“我看了你们演出,你们的干劲很充沛,舞台上像一团火,充满新鲜空气,民族风格很浓。像《牧马英雄》这样的节目,在别处是没有的,尤其出场式很活泼。你们的方向走对了,我们要跟着学……”

196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沈阳接见乌兰牧骑演出时,满怀激情地说:“我昨天看了你们的演出。两条:一条是欢迎你们,一条是向你们学习,东北的文艺团体要学习你们,不只文化战线要学,医疗、工业、财贸各方面要学习你们。你们最强调的基本功,是政治上的基本功,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这个基本功要过硬,其它就跟上了,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没有这个激情不行……”

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接见乌兰牧骑时,热情地赞扬乌兰牧骑的革命精神充满舞台上台下……

1965年12月初,3个乌兰牧骑完成了在全国各地的巡回演出,胜利地返回北京。周总理的匠心终于开花结果,乌兰牧骑的革命精神传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起乌兰牧骑式的文化工作队,有力地推动了毛主席文艺路线的贯彻执行。

为迎接乌兰牧骑凯旋归来,国务院于1965年12月18日,请乌兰牧骑队员们在人民大会堂东厅,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领导人联欢。

在联欢会上,乌兰牧骑演出了许多节目,其中还有从全国各地新学习的节目。联欢会开的热闹非凡。周总理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你们在全国演出了,了不起。要好好休息。”他还劝勉队员们:“你们

不要骄傲,别翘尾巴,把尾巴夹起来。”队员们把周总理的关心和爱护,记在本子上,铭刻在心中……

同年12月27日晚,周总理又请全体队员们在中南海紫光阁吃饭。饭前,周总理又谆谆教导大家……不要进了城市,忘了农村,坐了汽车,不会骑马了,要不忘过去,不要忘记你们的牧场,希望你们保持不锈的乌兰牧骑称号。文艺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你们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你们还要提高,你们作风朴素,要保持这个作风,所以今天吃饭就吃窝窝头、大烩菜。讲到这儿,总理摊开两只手说:“你们想不到我这个堂堂的国务院总理,用这些东西招待你们吧?”

大家听着都笑了。

周总理说着先拿起一个窝窝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大家也跟着吃起来。这顿饭吃得特别香,吃得光荣而又有意义。队员们都深深地懂得总理的心意都在窝窝头和大烩菜里头……

1966年1月中旬,3个乌兰牧骑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内蒙古党政领导、文艺界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载誉归来的乌兰牧骑。他们为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争了光,为内蒙古争了光!乌兰夫同志向全体队员讲了话。他首先欢迎和祝贺乌兰牧骑到全国各地出色地完成了演出任务,接着谈了乌兰牧骑所以得到党中央和周总理的肯定和全国各地的好评,及热情的鼓励和帮助,根本原因是在党的领导下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分反映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特别是蒙古族人民崭新的生活和火热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文化战线上宣传了毛泽东思想。他向乌兰牧骑提出,现在全国对这方面旗帜

评价很高,都在学习乌兰牧骑,内蒙古各行各业也要研究如何学习乌兰牧骑。乌兰牧骑对自己的工作要一分为二的看,工作做得好也要找差距,要总结经验,还要学习吸取全国各地的先进经验,不断前进,不断提高……

就是这样,在周恩来和乌兰夫的培养扶植下,在60年代,乌兰牧骑走红神州。

乌兰牧骑从全国巡回演出载誉归来不久,一场狂风暴雨向他们迎面袭来。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霎那间,神州大地凄风苦雨,百花凋零……

乌兰牧骑这朵文艺新花,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他们被污蔑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吹鼓手、喇叭队”,“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急先锋”……全区30多个乌兰牧骑被禁止演出,组织上瘫痪了,乌兰牧骑的领导和队员们,许多人被横加上“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关押、批判、揪斗,直至赶回家去或农村改造……

1976年党和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平反了冤假错案。春回大地,文艺百花园鲜花重放。乌兰夫同志继承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再一次肯定了乌兰牧骑的正确方向。他指示内蒙古的宣传文化部门采取措施,把被迫害的乌兰牧骑队员们请回来,恢复了乌兰牧骑的组织和演出活动,乌兰牧骑这面旗帜又重新树起来。

1980年,文化部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内蒙古组织了以鄂托克旗乌兰牧骑为基础的直属乌兰牧骑,除了对原有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节目进行加工提高外,又创作排演了一些新节目,到北京参加汇演。他们在北京的舞台上,以革命化的思想、民族化的风

格、群众化的作风，再现了当年的风采，轰动了首都。文化部的领导和广大观众，纷纷赞扬乌兰牧骑的演出“真是名不虚传”，“不愧是榜样”，“乌兰牧骑这朵花是经得起考验的，是任何黑风、冰雹也摧残不了的。”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乌兰夫同志非常关心如何加强乌兰牧骑的建设，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乌兰牧骑成立25周年之际，他在北京给当时的内蒙古党委书记周惠同志打电话，商议决定举办纪念乌兰牧骑成立25周年全区汇演。演出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化部门纷纷来电、来函，或题词表示祝贺。

邓小平同志为乌兰牧骑题词：

“发扬乌兰牧骑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邓颖超同志抱病为乌兰牧骑题词：

“坚持党的文艺方向，面向基层为广大农牧民服务。”

乌兰牧骑队员们深受鼓舞，他们不负党的重托，人民的厚爱，通过这次汇演总结了经验教训，大大地推动了乌兰牧骑的建设和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内蒙古的乌兰牧骑由“文革”前的30个，发展到近90个，全区各盟、市、旗县、普遍成立了乌兰牧骑和乌兰牧骑式的农村文艺工作队，吸收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壮大了乌兰牧骑队伍。与此同时，他们创作、演出了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节目。演出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农业旗县的乌兰牧骑，根据本民族、本地区的特点，创作演出了群众喜爱的“二人台”、山西梆子和木偶戏。他们深入农村、牧区、矿山和边防哨卡，为群众送

去了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

改革开放的春风也使乌兰牧骑走出去。1981年以来，他们先后应邀去日本、巴基斯坦、尼泊尔、前苏联、蒙古等国和香港、台湾地区演出。1981年5月，内蒙古组织了一个61人的乌兰牧骑小队，带了5件乐器，赴日本演出。在东京演出了8场，能容纳15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就连剧场的过道上也站满了观众。有16个国家的驻日使节观看演出。东京文化界的名流几乎全部出席了开幕式和首场演出，真是盛况空前。

乌兰牧骑在东京的演出，全部是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蒙语节目，其中有独唱、独奏、独舞、男女声二重唱、民族乐器小合奏等。每个节目演完后，观众都报以长时间的掌声。东京大学的教授、研究东方音乐的著名专家小泉文夫先生，为乌兰牧骑的精彩表演和热情服务所打动，他穿上蒙古袍子，戴上蒙古帽子，登台为演出报幕，台上台下欢声雷动。

乌兰牧骑的精湛表演和它的风格与形式，令日本观众耳目一

新，倍受赞扬和推崇。东京的电视台和《朝日新闻》等新闻媒介，纷纷报导、评介乌兰牧骑的演出盛况，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乌兰牧骑在日本的演出，更鼓舞了旅日蒙古族同胞。一位蒙古族老人感叹地说：“我有40多年没有听到家乡的歌声了，没有看过内蒙古草厚的面貌了。坐在剧场里观看你们的演出，仿佛置身于阔别多年的草原上的家乡。”一位穿着和服的蒙古族老人，看完演出，在剧场门口紧紧握住乌兰牧骑领队金海如的手，泪流满面地说：“今生今世我一定回内蒙古草原去看看。”还有一位旅日蒙古族学者说：“中国解放几十年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家乡的蒙古族艺术家到日本来演出，不仅传播祖国的文化艺术，增进中日友谊，也使我们扬眉吐气，感到民族的自豪。”

乌兰牧骑，你是文艺工作者的旗帜和骄傲！我们祝愿这面文艺红旗，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强两个文明建设中，更加鲜艳、璀璨、辉煌。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乌兰牧骑演出
（左二为周恩来，左一为布赫）

我国音乐美学的开路人何乾三

●程迺欣

1988年10月,国际现代音乐节在香港举行。在同时举行的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关于音乐问题的研讨会上,讨论作曲问题时,有人发言说作曲家没有必要学理论。一位眉清目秀的中国妇女,当即起身反驳。她的侃侃而谈,恰似音乐美学的一篇宣言,令与会者耳目一新,不由得热烈鼓掌,会后还与她频频握手致意。

这位女士在发言中,说到她正在翻译国际音乐美学权威L·迈尔教授的《音乐的情感与意义》一书,并讲到自己在迈尔教授课堂上的感触。她说:“在我那班,只有两个访问学者,一个来自波兰,一个是我,来自中国。每当教授讲到肖邦时,同学的目光都满怀敬意地投向那位波兰学者;偶尔提到孔夫儿时,才投向我。我感到十分难过,也有些难堪,教授在讲课的全过程,就没有提到任何一位中国音乐家的名字!那时我多么盼望:有一天,我们华人中能出现被世界公认的音乐家、作曲家——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就全都朝我们看,让我们也风光风光!”她激动起来,几乎是大声疾呼:“我们搞作曲的,也应当学点理论,充实和丰富自己,争取高水准——达到世界水平!”

她的激情像一把火,点燃了与会华人音乐同行的心。人们纷纷询问她的译著情况,台湾出版人还当场找她联系出版该书的事……

她,这位貌不惊人却具有非凡精神力量的中国女性,就是我国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前副主任、中国音乐美学专业的创始人之一何乾三。

一

她对美学的兴趣,是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时,由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论著引起的。那时,她是外文系的学生,所有功课都学得扎实、轻松而成绩优异,因而有很多时间读课外书。但她并未想到,当然也不会想到,把美学与音乐联系起来,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课题。

她自幼喜爱音乐。一入初中就开始学风琴,继而学钢琴。高中毕业时,她同时考取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和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母校华英女中希望她学好外文将来回校任教,愿为她提供赴宁的机票和四年学习期间的奖学金,于是她成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

她在南京迎接了解放,不久就和一批热情的大学学生“投笔从戎”了。她曾先后在陆军和海军文工团乐队任钢琴伴奏员——无钢琴时则吹长笛。这个一向“拔尖”且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年轻姑娘,实在不满足于当时的水平,所以,当领导号召在职干部进大学深造时,她兴奋地报考了,并一举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

经过一年学习,她便申请转入五年制的音乐学系。笔试通过后,她在口试考场上,面对该系的全体教授,流畅地回答了近两个小时的轮番提问。在回答“为什么转系”的问题时,她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搞音乐美学!”

满座皆惊。连主考教授张洪岛也感到意外,他认真地说:“这非常非常难,你搞得了吗?”

何乾三不服气,但仍平静地说:“如果真搞不了,我就到文化馆去做普及工作……”

其实,在她心里,就没有“真搞不了”的事情。她明知音乐美学当时在我国还是空白,但她坚信,只要自己有决心去研究,迟早会搞出名堂来的。

只是由于历史的耽误,何乾三25岁时这个绚丽的梦,到她46岁时才变得不再渺茫。

二

1960年,她尚未毕业就被安排在本院讲授艺术概论和音乐评论。这在“培养音乐家的摇篮”的中央音乐学院,是少见的。谁料到,通向理想之路刚在她面前铺开,噩运就不断袭来。先是在“文革”初期,她作为校党委成员被“打倒”,名字上被打叉的大标语竟一直贴到天安门广场。而后,是躁动的胎儿,因医院拒收不得出生而憋死腹中。接着,因躲避抓捕逃往上海,累得大出血几乎丧命。最后,是一张医院诊断书,宣布她患了乳腺癌。

她接受医生规劝,做了彻底根治的手术。



1994年12月在香港“中国音乐美学研讨会”上发言

1978年，中央音乐学院恢复建制。当时由于中国音乐学院的并入，艺术概论有了教师，何乾三便“趁机”邀约两名同道申请开设音乐美学课。她向系主任张洪岛：“还记得当年口试我时的情况吗？现在是不是可以搞音乐美学了？”老教授当然未忘当年。只不过，如今，对眼前这位饱经政治磨难和病痛折腾而痴心未改的学生，他已不再怀疑，而决心鼎力相助。

何乾三和她的同道张前、李大士，要正式开设课程，建立学科，而他们拥有的，只是几本50年代译出的苏联、东欧的音乐美学资料。所幸的是，院长赵枫支持他们，同意给他们时间准备，同时希望他们进一步争取音乐界的理解和舆论界的支持。

他们到文化部接待处，要求会见林默涵副部长。

“你们有什么冤枉呀？”这位副部长，照例这样开始了他对上访者的接见。

他们忍不住笑了。他们不是为平反冤案来“上访”的，而是为了通过部长寻求文艺界的支持——他们要开设音乐美学这门课程，从而在我国创建音乐美学这一新学科。

他们的“申诉”，使部长深为感动。他答应给予支持，并鼓励他们“勇攀高峰”。

艰难的跋涉开始了。何乾三分工搞西方音乐美学史。

她频繁出入图书馆查找所需资料。在此基础上，她编译了《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一书，于1983—1984年出版，并三次再版。同时还参加编译了《音乐美学——外国音乐辞书》中的九个条目。

1979年，听说蔡仪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举办全国第一个美学研究生班，何乾三和张前两人争取去进修了一年。她同时还去北大听哲学系美学课，去北师大听逻辑学，并参加了研究生班的英语学习……

在1979—1981年间，学院仍排了她的音乐评论课。她出去当学生，回来当老师，还挤出时间来着手编选《音乐美学资料》。

通过学习、思考，对我国美学界分别以朱光潜、蔡仪、李泽厚为首的三个派别的比较，何乾三找到了自己兼容并蓄的美学之路。

1980年，何乾三和于润洋、张前、蔡仲德等一起，在学院里举办了音乐美学系列讲座。张洪岛教授开讲第一课时不无激动地说：“这是中国第一次开设音乐美学课，这件事，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应该写上一笔！”何乾三的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又充满感情。一个

学生在多年以后回忆说：“我当时根本不懂美学，但被何老师的学识、口才和思辨力完全吸引住了！”

这年底，中国音协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音乐理论工作会议。距主会场5里地外设有一个分会场——这显然包含着林默涵副部长所允诺的支持——“音乐美学小组”在这里正式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与会者十几人，形成了这门学科在我国的第一支基本队伍。许多地方请他们讲课，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成功！

三

1982年，在院内开设《西方音乐美学史》这门课时，她已进入“知天命”之年，而她的职称，因专业交换的影响，仍是讲师。献身音乐美学的主旋律，压倒一切凡俗噪音的干扰——她仍起早贪黑地努力充实自己，大量读书，到处听课，继续勤奋地向新领域的纵深处开拓……

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健康状况。生活不规律，劳累过度，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11年前胸部手术留下的伤口，此时竟由于一次游泳时的感染而溃烂了。当初，该补皮而未补；如今，却不得不从腿上割下一大块皮来往胸上补了。而她，就这样，带着血，忍着疼，依然拼命地学习着，工作着。

使她欣慰的是，学习有收获，工作在进展，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前辈美学家的关注和支持。在应邀去北大研究生班讲音乐美学时，何乾三独树一帜，把音乐的特殊性放在与文学和美术的比较中来讲解。宗白华教授听了以后，鼓励她说：“比较的讲法好。与姐妹艺术作

比较，很好！以后还可作中西比较。”

在她准备讲授《黑格尔的音乐美学思想》这一专题时，曾通过杨辛教授，向朱光潜先生借书。朱老慷慨地把自己新译而尚未出版的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中有关音乐部分的手稿借给了她，有80页之多。这对一个后学者来说，是多么大的信任和鼓舞啊！她讲完课，将讲稿整理成一篇3万字的论文，转请朱老过目。朱老看后，兴奋地说：“她读书细致，文章写得很有意思。我很高兴音乐界这么快就对我刚刚译出的黑格尔音乐美学思想作出了反应。”不久，这篇文章就发表了。

何乾三对前辈很敬佩，但不迷信、盲从。她在读朱老的译文时，发现某些音乐术语未用已经通行的译名，便抄列下来，写信给朱老寄去。朱老回信高兴地说：“正好在最后一次校阅译文，我采用了你提供的有关音乐的译名。”

蔡仪教授对他们开创音乐美学学科的努力，更是一贯热情支持。他说：“音乐是抽象的，美学也是抽象的，音乐美学是抽象的抽象，是很难搞的。我支持你们搞，期待着你们有所突破。因为现在搞美学的人，一般是懂点文学，也懂点美术，但一碰到音乐就不懂了；你们如能有所突破，对整个美学领域都大有帮助。”

每想到这些鼓励和期待，何乾三都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生命的发条，能不拧得更紧吗？

四

1985年3月，院里任命何乾三为音乐学系副主任。适逢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来院访问，她受命接待，并担任翻译。没想到，她所胜任愉快的这项工作，为她打开了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门。

当这位院长得知她的丈夫、也是音院教授的钟子林，目前正在密执安大学作访问学者，便随口问道：“你为什么不去呢？”她说：“我不愿以家属的身份去。要去，就得自己作访问学者！”

这引起院长极大的敬意。他当即表示，可以邀请她到耶鲁大学去作研究，但国际机票和生活费用需要自己解决。

何乾三满心欢喜。她正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相信那边的研究条件肯定要比国内优越。

1986年4月，她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先到密执安大学，与在那里讲学的丈夫会合，作些访问的准备。4个月后，丈夫回国了，她便去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正式进修。同时找了份业余工作：指导一个学中提琴的学生写有关提琴与二胡比较的论文，还给他讲中国音乐。

原订半年的进修期，她嫌太短了，便又延长了半年。在这半年里，她开始每周一次从纽黑文乘车去纽约，到她最崇敬的音乐美学权威L·迈尔教授家中上个别课。

由于丈夫留下的2000多美元几乎全部被歹徒劫走，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习，并且还准备去迈尔教授所在的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再进修半年，她同时在服装店和洗衣店找了两份工作。

日程往往是这样的：清早，赶车去纽约，上两小时课后，再匆匆返回，直接去洗衣店上工，干到晚上8点，随便吃点东西，再开始搞专业。不去纽约的日子，上午就去服装店。在那里，主要是整理开架出售的服装，只能站着干，半天下来，早累得腰酸腿疼了。好在洗衣店到下午4点以后才有活，在此之前，她可以坐在洗衣机旁的高凳子上，一边休息腿脚，一边翻译迈尔教授的专著《音乐的情感与意义》。

这本书，早在中美开始文化交流的1978年，她就从来院访问的美国学者的赠书中发现了，现在才知道它的影响之大，几乎被奉为音乐美学的《圣经》。而对她说来，不精读这本书，就无法完全听懂教授的讲解与辅导。所以，她决心趁从师于教授的机会，赶快将它译成中文（此书已于199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碰到问题就当面向教授请教。

这样的学习，真是最大的快乐，但她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往往为了节省一两块钱车费，要步行很长的路，以致在半年时间里，她硬是穿破了两双布鞋、一双球鞋！而胸口的伤痕，仍未愈合，还不时流血，在跑路跑得大汗淋漓时也不能痛快地洗个澡，真是难受极了。

可是，当时已55岁的她，从不叫苦。为了在祖国创建音乐美学新学科这个明确的目标，她以苦为乐。

当她终于攒够了钱，到费城去进修时，她安排好最低消费的生活，不用再打工了。深为她自立自强、拼搏向上精神所感动的迈尔教授，为她争取了一间工作室，并保证她随时可以听课和利用图书资料。她有条件全力以赴地学习了。于是她不仅听迈尔教授的大课，而且仍上他的个别课，还听其他教授的音乐分析课，同时在一个进修班学英语。

1988年2月回国时，何乾三没有得到什么学位，她只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准备开设的《20世纪西方音乐美学思想》这门新课，已经在她脑海中初步酝酿成熟。以后她曾多次应邀去其他高等院校举办音乐美学讲座，扩大了这门学科的影响。

五

1992年，当了18年助教、8年讲师、6年副教授的何乾三，终被晋升教授了。她又为研究生开了一门新课《西方音乐美学史文献选读》，辅导他们直接阅读原文资料，以便更快更好地了解这门学科目前的发展状况。

这一年，她向洛克菲勒基金会下设的亚洲文化协会，提出赴美研究《20世纪美国音乐美学》专题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基金会的两名代表用英语提问达两小时之久，她应对自如，使他们非常满意，对她说：“你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一定认真考虑你的申请。”这时她才发觉，其中一人原来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只是为了考察她的实际英语水平能否胜任这项研究，才故意不说的。

1993年，她应邀赴美，这次是和丈夫钟子林同行。他们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遍访了全美的知名大学，访问了有影响的音乐美学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及哲学家等40余人。收获之大，超过了原来的想象。

在旧金山时，他们由在美定居的过去的学生陈怡介绍，住在参议员马可思的家里。这位因政绩卓著而连选连任达35年之久的老议员，听言观行，认为他们做学问认真，从事文化交流肯下功夫，成绩斐然，便决定以加州和他的选区的名义向他们颁奖。1994年5月5日，他专程从州首府克利曼陀赶回来参加颁奖仪式，同时隆重宣布将这一天定为“钟子林、何乾三日”。

何乾三在兴奋之余，更深地感到，要使我国音乐美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真正与国际接轨，还要进行不懈的攀登。

在预定回国的日子到来之前，他们又决定再延长几个月。何乾三忙着进出图书馆，通过电脑查出自1746年以来用德、英、法三国文字出版的有关音乐美学的全部书目，共736本；自1908年以来出版的音乐心理学书目，共252本；还有每年都出版几十本的音乐史书目……她从中挑选了

最有影响的著作40余本，从图书馆借出，全部复印下来。这是个大工程，费时费力，但比买书要节省三分之二的钱呢！

为了建立音乐美学这门新学科，何乾三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她仿佛就是为此而生的！

自美归来之后，刚调整过时差，她就又投入了写作。这篇题为《音乐的情感初探——再读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论文，是为1994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中国音乐美学研讨会”准备的。她希望能借此与其他同志一起，展示出我国音乐美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1993年，国家教委在评选高等院校（包括文理工农等各种学科）的优秀教学成果时，给何乾三所在的这个小组评了国家级一等奖。

这些年来，何乾三发表了有关音乐美学的论文和音乐评论共50余篇。目前，她正在撰写自古希腊到19世纪的《西方音乐美学史》专著，还准备撰写《20世纪美国音乐美学概述》。她立志，要在两项巨大的工程中，体现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的优越性，形成音乐美学的中国学派所独具的特色。

何乾三希望并相信，经过集体的努力，一定能够在国际音乐美学领域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以无愧于我们具有5000年灿烂文化的伟大祖国。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凌辰）



1994年6月在美国芝加哥与音乐现象学学者F·约瑟夫·斯密斯教授交谈



访擅写帝王的作家二月河

● 韩 湾 冯兴阁

1994年2月21日，根据作家二月河的四卷集系列长篇小说《康熙大帝》改编的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开始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引起反响。影视界、文艺圈内对这部电视剧褒多贬少，争议不一。随之而来的是，文学评论界开始对原著的艺术性探讨，沸沸扬扬。

近日，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又重播《康熙大帝》，收视率仍居高不下。为此，笔者走访了作家二月河。二月河何许人也？港台地区称他是“文坛一杰”，大陆评论家干脆叫他“文坛怪杰”，冲向文坛的“黑马”。

今年整50岁的二月河，本名凌解放，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现任河南省南阳市文联主席。他那壮实的体格，浓眉大眼的富态相，显示出热情、豪放的气质以及旺盛的创作力。

自1984年起，他的帝王系列长篇小说《康熙大帝》（四卷本）已由黄河文艺出版社5次再版。并由台湾巴比伦出版社出了海外版。

《雍正皇帝》（三卷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业已第三次再版，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出了海外版。而《乾隆皇帝》第一本又于去年10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几年来，二月河已写出八本书，300多万字，第九本正在他的生花妙笔下孕育着……

记者问他为何被称为“黑马”时，他笑了：黑马“卧槽”，令人防不胜防。

二月河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参军入伍，当了10年工程兵，挖煤、筑路、修桥、盖房，很苦，很累，但磨练了意志。同时，部队图书馆里古今中外的名著也让他翻了个遍。“二十四史”读了，《安娜·卡列尼娜》也看了，马列选集中的一些篇章段落，他现在仍记忆犹新。

在《康熙大帝》由台湾巴比伦出版社出版时，他写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

“……假如这世上有人曾经始终和我同路跋涉过艰难人生（唉……很遗憾，没有）。他就能告诉你，我其实原本是个痴人。他会告诉你我是怎样一个读书狂，在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不曾在凌晨一点半睡觉；告诉你我曾被管理员遗忘关扣在图书馆中，不自知晓；告诉你我捧书走路，踢掉了脚趾甲，血流殷红而浑然不觉。假如他看见我裁开包水泥的牛皮纸袋作卡片，一字一句地摘录那些劈柴（按，指古典书籍）纹理，他就只能如实说二月河不过是文坛一痴”。

有“痴”才有“怪”，有勤奋才有天才。可以说，他的能称得上作品的“处女作”，竟是一部长长的历史题材的小说，并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的确让人振奋，让人惊讶。

他的《康熙大帝》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他的后两部“帝王小说”一出手就使大陆及港、台出版界抢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月河对清史的兴趣，是从研究《红楼梦》这部奇

书开始的。此前他一直悠游于两汉及两晋史中。他的“红癖”和凡事拼命追根溯源的秉性，终于使他在浩如烟海的清史资料中“乐不思蜀”了。

1982年，凭着19万字的研究手稿，使他成为中国红学会的理事。“可惜，我现在没时间研究它啦”。二月河笑着说。

也就是在1982年，中国红楼梦学会在上海召开学术研讨会。会上，偶尔有人说，康熙这样一个以出众的才华和文韬武略，开创了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鼎盛时期“康乾盛世”的人物，居然至今没有一部关于他的象样子的文学作品问世，真是奇哉怪也！这时的二月河刚过而立之年，气血皆盛，竟挺身而出“大言海口”，我来！在清史专家冯其庸先生的鼓励下，二月河费尽十几年的心血，先康熙、再雍正、后乾隆，一发而不可收，他奇迹般地成功了！

当记者谈及文学创作的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的差异时，他指出，现实题材以个人社会阅历为基础，而历史题材则以作者的历史阅历为基础。

二月河说，写历史故事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创作过程中把现代生活、现代思想意识，包括自己对历史对现实的一些理解融合进去，使作品更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帝王的生活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时的回光返照，从纵的和横的切面写历史，是以史为鉴，给现代人以启示。

二月河的生活阅历和历史阅历很深厚，所以写出的作品也很厚重。他谈到读者给他的来信中提及看了“帝王系列”，能在商战中得到启迪，在生活中得到警示。他感慨地说，那是一种感应。当然，作家倾注满腔心血酿就的精神产品对读者是会有好处的。只不过读者各取所需罢了，因为“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

二月河有“怪才”，但他为人处事并不怪，很富于感情。当他谈及台湾一位家庭贫寒的姑娘靠打工挣的钱买了一套《康熙大帝》，爱不释手，给他写信说，如果别的书损坏了丢失了，他会大哭一场的；如果《康熙大帝》损坏了丢失了，他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呢！读罢来信，二月河感动地回信说，书很贵，不要把打工的钱买这小说，顺便又

寄去了一套他的其它著作。“当我看了读者感情真挚的来信时，不回信或不给一套书，心里很不安。实际上，你们已经看到了，我的书我自己还没有收全呢。”

现在，二月河的创作日程已排到了2003年，在“帝王系列”大功告成之后，他将提笔再写“将相系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几个人是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写他们，牵扯到诸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大事件。如果这三个人写成功的话，一部活生生的近代史也就矗立于读者面前了。

《康熙大帝》是成功的，否则不会被几十万读者认同，也不会有导演林鸿专程到南阳来洽谈合作事宜。对于小说与影视联姻，二月河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他说，小说再畅销，读者面也有局限。通过影视手段这种更为先进的宣传途径，可以向男女老幼、各个阶层、各个层次的人们展示文学作品的风貌，不失为一种进步。当然影视和小说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如果拍得好，也能促进图书市场的发展。

顺便再给读者解道谜，凌解放，笔名为何叫二月河？答案：河里的冰凌在二月时解冻，那时，河里涨满了桃花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二月河正创作《康熙大帝》，心里也解放了，正如二月河春水融融……

（责任编辑 丁 末）



作家二月河（中）与本文作者韩涛（左）、冯光阁（右）

爱国情怀总是诗

——记文史研究学者许华

●周云龙



许华先生（万元俊摄）

面值 50 元人民币的背面图像是国家级景点山西吉县黄河壶口瀑布。在这里，不久将矗立起一座石碑，其上镌刻着一篇洋洋千言的绝妙文章——《壶口瀑布记》。该文的作者便是现居江苏省东台市的爱国学者许华。

其实，东台自古便是藏龙卧虎之地。宋代的范仲淹曾在此主持过盐政，其百世传诵的《岳阳楼记》，启示人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0 世纪 90 年代的今天，寄寓台城的许华又写出洋洋千言的《壶口瀑布记》，旨在激励人们“老思益壮，少勉争先”，“共效大禹而奋祖鞭，开拓乾坤，振兴华夏”。

许华，又名许诒殊，祖籍湖南湘乡。其祖父是前清的翰林学士，其父许君武先生是抗战前后文化、教育、新闻界知名人士，被誉为湖南三大才子之一。1949 年去台湾后，历任台湾清华、东吴、淡江等大学教授，与梁实秋等人并称为台湾“四大文学国宝”。其母陈韵篁女士，系著名民国人物陈家鼎之独生

女，以诗文和书法名重于时。如此家世门第，本为许华铺就了闻达显赫的人生道路，但由于爱国的天性和革命思潮的熏陶，他及其两兄两姐都毅然背离家庭，投奔革命。尽管他后来的遭遇十分不幸，可他牢牢扼住命运的咽喉，始终不悔，并且特意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不悔斋”。笔者笑问其意，许先生极为认真地答道：“一不悔当年参加革命求报国，二不悔放弃留港出洋自逍遥，三不悔长此安贫乐道居小城，四不悔埋头文史典籍苦笔耕……”说罢，爽声大笑。从坦荡的笑声里，笔者分明感受到许先生那炽热的爱国心。

言为心声。《壶口瀑布记》便是其爱国思想最清晰最诚挚的流露。1992 年秋天，他偶然间看到山西吉县征集“壶口瀑布碑文”的启事，当即思绪万千：近世以来，时风不正，民族文化危机日甚，目前更是拜金风盛，人心不古。当此之时，更应强调中华文化的振兴，而壶口瀑布的壮丽雄浑正是我国黄河文化的象征。于是，他赶紧搜集有关资

料，以大禹辟山造壶口的史实，引古喻今，借题发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立意、文体既定，他在一夜之间便将《壶口瀑布记》初稿一气呵成，文章揉合齐、梁、唐、宋的风格为一体，亦骈亦散，既富有文采，又述理深刻。1993年10月，许华先生应邀赴山西参加在吉县举办的首届壶口黄河漂流节暨壶口瀑布征文颁奖大会，作为5名一等奖得主中的第一名，许华受到了隆重的礼遇。

如今，《壶口瀑布记》(附后)尚待刻碑，但文稿早已不胫而走，流传于海内外。一时间，“洛阳纸贵”，有识之士赏读不已，一些知名人士纷纷来电来函给予极高评价。台湾专栏作家协会主席魏睽九先生，还

将此文推荐给《中央日报》发表。

许华自少年始就积学超群。他的许多诗词早已发表于海内外报刊，并被选入《中国当代千家诗精选集》。他为抨击“台独”而作的政论文《政治流氓搞流氓政治——致民进党的公开信》和《民意乎？阴谋也！——拆穿“直选”西洋镜》，先后刊于香港《星岛日报》、台湾《荣民时报》的显著版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也收藏了这些文章。

这些年，许华依然以书作伴，研读不辍。他远离诗界，深居简出，但腹中文化使命感、人生求索欲仍不绝如缕。与他相对而坐半天时间里，笔者试图发现他与与众不同的地方。然而，他的确朴实无华；瘦削的脸庞，犀利的眼神，并无过人之

处，以致在茫茫人海中，默默地走过了60个春秋。在我静静地听完他对往事的追忆后，又不禁感慨万端：早年为追求真理，向往革命，许华做过书店学徒，后因种种错谬因缘，致使他命运多舛且经历复杂。他参加过军，当过教师、演员，做过煤矿工人，……坎坷的遭遇固然使他积累了超乎常人的生活阅历，然而，从一个普通的企业职工到今天成为名声远扬的学者，其精神支柱是什么？除了爱国思想和天资才华之外，恐怕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苦学不无关系。许华先生常常自言自语：“孔子说‘困而后学’；欧阳修说‘穷而后工’，我就是两者兼之”。——这又何尝不是许华先生的成功之道呢！

(责任编辑 赵友慈)

附：

壶口瀑布记

壶口之为山名者，天下有四，皆在晋南。而壶口之为名山者，天下唯一，即吉县之壶口也。山延吕梁之脉，扼黄河成瀑布，恰当晋陕界。出吉县城西，有公路达壶口，瀑布景区在焉。登临之顷，轰然赫然惊人耳目者，直落千丈龙槽之飞流也。总景区孟门双月、晴天彩虹及宋、明、清遗址诸景，合自然与人文之景观，皆赏心悦目之佳境，故中外游人络绎于途也。然壶口瀑布之名于世者，非徒景观之胜也。其史实故事，脍炙人口，亦有可称可记者焉。

盖我赤县神州，得天独厚，终古无穷，钟灵毓秀。其以方千万里六合之氤氲而育成之者，或贤杰伟人，立圣德丰功于百世。或山水胜地，争奇观胜状于万国。此殆我中国之所以为夏为华也欤。予平生慕

英哲而学文史，爱烟霞而游南北。尝读《禹贡》而知此壶口，又尝过吉县而观其瀑布。乃知壶口瀑布实合伟人、胜地二者所成就，以史实与景观併壮而美而名于世者也。

《书·禹贡》曰：“既载壶口，治梁及岐。”盖昔当虞世，洪水为患。禹承舜命治河，以睿智坚毅，躬亲力行，辟山凿岩，疏壅导流，终平河患。今此之壶口瀑布，即大禹凿以导河之绩也。《吉州志》曰：“河势北来，至此全倾于西崖。奔放而下，约五六百尺，悬注深旋，有若壶然。”山故以此而得壶口之名也。传闻大禹治水，新婚别妇，三过而不入之家门，即在是山之左近。今虽已无从觅其故居遗址，然其伟绩与佳话并传千秋万世而至今仍焉。孟浩然诗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而今之我辈所登临之

此壶口瀑布，非江山自留之胜迹，乃得之于天生伟人大禹之力也。然而，使造物无山河之设，必无洪水之来、吕梁之壅，则虽伟如大禹者，将何由施其智能而成其功名哉？此所以天宠我神州而故为全之者也。亦所以到此登临之寰海嘉宾所必知识、而我炎黄子孙所必为之感奋奋者也。

嗟夫！予故知古今我仁人志士作壶口游者，或仰飞流，疑女娲之漏补；或俯急湍，惊白驹之易逝。俯仰之间，其必发经天纬地之思，怀继往开来之志哉。当此之时也，白首临风，想曹公而歌伏枥；红颜观瀑，思孟母而畏断板。其者庆盛世如今，祭久安之河伯；或诸怀英才到此，竞遥望乎龙门。浮想遐思，要必老思益壮，少勉争先，共效大禹而奋祖鞭，开拓乾

坤，振兴华夏也夫。此诚可谓景能生情，物可励志也。予平昔所闻之高山大瀑，未有如壶口瀑布之如此动人情志、发人省悟者也。何则？盖黄河蓄千里之势，突险破隘至此，沸沸汤汤，不可制矣。于是涌万顷之波，如卷风云而来；下千仞之崖，更腾龙虎而去。其磅礴惊天之气势，雷霆动地之涛声，令人于荡胸决眦、动魄销魂之际，忽悟顿识我中华民族精神之伟大，文化历史源流之久长，自豪自励之情志，必油然而生矣。至若闲情逸致之来也，亦尽可寻奇探胜于游踪之所至，必觉四季尽宜乎人，而万物皆备于我焉。于是或迎仲

夏晨风，或踏隆冬夜雪；看怒瀑之飞珠，驰神合浦；临惊涛之激湍，却步龙槽。人少年不负春光，倚彩虹留佳侣之影；我晚岁宜当秋色，对落照赋大河之诗。傍古迹坐日月之出没，目高禽逐天水之沉浮。在在绝妙之气象风光，令人游则留连忘返，去则迢迢梦在。千载以还，壶口游人虽位别尊卑，志异取舍，而此情此感则或同之。唯壶口瀑布共天地悠悠以长流，而过游者踵迹代谢成古今。嗟乎！物不以人之贵贱而异态，人难共物之久长以永生。念兹益当有守有为，求三不朽焉。今吉县微壶口瀑布

碑文，予乃作此记，颂壶口之伟成，状瀑布之殊胜；藉述往昔之德，以期来贤之功；庶此胜地播远誉于万方，垂嘉名于百世也。

噫嘻！吉县壶口胜地也，微文刻碑盛事也。予昔曾游其地，今复与其事，何幸如之。谨以《玉楼春》词一网为记之来云尔。黄河水决灵天处，大禹辟山成瀑布。尽从壶口泻如倾，长续神州今与古。登临景物生情愫，开拓乾坤追步武。飞流直落看惊涛，跃起渊龙胜峡虎。

湘乡许华诒殊壬申年八月初三日记。



壶口瀑布（《北京日报》文体部宁明摄）

扬起一面中国帆

● 刘永路

他是第一位代表中国海军乘外国军舰环行太平洋
他在惊涛骇浪的磨炼中闪烁着中国军人的荣耀
他从“埃斯梅拉达”号带回国旗、奖章和证书
而在太平洋上——

阳光下，29面白帆高高升起。著名的“埃斯梅拉达”号——智利海军远洋航海大型风帆训练舰踏着黄浦江的轻浪，徐徐驶离上海港。

1993年7月17日上午，扬子江码头高奏欢送曲。上海军民隆重地为第四次途经上海的这艘白色友好使者送行，祝福她顺利完成举世瞩目的环太平洋航行。

甲板上，300多名来自大洋彼岸的官兵整齐列阵，队首一位身高1.84米、身着中国海军制服的中尉军官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刚刚登舰的中国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在读研究生苏银荣。

智利海军有个惯例，每年进行一次帆船环大洋航行训练，邀请所经各国的一位年轻军官或毕业学员参加。于是，苏银荣，这位普通农民的儿子、我海军优秀毕业学员，成为第一位代表中国海军乘外国军舰环太平洋远航实习的幸运儿！他在历时4个月、航行16500余海里、途经4国9个港口的扬帆远航中，经受了一次非同寻常的风浪洗礼，他在只身远离祖国的大洋上，为祖国扬起一面骄傲的帆！

“第一顿早餐”

排水量3670多吨的“埃斯梅拉达”号训练舰，被誉为“智利海军军官摇篮”和“流动大使馆”。30多年来，这艘列入世界十大帆船之一的训练舰，已成功地访问了世界300多个港口，培养了成千上万名海军学员。此次是它第38次环洋

远航。

智利海军规定，学员在毕业之前必须在这艘舰上进行半年以上的远洋航海训练，以培养他们的基本航海技能和适应海上艰苦环境的素质。舰上有4根高达48.5米的主桅可悬挂29面巨帆。每日无论刮风下雨，学员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爬越第一根主桅杆，这被称为“第一顿早餐”。

然而，中国没有这种风帆舰，苏银荣虽有上乘军舰万里远航的经历，却从未受过这种训练。

“苏中尉，不要拿生命去冒险！”苏银荣上舰伊始，睡在他下铺的美国海军少尉博特哈就多次告诫他。这位老外学员上舰已两个月，至今不敢爬桅杆。

可是，第一天早操，当全体学员的目光投向新上舰的中国学员时，苏银荣把心一横，毫不犹豫地走向第一座主桅杆走去。没有安全带，也没有保险绳，他用双手抱住粗粗钢杆，一脚踩着一架绳梯，吃力地向上攀登。爬到29米高处时，桅杆出现了90度的转折，必须仰面攀行4米，才能继续向上爬。苏银荣早已大汗淋漓，整个人好象悬挂在海天之间。他半道败下阵来。

次日凌晨，他倔强地走到了桅杆前，又爬到29米高的转折处，突然，绳梯断节，他一脚踩空，幸而双手紧紧抱住桅杆，才避免凌空摔下海去！

第三天早操，一向只在重大场合才露面的布朗舰长亲自到场，轻轻拍了拍苏银荣的肩膀说：“苏，我相信你会把中国海军的素质显示

出来！”舰长的目光充满友好和希望。

320多道蓝色的灼热目光聚集而来，他们都看着中国。苏银荣只感到周身热血沸腾：“为了祖国的荣誉，豁出去了！”他大步向桅杆走去，一鼓作气爬上了48.5米高的桅杆！

当他双脚落到甲板的时候，全舰官兵报以热烈的掌声。舰长上前握住他的手说：“苏，祝贺你成功！”

比赛结果 ——中国获胜

苏银荣上舰的第二天，就担任了见习航海长值更，主要任务是每隔15分钟测一次真风。

“报告一下风向风速！”舰长的话音刚落，苏银荣就报上了数据。

“唔？”舰长用疑惑的目光望着他，一般人每次测算大约需要半分钟，“苏，你的数据准确吗？”

“我认为不会错！”

舰长命令值星官用舰操图推算了一遍，两者数据完全一致。“苏，你怎么算得这么快？”

“喏，用它！”苏银荣亮出了他随身携带的PC1500简易计算机，“我自编了一个程序，只需敲一下，数据就出来了！”

“你业务很好，人也聪明！”舰长颇为赞赏，“今后你就来驾驶台值更。”

此消息迅速传遍全舰，有几位智利学员不服气：“苏中尉，你敢不敢和我们比试一下电子计算机？”

苏银荣接受挑战。这天晚上，他和一位智利学员比赛用电子计算机将5位数排序。不到5分钟，苏银荣就把答案打了出来。再看那位学员，还在画方块流程图呢。裁判用英语宣布：比赛结果，中国获胜！”



智利国家报刊登的马丁上将接见苏银荣的照片

“溧阳”号上同胞情

智舰继续航行，徐徐驶入马来西亚第二个港口——巴生港。全体舰员在甲板列队站泊。突然，一面五星红旗映入眼帘，苏银荣认出，前方停泊的万吨轮是上海远洋公司的“溧阳”号。他面对国旗庄严地举起右手。

正在轮船上指挥卸货的水手长是位转业军人，他发现智舰舰桥上有位穿中国海军制服的军官正朝五星红旗敬礼，他惊喜地使劲挥舞手旗。水手们也都停下手中的活计，兴奋地朝智舰舰桥上挥手致意。

智舰靠在“溧阳”轮前两个泊位。一会儿，从“溧阳”轮跑来两名水手，要求找中国海军中尉。他们一见到苏银荣就问：“你是中国海军吗？怎么在智利舰上？”接着又问：“舰上生活苦不苦？你需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苏银荣向亲人倾吐衷肠：“苦，累，想家，想亲人，尤其想念家乡的饭，家乡的水……”他告诉亲人，舰上没有自然

淡水，也没有开水，喝的是化学淡化海水，我常闹肚子。可又不舍得象老外那样靠吃零食补充热量，一块杏仁巧克力就2.5美元，我买不起。我最怕靠码头，因为一靠码头伙房就停伙放假，上街吃一顿饭要花二三十美元，对老外来说轻轻松松，可这相当于二三百元人民币呀！我只好一天吃两顿饭，而且要避开他们到小摊吃最便宜的。你们问我钱？哦，我们海军发的经费都存入舰上的银行了，那是用于正常开销的，我哪能随便花呢……”两位水手动了情，他们邀请苏银荣到“溧阳”号上作客。

次日，苏银荣赴约。船长邀请他和全体船员共进午餐，还特意吩咐伙房加了两道菜。苏银荣狼吞虎咽吃了三大碗，家乡饭吃得特别香。

跨越赤道的洗礼

8月17日北京时间18时34分，一声汽笛长鸣，“爱斯梅拉达”号通过赤道。全体舰员在主甲板集合，由舰长主持为苏银荣等5名首

次通过赤道的官兵举行别开生面的洗礼。

一位61岁的老水兵扮作神父，下令：“把苏拉出来！”十几个扮作鬼怪的水手把苏银荣等5人从人群中一一拖出，扒光上身，用橡皮狼牙棒、大刀一顿砍杀，然后将其推到用木板围起的12平方米的水池旁，绑在翻转椅上，给他们灌酸辣水，吃夹硬币的饼干。“神父”过来祈祷，号手把号吹得震耳欲聋，“催命鬼”往他们身上涂油彩。好一阵折腾之后，椅子一翻，5人纷纷落入齐胸深的水中。这时池内又窜出6条人扮的“鲨鱼”，按住他们喝水。最后，直到5人把6条“鲨鱼”制服，才逃出水池……

晚上，全舰举行庆祝宴会。舰长和教务长为苏银荣等5人颁发了《首次通过赤道证书》，上面写着：“通过艰苦的海上训练，你已成为真正的水手！”

第一次发怒

智舰又连续航行29天，于9月13日早晨冒雨驶入澳大利亚首都悉尼港。在抵达澳大利亚的第一天中午，舰上举行庆祝智利新政府成立20周年酒会。在323名舰员中，唯有苏银荣是来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位喝得微醉的智利学员，借着酒劲，指着苏银荣的鼻子大讲共产党如何不好，中国受共产党统治如何不幸等等。苏银荣正色地告诫他们：“你们这样很不礼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

一位胖学员跳出来：“国情？狗屁！中国人就能生孩子，一生一大堆！”接着爆发一阵狂笑。

“住口，请你尊重我的祖国！”苏银荣忍无可忍，拍案而起！

“啊，中国佬，你想打架吗？”180磅重的胖子晃动着膀子，逼上前来，并轻蔑地把苏银荣端着的盘

子翻扣过来！

苏银荣热血上涌，怒发冲冠，哗——手中的盘子飞将出去，砸在对面的铜柱上，摔个粉碎！全场震惊，鸦雀无声。

胖子被震住了，在众人责怪的目光中，灰溜溜地离去。

在大家的印象中，苏中尉一向为人和善，温文尔雅，今天第一次看到他如此盛怒，于是纷纷劝他不要将此事向上反映，那位胖子已受过三次处分了，再受一次，恐怕军籍就保不住了。

“不行，我们中国人从来是既讲友谊又讲原则的，因为破坏原则，就等于破坏友谊！”

苏银荣到底把此事向舰长作了报告，但请求舰长对胖子免于处分。

舰长把胖子和其他两名参与者找去，严厉地批评一顿，然后责令他们向苏银荣陪礼道歉。

此事后，中国中尉令人刮目相看，格外受人尊重。

老水兵送他一面 五星红旗

9月30日早8点，在惠灵顿女王码头，全舰人员在甲板集合，军乐队齐奏中国国歌。舰长宣布：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4周年，祝苏中尉节日快乐！

苏银荣用西班牙语作了5分钟的演讲。他说：“今天大家在太平洋上为我的伟大祖国庆祝生日，我为自己是祖国的儿女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晚上，在军士长餐厅，全体士兵自发地为苏银荣中尉举行庆祝鸡尾酒会。61岁的老军士长来特必来代表全体士兵，向苏银荣赠送一面巨幅的五星红旗。他说：“苏先



▲ 苏银荣（右）与智利学员一起升帆

生以高尚的人格和忠诚于祖国的精神，赢得了我们全体士兵的尊敬和爱戴。苏先生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借庆祝中国国庆节的机会，将‘埃斯梅拉达’舰进入上海时悬挂的这面中国国旗，赠送给他，我们认为，他受之无愧！”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苏银荣用颤抖的双手展开五星红旗，好象展开一面红色的帆……

马丁上将接见他的照片，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11月14日，“埃斯梅拉达”号凯旋返回智利瓦尔帕莱索港。至此，环绕太平洋的远航实习圆满结束。

下舰前夕，苏银荣应邀为全体军官和学员作了一场题为《中国军事》的学术报告。他用西班牙语讲了35分钟，然后现场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听报告的人无不感到惊讶，这位上舰时尚不会讲西班牙语的中国中尉，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西语讲的如此流利？其实，苏银荣凭借的是厚实的英语底子和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

即使在大风大浪中航行，他也要把自己捆在铺上，每天坚持攻读西班牙语。报告结束后，舰长上前握住他的手，说：“你真是好样的！我为中国海军有你这样的优秀学员而感到高兴！”

14日上午，智利海军司令马丁上将登舰，检阅了全体远航人员。他走到外国军官方队前，与站在排首的苏银荣中尉互致敬礼，亲切握手，他用英语问道：“你会西班牙语吗？”苏银荣回答：“我上舰时学的，能讲一点。”接着，马丁用西班牙语问道：“生活苦不苦”



苏银荣（后排中）与马来西亚华侨学生在一起

“苦，但是很快乐！”
“你对这个航程如何认为？”
“机会难得，意义深远！”……

次日，智利国家报纸——《埃·麦德古多》头版头条，刊登了马丁上将接见苏银荣的大幅照片，第三版还刊载了该记者对苏银荣中尉的访谈录。苏银荣上街吃饭，

市民们一眼就认出他，饭店的老板竖起大拇指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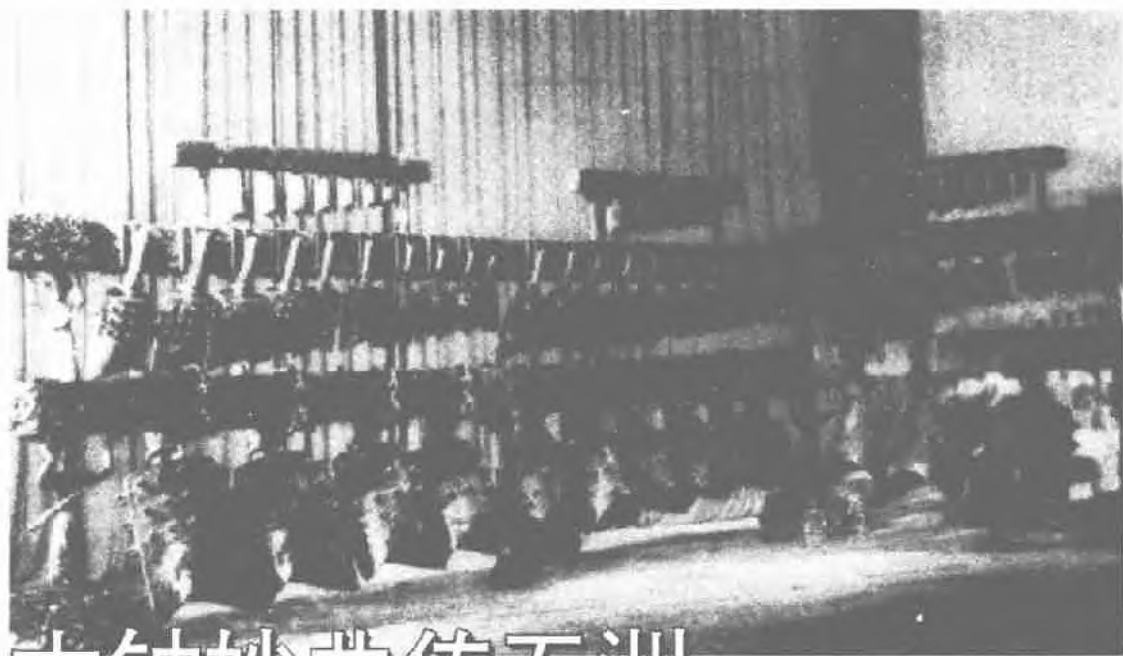
12月10日，苏银荣乘飞机返回祖国。他从“埃斯梅拉达”号带回国旗、奖章和证书，而在太平洋上留下的是一面永远不落的中国帆！（责任编辑 王 恂）

中国历代京城今何在？

商：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
西周：镐京，今西安西南。
东周：洛邑，今洛阳。
秦：咸阳，今咸阳市东北。
西汉：长安，今西安。
东汉：洛阳，今洛阳。
三国：魏在鄆（今临漳），许昌，洛阳；蜀在成都，吴在建业，今南京。
西晋：洛阳，今洛阳。
东晋：建康，今南京。

隋：大兴，今西安。
唐：长安，今西安。
北宋：东京，今开封。
南宋：临安，今杭州。
西夏：兴庆府，今银川东南。
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波罗城。
金：中都，今北京。
元：大都，今北京。
明、清：今北京。
原载《华夏文化》（孔祥光

辑）



古钟妙曲传五洲

——来自编钟故土随州的报告

● 徐士杰

湖北省随州市城西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早期古墓文物——大型成套系列编钟，以它蕴含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内涵，震惊中外。

从16年前破土而出的第一天起，它就一鸣惊人。2500多公斤重的64件编钟，经历地下2400多年悠悠岁月，重见天日之时，音乐性能完好无损，可演奏古今中外各种乐曲。古钟妙曲，使数以万计有幸聆听的中外人士如醉如痴。

一位美国音乐教授听过编钟演奏后称：编钟是古代世界文明的一大奇迹。

英国首相希思对编钟的评价是：“你们国家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高超的音乐，世界任何国家无与伦比。”

16年来，编钟古乐从大江上

下、长城内外走向世界，走到哪里，那里兴起“编钟热”。据说，仅海内外研究编钟的论文专著，字数即以千万计。

据专家介绍，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哪一次考古发掘能引起海内外人士如此广泛持久的关注。

编钟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它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笔者日前跟随一批我国著名的楚史、考古专家踏访随州，得便就这些问题请教于识者，见闻所及，颇得一些见所未见之事，闻所未闻之教。

偶然的发现与 兆然的辉煌

擂鼓墩，因其居高俯控随州，临灞水而突起，历史上小有名气。

史称，鄂北随(州)秦(阳)间神农故里九十九岗连绵起伏，擂鼓墩为第一岗。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楚相(当时叫令尹)斗越椒叛乱逃随，楚王派大将养由基讨叛，在此擂鼓进击，擂鼓墩由此得名。当然，那点名气和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古代擂鼓墩的鼓声，传而未远；当代擂鼓墩的钟声，却使万里动容。

解放前的擂鼓墩，原是一片农田荒丘。建国初，人民子弟兵披荆斩棘辟为军营。说来也巧，这擂鼓墩中古墓国宝的发掘，竟是肇始于军营基建清基中的一次偶然发现。我国著名的楚史专家张正明教授曾向笔者动情地评价这次发掘，应给予子弟兵记一大功。他认为这里的子弟兵既是国宝的发现者，又是国宝的“守护神”。

1978年是我国考古界极不平

凡的一年。有人说，这一年应作为“编钟年”载入华夏考古史册。这年的9月7日，新华社向海内外公布了这么一条消息：“我国考古工作者不久前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发掘了战国早期的一座诸侯的大墓。墓内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漆木竹器、丝麻织品和竹简等七千多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8种124件古代乐器，是我国音乐史上的空前发现。”并指出乐器中有铜编钟64件，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另有鎛钟1件。”消息在最后交待，经鉴定“曾侯乙”铭文，“墓主无疑就是曾侯乙，即曾国一个名叫乙的君主。”

从墓葬的规模之大和随葬器物有成组的礼器和编钟、编磬来推断，墓主的身份应为列国诸侯。再者，墓中出土的绝大多数铜器上都有“曾侯乙”的铭文，当然，墓属曾侯，应为可信。问题是，史籍文献，只有随国随侯，从未见过曾国曾侯。而地下铭文，却只有曾侯，未见随侯。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呢？破译这个奥秘，据说专家们是从鎛钟的31字铭文上找到的突破口，那铭文是这样写的：“佳(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禽(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鎛钟，按铭文所记，是楚王熊章以王室重礼赐给曾侯作为宗庙祭器的。曾侯乙能获此殊荣，很不简单。熊章即楚惠王，这位惠王是楚国在位最长的一代君主，从公元前489年至前432年，在位57年。这位楚王赐曾侯乙鎛钟的时间是公元前433年或稍后一些年份。按这个时间段论证，随州这块土地上，则只有随国没有曾国，只有随侯没有曾侯，所谓地下的“曾侯乙”即是地上的“随侯乙”，除此，别无第二种可能。这也就是学术界现已基本形成共识的

“曾随合一”说。

曾侯乙凭什么 获此殊荣

关于这个问题，一些专家的看法是要从当时楚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

从政治上说，楚为南方霸主，从惠王向上数第七代楚王——庄王时，就曾“问鼎中原”。但随也不可小看，史称“汉东之国随为大”，而且随曾两次有功(或许有恩)于楚，一是楚成王上台时，随支持成王有开基之功；再是公元前506年，吴破楚入郢，楚昭王逃入云梦泽，被“盗”袭又奔随，随保护昭王复国有功。随侯有这样功劳，惠王是接他父王昭王的班上台的，所以，赐鎛钟以示敬重，这是情理中事。

从经济上说，随居古水陆交通枢纽，发展经济区位优势，它东临云梦泽，与当时“铜都”——铜录山隔泽相望，北经襄阳与中原相通，西靠楚郢，南依江汉。依此推断，在青铜文化时代，随极有可能形成我国南方重要的冶铜基地。建国后，随州境先后出土编钟5套，另有一套出自长江武穴港(有人疑为沉船遗物)。这些编钟的铸造工场，若有几处的话，有一处在随的可能性极大。擂鼓墩出土的绝大部分铜器和部分兵器上都铸有“曾侯乙”字样，而其它墓葬出土的铜器、兵器很少有此情况，这很能说明随在当时有着较强的经济实力。曾侯获赐鎛钟，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楚对随经济繁荣的一种褒扬。

再从文化上说，有的专家认为，随文化兼收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之精华，从总体上讲虽属楚文化范

畴，但其个性鲜明，又有区别于楚文化的随文化特色。从楚惠王向上数第12代先王楚武王时，随国出了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季梁，人称“神农之后，随之大贤”。他辅佐随侯治国，提出“民，神之主也”，“忠于民而信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的“民和”观。他说这话的时间是公元前706年，比孟子提出“民为贵”还早约4个世纪。正是有这样丰厚辉煌的文化传统，才孕育出了以“曾侯乙编钟”为代表的古随音乐文化。

综上所述，许多专家都有这样一种看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青铜时代的随州，则编钟出自随土，随侯荣获鎛钟，也都是历史的必然。

国宝编钟何以 有诺大魅力

在随州编钟陈列馆的演奏厅里，《东方红》、《春江花月夜》、贝多芬交响乐C大调片断等，一曲曲气势恢宏的钟乐古韵，把人们带到了古乐与今声、中乐与西曲美妙融合的极乐世界。不是亲耳聆听，人



青铜编钟

们很难设想这神韵竟出自 2400 年前中国乐师们铸造的编钟的复制品。

编钟的确有它难以估测的神奇。它是我国，也是当代世界迄今出土的年代最古、数量最多、音域最宽、十二半音关系最完备、保存最完好的特大敲击乐器。这套编钟的钟体上镌刻的 2800 多字篆体铭文，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国先秦乐学理论。中国“十二音律”的出现使中外音乐家不得不修正现行的音乐教科书，将世界音乐史的这一发现提前了千年。

一些中、外学者过去曾断言中国战国无七声音阶，中国的“十二律”由希腊“舶来”。编钟的钟声彻底否定了这一论断，还了音乐历史的真面目。有人说，仅凭这一点，就给编钟立一尊不朽的丰碑。

更有奇者，1981 年擂鼓墩 2 号墓又出土了一套 36 件的编钟，它和 1 号墓的曾侯乙编钟加在一起，刚好是“百钟”。据武汉音乐学院院长童忠良教授介绍，这套编钟中的 8 件大雨钟音律与曾侯乙编钟完全一致，其余 28 件小雨钟恰好填补了曾侯乙编钟短缺的高音区，使整套编钟的音域从五个八度扩展到六个八度。这个“百钟”系列可分可合，分则自成体系，合则形成更为完整宏伟的大系，堪称中国古

乐的“万里长城”。2 号墓编钟被专家视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但令人困惑者，此墓主人何许人也，无只字铭文可考。

“钟鸣鼎食”，历来被视为古代中国富有的象征。编钟的出土，不仅具体勾画了古代中国君侯钟鸣鼎食的实物场景，而且还展示了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生活画面。据专家介绍，编钟和一些同时出土的铜器表明，编钟铸造者们所表现出的冶铜技艺之精湛，当称古代一绝。

古代神州，如何以其领先的精湛技术推动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步伐，从这里，似乎可窥见一斑。这大概就是编钟魅力的一个方面吧！

国宝不仅仅是

编钟……

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 15404 件乐器、礼器、兵器等文物中，堪称国宝者却不仅仅是编钟，据介绍，这些国宝不外两种情况：

一种是“首发式”的，独一无二的国宝。比如乐器中的十弦琴、排箫、篪，过去只有文字记载，未见实物，这里发现了；兵器中的钺（古代五种主要兵器之一）、三戈戟、双戈戟，也首次在这里出土；一只漆奭（衣箱）箱盖上图文并全的二十八宿天文图象，盖中央绘北斗，四周朱漆书写二十八宿名称，左右两边图绘古代四象中的青龙白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

另一种是“夺魁式”的，同类器物中的佼佼者。比如曾侯乙尊盘、鹿角立鹤、漆木豆等，造型精美奇特，前所未有；曾侯乙金器与秦以前出土的相比，数量之多，单件之重均居冠，一件金盃重 2156 克，号称

“金盃王”；曾侯乙墓中的纱、绢、绣、锦中，丝麻交织物为世界最早的丝麻混纺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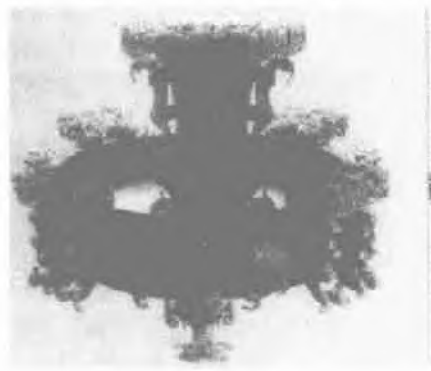
华中理工大学年轻的博士研究生刘克明，重新评价了这些国宝的地位和作用：一、不仅要从中国科技经济发展史的高度，研究这些国宝；而且要从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史的高度，研究这些国宝。也就是说，要从新的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些国宝的价值，确定其本身具有的、但尚未完全被人们认识的历史地位；二、研究老国宝，是为了催生新国宝，研究中国科技的昨天，是为了开创中国科技的今天与明天，我们应写出一部科学的中国科技发展史，纠正某些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误解和偏见。

从随州归来，笔者偶然翻阅 30 年前—1964 年毛泽东同志写的《贺新郎·读史》，不禁浮想联翩。

词曰：“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番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那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向。”

说来再巧不过：1978 年 9 月 7 日，新华社发擂鼓墩发掘对内新闻；9 月 8 日，发毛泽东同志《贺新郎》等诗词三首；9 月 10 日，又发擂鼓墩发掘对外新闻，几乎是在同时。笔者不禁突发奇想：毛泽东词中所说的“铜铁炉中翻火焰”，不就包括着 2400 年前，神州荆楚大地上铸造编钟的铜炉的熊熊火焰吗？那“有多少风流人物”的问询，不就包含着对铸造编钟的先民们的诚挚而热情的问候吗？

（责任编辑 孙 中）



青铜尊盘

载誉吐蕃的金城公主

● 格 来

在我国历史上，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促进汉藏两民族友好团结的故事，1200多年来一直被广为传颂。但在文成公主和亲70年之后，唐景龙四年还有一位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即西藏），对促进汉藏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的事迹却不像文成公主那样妇孺皆知了。

据了解，在吐蕃历史上，共有6位汉族公主嫁到西藏，金城公主是继文成公主之后，贡献突出的一位皇室公主。她的事迹在拉萨布达拉宫、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山南桑耶寺等古代名寺中都有记载，存有大幅壁画，有些地方还保存着金城公主的故居。特别是桑耶，却都沃等乡镇的藏族农民中，还流传着金城公主在丰收季节与民同庆同乐的种种传说。

金城公主是唐代雍王守礼之女，唐中宗李显皇帝之养女。自幼长在宫中，美丽、聪慧、贤淑，知书达礼，善书画，精琴棋，能歌善舞，深得皇帝宠爱。当时来长安求婚者接踵而至。

这时，吐蕃将强兵足，远征大将昂敦率兵远征到云南大理，并企图染指境外的伊朗、印度等国，对唐朝造成一定的威胁。而吐蕃以赤德祖赞为藏王的王室却比较空虚，势力单薄，军队不听王室指挥。为保障王室安宁，王位稳固，王母提醒藏王，必须学习英主松赞干布先例，迎娶大唐公主为贤内助，方可借助唐廷力量，巩固王位。

景龙三年十一月，藏王赤德祖赞遣大臣尚赞咄为王子江擦拉温向金城公主求婚。藏王动用王室黄金2500两，挑选骏马1000匹（合2500两黄金）共5000两黄金为聘礼，浩浩荡荡来到长安，促成联姻。

根据当时的形势，为安邦安民，唐皇李显及皇后考虑再三，决定恩准公主远嫁吐蕃王子江擦拉温。当时公主年方16岁；王子18岁，骁勇善骑，挽弓能百步穿杨，马上能伏身拣起地上数十条哈达。郎才女貌，是一对佳偶。唐朝为表示重视这一婚姻，动用一万头骆驼、骡、马等牲口，驮运嫁妆。送别时，在长安西部渭河岸始平县举行赋诗大会，皇帝、皇后及文武大臣、朝廷全部官员倾城出动，隆重欢送公主进藏联姻。赋诗会上，宫廷大员、学士、文武官员争先赋诗。工部侍郎李适，首先

赋诗一首：

降河从远聘，青海赴和亲。
月作临边晓，花为度陇春。
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
独有琼箫去，悠悠思锦轮。
接着，学士薛稷赋诗：
天道宁殊俗，慈仁乃戢兵。
怀荒寄赤子，忍爱鞠苍生。
月下琼城去，星分宝婺行。
关山马上曲，相送不胜情。

薛稷刚吟完最后一句诗，全场一片歉歉声。李显皇帝下旨：“从今日起，始平县改为金城县（今兴平县），凤池乡改为枪别里。特赦始平县囚禁犯，百姓免服兵役两年。”以此纪念金城公主远嫁吐蕃的壮举。

大型的皇宫仪仗队、乐队，伴随着公主彩轿，翻过高耸的日月山，从湟源朝南行，踏上了唐蕃古道。公主从依依惜别的悲痛之情中平静下来，掀帘远眺。她看到高原上蓝天白云雪峰交相辉映，草原辽阔，天高气爽，空气新鲜，视野如画。近处，百灵鸟、云雀的叫声婉转动听，溪泉潺潺，瀑布飞泻；远处，雄鹰在飞翔，野羊、藏羚羊、野驴、马鹿在成群奔跑，还有旱獭、草原鼠在互相追逐。公主在彩轿内目不暇接，精神极为振奋。她从小生活在宫廷，从未见过这样大的草原，这样壮丽的景色和这么多的野生动物。

她心早已飞到王子身边。

王子江擦拉温听说唐皇已恩准，把仙女般的公主许配给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巴不得立即上路，把公主从唐蕃古道上亲自接到没些（拉萨）。这时他茶饭不思，一心去河源（玉树）迎接公主，并立即禀报父王。父王感到太不安全，又感到年轻的王子同公主在途中见面，弄不好会失体统，不同意此举。但王子不肯，执意要去，还缠住母后说服父王。在母子的一再请求下，父王勉强同意，安排得力护卫上路。

时值高原金秋，天高气爽，牛肥马壮。经过万中选一，给王子选了一匹纯白的“云雀”马，号称“千里云雀”。此马产于黄河九曲之地，日行千里，从不歇蹄。王子乘上“云雀”，与百马同步试骑，经过三次比赛，王

子总是在千米之外遥遥领先。立时，王子因马得名，都称他“白马王子”，准备择日启程。

就在这关键时刻，吐蕃王室远征大将昂敦得胜归来。他佩剑进入宫廷，扬言：“吐蕃圣地，不娶汉女”，“吐蕃美男，不近女妖”。为阻挠这桩婚姻，经过密谋，他暗派两名亲信，备快马，佩利剑，分两路，要在途中趁卫队不防，杀死公主与王子。

就在王子离开王宫三天后，进入牧草茁壮，山泉淙淙的藏北草原羌塘。有人暗中鼓动说：“阳光下给马沐浴，月光下同云雀比赛。”王子闻后喜溢眉宇，下令：“今日早歇。三天了，马身多汗，日光浴，放马后，晚间赛马，胜者可得一只肥羊。”

晚上九时许，正当白马王子骑云雀第一个到达终点时，有人暗藏在长草丛中，拉满有毒的弓箭直射王子。王子落马，毒性发作，立即身亡。

公主在日月山草原上心情愉快，精神倍增，正沿着唐蕃古道继续向西南进发，突然有飞骑来报：“王子在迎接公主途中，月光下赛马中箭身亡。”

公主一听，如五雷轰顶，顿时昏了过去。当几名侍女扶起公主时，公主嚎啕大哭，泪如雨下，示意丫环，在帐篷设祭坛，手举酒杯，遥祭亡夫。她边哭边说：

“夫啊！您先喝这前半杯，这后半杯苦酒由妻来尝”。公主将半杯酒洒在祭坛前，祭奠英魂。

“这第二杯酒，愿夫妻来世在人间，恩爱久长，永不分离！”

“这第三杯酒，请夫君接受妻子一心无二的诚挚的爱，不论我沦落何方，永世把王子的爱深深埋在心灵深处，不会遗忘，直到生命的尽头。”

公主祭罢亡灵，回头对护送公主进藏的唐廷大将杨矩说：“杨大将军，到底我该怎么办？何去何从，该回长安吧？”

杨矩一听公主主要回长安，立即相劝：

“公主，未将乃圣上降旨，充当护送公主的婚使，此际既是和亲、联姻，又是圣上安边之略，安邦为国大计，为社稷为民众，国泰民安。”“公主，您可知唐朝有个礼俗，唐朝的女儿出嫁，一生只有一次，犹如人的心，只有一个。嫁出的女儿，只能白头偕老。”

杨矩的话音未落，侍女如梦接话：“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再也回不去了……。”

“我金城既离中原，命中注定终身在吐蕃。”公主自言自语。

“豈仅为王子一人，公主不能灰心丧志，踌躇不前，要为国尽忠，不忘圣上教诲。”杨矩一再耐心相劝。

“为了唐蕃大业，按圣旨继续前行”。杨矩命战将卫

队随行人员，翌日启程，向蕃地羌塘进发。

大型的、隆重的仪仗队、乐队，吹奏起来，伴随着公主彩轿，继续向吐蕃羌塘腹地前进。

金城公主彩凤轿，在大将杨矩护送下将驾临圣地的没些（拉萨）。喜讯很快传遍了草原。彩车到达拉萨的当天，平素只有一万多居民的圣城，一下倾城出动，郊区农牧民，甚至几百里以外的日喀则、江孜、泽当、林芝、工布江达的民众也都提前赶来，迎接大唐皇帝的公主。一时间，整个圣城，吉祥的松烟缭绕，经幡彩旗飘扬，锣鼓声、歌舞声，震耳欲聋，整个城市人山人海，变成了歌舞和欢乐的海洋。

在群众盛情迎接唐公主的同时，掌握军权的大将反对和亲的军权家族，与藏王赤德祖赞展开了斗争，企图削弱藏王的权力。他们说什么“吐蕃有那样多的吉祥仙女，视而不见，却偏偏要找黑汉人的魔女”。还说“既不代表王室传统，又不符合民意民情，这样的藏王应及早废除，换上有功之臣。”

金城公主刚到吐蕃，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势单力薄，步步艰难。军权家族不让她进宫，只能住在布达拉宫背后，龙王塘一侧的鹿苑内。但她热爱勤劳、智慧、纯朴、善良的吐蕃人民，决心克服困难，为群众做些有益的事。由于藏族人民全民信教，公主从群众迫切要求朝拜释迦牟尼像的虔诚心情中了解到，文成公主当年同藏王松赞干布成亲时，从长安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佛像，原供在大昭寺内，后因战乱，佛像失踪了。为了寻找这尊佛像，金城公主查访了好多人，去过不少寺庙，历尽艰辛，才找到了一位知内情的高僧，经他密报，公主终于从一处墙壁的接合部泥缝深处找到了这尊佛像。

经藏王从内部支持，寺庙高僧主持，鸣佛号法器，烧松烟，点千盞酥油灯，隆重举行了释迦牟尼佛像开光仪式。人们相互传告：“释迦佛重现了，是金城公主找到的。”顿时万人高歌欢舞，高唱：“到处是祥和、瑞气，到处是吉祥如意。”这一喜讯，一下传遍了青海、甘肃、云南、康藏地区的数十万藏胞，不少人远道跋涉，朝拜佛像，晋谒金城公主。

此事，震惊了吐蕃王室朝野，一致认为金城公主为王室带来殊荣，不愧为大唐公主，显示了大唐皇威。

王室立即决议“清扫庭院，恭请公主入宫”。

金城公主乘彩凤轿入宫，再一次轰动吐蕃人民，沿途好几万人挥舞哈达、经幡，一睹公主风采。

公主乘轿入宫时，彩帘全部拉开，笑逐颜开，双手合十。

入宫后，公主给藏王换上她从长安带来的绫罗绸

缎,公主也按吐蕃风俗换上了精美的吐蕃服,藏王的饮食既保持了吐蕃的形式,也掺进了唐代的御膳。公主协助藏王安排了宫廷的许多繁杂事务,博得了王室上下一片称赞。公主还不断给唐皇上表,将唐朝的杂技百工、龟兹乐及《毛诗》、《左传》、《礼记》、《文选》等汉籍引入吐蕃,使唐蕃关系更为密切。

藏王对公主宠爱备至,感情日深。因为王子无兄弟侄亲,公主为唐蕃立业,按唐蕃规矩、朝仪,嫁给了老王,夫妇无比恩爱。

不久,公主怀孕,引起军权家族的忌恨,认为一旦公主生下王子,那吐蕃的江山、权势都落在金城公主之手,军权家族必成“阶下囚”。为此,他们对公主下了毒手,在公主分娩的时刻,捆绑了公主的贴身侍女如梦,换上了军权大臣派去的亲信,充当侍女,搞了掉包计,把公主生下的小王子,换上了一只刚出窝的小狗,而且把小王控制起来,不让他坐在公主身边。藏王虽知道这是军权大臣搞的鬼,但由于他们势力大,也无可奈何。后来,在王室大管家尊札赤列的精心安排下,公主深夜去给王子喂奶,两岁以后,能认出自己的母亲,并能叫公主为“阿妈拉”(妈妈)。为戳穿军权大臣的阴谋,在王宫举行了盛大的认母宴,小王子双手举着金杯,跪在金城公主膝前,把喜酒献给公主,叫了一声“阿妈拉”(妈妈的爱称),公主的热泪如断了线的珍珠,落在小王子身上。当公主抱起王子使劲亲吻时,全场的文武僧俗大臣、官员,都情不自禁,歔歔拭泪。所有的人都明白了真相。

至此,军权家族的阴谋全部败露。但他们依仗掌握的军权,仍然把公主逼得离开王宫,让她住在远离藏王、王子的山南雅砻河谷新建的土屋——庞塘宫内。

金城公主来到雅砻河谷,经常体察民情。每逢庄稼丰收的季节,公主总要观察一下藏族群众的收成情况。当公主出现在田野时,藏族农民无不欢天喜地,跑过来,高兴地告诉公主“洛勒姜桑”(又获丰收了)。还有的老大爷说:“松雅洛雅”(好种遇上了好年景)。听到这些,公主特别高兴。因为这里的不少良种都是公主上表父皇,从关中800里秦川筛选运来的。而且每逢丰收,群众把新收获的白面饼子、新磨的糌粑,争先送给公主尝新。

一次,金城公主到农村时,藏族农民妇女兴高采烈,许多人跑来祝贺公主“扎喜德来”(吉祥如意)。唯独一位少妇,一见公主转身就走。公主感到很诧异,跟着这位少妇走去。少妇见公主赶来,无处躲藏,转身跑上去抱住公主,并双膝跪下哭成了泪人。

“啊,如梦,是你,还活着?”

这位少妇,就是军权大臣是为搞掉包计而捆绑走的侍女如梦。他们还把如梦塞到冰窟窿里,想淹死她以灭口。普布把如梦背到了很远的一处山洞,深夜从家里背食品、衣服,护理、看守如梦。普布家修了几间新房子以后,一个黑夜里,如梦骑着牲口,在普布的陪同下,住进了新房子,一连两年闭门不出,给普布织了很多精美的毛呢子和氍毹。随后两人情投意合,就结为夫妇,如梦还为普布生了个胖儿子。

“普布是什么样的人呢?”公主问如梦。

“这普布,就是军权大臣暗中派来,准备在途中杀害公主的人啊!”

“他为何又要救你呢?”公主不解地问。

如梦回答说:“他跟了您一路,认为公主和白度母一样的心肠,处处想着吐蕃人民,为唐蕃立大业,为吐蕃人民做好事,是‘吉祥天女’,我们敬都敬不过来,怎敢害她。这以后他下决心要保护公主。”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公主把如梦叫进宫中,并告诉如梦,“普布回来后,一家三口,都进宫去。”

这时,公主虽然常常遇到困难,但她一想到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以及自己肩负的加强汉藏团结的使命,便增添了勇气和力量。她为促进汉藏物资交流,向父皇上表,实行唐蕃会商,先后在青海、西康、甘肃、新疆、四川、云南等边境地区和同内地接壤的城镇,设立了上百处物资交流场所、集市贸易点、茶马互市的大集市,使内地与边境的经济迅速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汉藏民族的大团结。

接着,公主又向父皇上表,请史书,向长安送去200名吐蕃学子,学文取经;公主还给父皇上表,使唐蕃边境避免了20多次大的民族战争和民族内部的流血牺牲。特别是在金城公主的努力下,唐蕃永远和好的巨大盟碑,1200多年来,长期屹立在拉萨大昭寺广场。这种团结友谊的盛情一直延续到元代。金城公主生的王子——赤松德赞,在金城公主的教育下,后来成为西藏历史上很著名的藏王,政绩赫赫。

金城公主在吐蕃艰辛度过30载,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冬(公元739年)薨于西藏山南雅砻河谷庞塘宫。

为宣扬金城公主促进汉藏团结的光辉事迹,199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将拍摄多集电视连续剧,以重温这一段久远的历史。这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林 耀)

安刘氏天下者，谁也？

——西汉著名的辩才和谋士陆贾

● 李邦云

公元前195年，西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在病故前已看到皇后吕雉专权的危害，因而幸马歃血为盟，并明示天下：“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同时他还留下了“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的遗嘱。他把安刘氏天下的重任和希望寄托在周勃身上。刘邦死后，子刘盈即位，因年幼，吕雉代理朝政，大权独揽，胡作非为，危及刘氏政权。公元前180年，吕雉死后，刘邦的故旧大臣便将吕氏势力推翻。不知是高祖皇帝早有定论，还是因为陆贾官小职卑，后人一直认为，周勃是安刘氏天下者。不可否认，周勃在诛灭诸吕的斗争中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笔者认为，真正在关键时刻起重大作用，荣立头功的应首推当朝太中大夫陆贾。但他却几乎不见名人经传，也未受到重用和赏赐。

—— **将相和的牵线者。** 刘邦死后，皇帝刘盈年幼，吕雉代理朝政，她首先惨杀刘邦的宠妾戚姬母子及后宫佳丽。刘盈也在抑郁中死去，她又立少帝并临朝称制。后又杀少帝，并封其兄弟子侄为王，把太尉周勃的兵权交给吕禄掌管。弄得周勃、陈平不仅有职无权，而且处处受到控制。加之周勃曾在刘邦面前进过陈平的谗言，说陈平居家时曾与嫂子有染，出外谋事不讲信义，朝秦暮楚，收受部属贿赂，引

起刘邦怀疑，从此，两人产生嫌隙。他们虽然同朝为官，但平时并不往来。当时陆贾以年迈多病为由，退休在家，经常吟诗听琴，仗剑闲游，但却留心世事。他对陈平和周勃的心理活动揣摸得十分准确。一次陆贾到陈平家登门拜访，看到陈平心事重重，知其官居相位，封爵列侯，食邑三万户，富贵至极，所忧者诸吕专权也。陆贾将其一语道破，陈平遂把心里话和盘托出，并向陆贾讨教对策。陆贾也亮出心思，毫不掩饰自己对吕氏的厌恶，并提出：“天下安，注重相，天下危，注重将，将相和睦，则士心归附。”后来陈平又委托陆贾去游说周勃，联手抗吕。陆贾于是又去拜见周勃，并极力进行和解，反复说明陈平如何胸怀坦荡，以大局为重，毫无介蒂，并诚意邀将军前往共商大计。二人在陆贾的调解下，从此情投意合，捐弃前嫌，为诛灭诸吕奠定了基础。

—— **拥刘势力的联络者。** 诸吕专权多年，其关系盘根错节，要将其权力重新夺回，光靠上层的力量还是很不够的，稍有不慎，不仅功败垂成，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必须进一步团结中下层军官，同心协力才能成功。陆贾凭着自己出色的辩才，到处游说结交，力劝朝臣背吕助刘，不为吕氏殉葬，众大臣多被说服。特别是在吕雉病死，齐王刘襄首先发难，吕禄、吕

产立即令大将军灌婴领兵镇压。陆贾知道后，不仅及时向陈平、周勃通报了情况，而且亲自赶到灌婴军中，陈说利害，晓以大义，劝其不要助纣为虐，要按兵不动，静观时变。同时为灌婴出谋划策，让其一面派使者与齐王联络，劝其暂不轻进，待机而动；一面派人回京报告，谎称业已挡住齐军攻势，不日将剿灭齐军。安排得天衣无缝。

—— **夺取吕禄兵权的谋划者。**

这时虽然其它方面的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但兵权特别是禁军却仍掌握在吕氏手中，因此夺取兵权就成为诛灭诸吕的关键。陆贾了解到曲周侯酈商的儿子酈寄和吕禄交情很厚，于是向陈平献计，把酈商招来扣作人质，然后让酈商命令儿子酈寄去诱劝吕禄交出兵权。同时陆贾又教给酈寄方法，要酈寄向吕禄陈说利害，劝说吕禄交出兵权回到自己的封地。酈寄于是依计而行。吕禄本来就是没有远见的庸碌之辈，加之酈寄是他的好友，便信以为然，打算交出兵权。后来情况变化，吕产匆忙入宫，并亲率禁军守卫。陈平、周勃在关键时刻，一面冒险假托诏命闯阖北军，一面派酈寄和典客刘揭去迫使吕禄速交将印，于是吕禄便将将印归还周勃。周勃立即集合北军，并大声喝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即分别脱掉右臂或左臂的衣袖。）北军

上下均左袒，决心为刘氏效力。周勃与朱虚侯刘章于是合兵包围皇宫，吕产措手不及，被刘章杀死，诸吕势力遂被迅速消灭。

——功高无赏的淡泊者。陈平、周勃得手后，立即废除吕氏所立小皇帝，并公推刘恒即位，他就是汉文帝。文帝论功行赏，大封功臣。太尉周勃加封食邑万户，赐金千斤；丞相陈平加封食邑三千户，金二千斤；将军灌婴加封食邑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典客刘揭以及其余有功人员，大小均有封赏。唯独立下首功的陆贾无尺寸之赏，仍当他的平头百姓。他也不去计较，而是一个人悄悄离京返乡，安度晚年去了。

陆贾历史上还为汉王朝作过许多卓越贡献。他曾两次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受汉皇册封，归汉称臣。他还针对刘邦“我在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用”的观点，提出了“马上得天下，难道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的著名论点，予以反驳，使刘邦改变了蔑视知识分子，看不起儒生的傲慢态度。陆贾还著有《新语》十二篇，以传后世。总之，陆贾不仅是一位具有高超论辩才能的外交家，而且是一位高瞻远瞩、足智多谋、善观时变、胸怀坦荡、淡泊名利、超凡脱俗的政治家和谋略家，是安刘氏天下的首功人物。

(责任编辑：赵友慈)



特邀编委 部分作者 座谈会 发言摘要

为了把《炎黄春秋》办得一年比一年好，1995年新春伊始，本刊邀请特邀编委和部分作者在文采阁举行座谈会，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出席座谈会的同志踊跃发言，对本刊今后如何把刊物办得更好，提出许多好的建议。现将会上的发言，按发言的先后次序，摘录发表如下。

杜导正(本刊社长、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本刊创刊以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包括今天到会的同志。在此谨表谢意。本刊创刊三年半，努力遵循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萧克同志反复讲：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要求实存真，我们党和军队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对古今人物、事件都要实事求是，做到：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我们努力这样

做的结果，是广大读者的信任和支持。今年订户又增长5%，即是证明。正因为订户的的稳定并逐年增加，才使我们有可能在售价未变的情况下，承受了印刷成本提高了12%的压力。

高举爱国大团结的旗帜，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祖国而共同奋斗，也是本刊一贯追求的目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凡是对中华民族作过贡献的炎黄子孙，都在我们宣传之列。因此，在台湾、在海外都引起人们的注意。

刊物也有毛病：少数文章内容不够准确，甚至发生事实错误，对部分人物、事件分析得不够，编辑、校对工作有很多缺点，印刷质量不高，图片模糊，错别字很多，等等。

今年的宣传有两个方面要特别注意：一是坚定宣传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其核心是实事求是。要做到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宣传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要准确，分

析、评价要科学、谨慎。二是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遵循中央提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力求发表的文章要有深度，有自己的特色，宣传得更主动、更有章法。

办好一个刊物不易。让我代表杂志社全体同志，对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再次表示感谢。

温济泽（特邀编委、原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同意老杜同志对刊物成绩的估计。我看了《炎黄春秋》刊物中文章的一半左右。它具有史料性和一定的文献价值。它的主要作用是：以史鉴今，以史育人。比如，有关甲午战争的文章，不是一般的介绍历史，而是提出了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再如，过去发表的《省委书记——叛徒——烈士？》，写了一个人的复杂的一生，这样的人不是个别的，因为历史是复杂的，人的变化也是很复杂的。把一个人复杂的历史真实的反映出来，发人深思。

刊物的缺点也可以举出一些，譬如有的按语和“导读”写得不太好；文章中常识性的错误常常出现；错别字还很多；等等。

今年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遵义会议召开六十周年，还是恽代英诞辰一百周年（8月12日），瞿秋白就义六十周年，可组织的稿件很多。望注意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我们的杂志要办出特色，避免与其它刊物雷同，还要注意互补。

李庄（特邀编委、原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我对这个刊物有很深的感情，每期都用心读。这是一个严肃、负责的刊物。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办刊。文章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讲道理。既有可读性，又能

给读者以启迪。

《炎黄春秋》多为自费订阅，在报刊订购滑坡的情况下，它的订户逐年增长，很不简单。

选题、选材如何更恰当些，要研究。1994年第12期三篇文章是关于阎锡山的，太集中了。

每一篇文章尽可能以我为主。如《黄伯韬殉葬记》也应以我为主。如突出我军的艰苦、人民的支援、指挥的高明、指战员的英勇，敌人不得人心、指挥无能、内部矛盾、嫡系、杂牌军勾心斗角，等等。

要增加有关现实题材的文章，取材角度更高一些。如：京九铁路的修建全国很关心，可与京广铁路对比着写。京广路是京汉、汉广两路连接起来的，建了几十年，现在还未达到全线复线通车。京九铁路就大大不同了。这样既是写历史，又是写当前。

编校中的差错还有不少，如发表的文章中曾出现过“共军”的字样，这是贬义词。对袁世凯不能说“足智多谋”，而应说“阴险狡诈”。要加强“三校”；还可设“检查组”，专门负责历史事实、引语的核对。

田方（作者、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错别字难免，但应尽量减少。希望今年有大的改进。今年，世界妇女大会要在我国召开，要注意这方面的稿子。中国各界都有一些很有特色、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女性，要选择其中的代表人物，作一些生动感人的报道。

王景山（作者、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非常喜欢这本杂志。以去年12期为例，我喜欢《女杰胡筠志难酬》和《胡耀邦七次来广西》。我看“胡筠”一文时流泪了。在过去的历史上，我们自己杀掉自己的同志太多了。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胡耀

邦”一文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党的领导者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他到北海视察，约法五章。多好啊！刊物就应该“审视历史，记录今天”。审视历史，是为了今天；记录今天，是面向未来。历史是割不断的。

鲁迅是审视历史的。他的作品是如实、有血、有肉、有灵魂、有骨架的。我们曾读过毛主席的“老三篇”，我建议大家读读鲁迅的“老三篇”：一是《随感录二十五》，他让我们要做“人”之父，要讲教育、培养人；二是《论睁了眼看》，他要我们面对现实；三是《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他要我们重视提高人的素质。如果再加一篇，还要读《这个与那个》。鲁迅是提倡改革和开放的。

李锐（作者、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这个刊物很好，我每期都读。不懂得历史就不能认识今天，就不能把事情办好。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但在党的历史上最大的问题是屡犯“左”的错误。如王明路线、“文化大革命”。历史经验一定要总结，教训要记取。把能说清楚的问题尽量说清楚，我们垮不了。因为中国的工人好，农民好，知识分子好，他们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李锐同志还对刊物报道中国托派问题谈了一些好的意见。）

在李锐同志发言过程中，中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副会长、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同志就1959年庐山会议的一些情况作了说明。

吴象（作者、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会长）：

这个杂志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是靠其内容吸引读者的。它的读者除老年人外，不少中青年也喜欢看，还引起了研究人员的重视。

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强项是认

识历史比较深，善识精华。稿子选得准，就能把品位低的刊物超越过去。我相信《炎黄春秋》的发行量还会有大幅度的上升，潜力很大。

下面提出几点具体意见：

一、目标要定得高一点。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要涉及到，吸引力会更大。发人深醒的重头文章一期有一两篇，就可以吸引很多读者。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通过刊物的文章澄清，就会起很好的作用。目标要有长期的、近期的，要具体化。

二、利用我们的优势，以社会科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通过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记述，对青年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

三、不可能篇文章百分之百准确，有不同意见不可怕，在我们的刊物上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创造一种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心平气和探讨问题的气氛。

力平（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委委员）：

今年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我们应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拉住国民党坚持了八年抗战。宣传方式要灵活，除大块文章外，可开参加过抗战同志的座谈会，讲亲身经历，讲一两件事。这样有亲切感，第一手材料吸引人。

张伯海（国家新闻出版署党组成员、期刊司司长）：

《炎黄春秋》经受了发行量由少到逐渐增加的考验，理顺了发行渠道。这份刊物发行量不断扩大，说明它是有生命力的，是很有希望的刊物。希望注意当前的大环境，要有眼力，有魄力。

这个刊物有很大优势，得到很多老同志的支持。老同志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对历史、对人民、对党有责任感。希望这个刊物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阵地，人民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

刊物要在表现形态上更完美。它应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独特的标志，要与其它刊物有所不同。

魏久明（特邀编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

刊物要更上一层楼。希望：

一、多唱民族正气歌，振奋民族精神。要宣传民族气节，包括古人、今人。

二、对现代人的宣传要加重份量。要介绍新的英雄人物，包括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这方面过去宣传的少，面比较窄。

对过去的东西、传统文化，要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介绍人物评价要公允、要全面。写我们过去的失误时，要写清楚当时的

历史背景，目的是吸取教训，不再重犯错误。

今年要搞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要尊重历史，宣传全面抗战；要宣传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充分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严重罪行；要讴歌抗战中的英雄人物；无论敌后战场、正面战场，也不论是台湾同胞、港澳同胞，还是海外华侨，凡是对抗战作出过贡献的，都可以写。

冯征（特邀编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应唱正气歌，爱国主义是主旋律，要宣传爱国大团结。还要宣传统一战线、自力更生。

创办刊物的一条经验是敢讲真话。对党、对人民要敢于负责，有什么困难要克服，要存真求实。

在新的一年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贯彻爱国主义宣传纲要，讴歌民族英雄。还要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鞭挞什么，也要有计划。现在有些人只要金钱，不看历史。

要以史为镜，古为今用，去粗取精。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把刊物办得更好。

过去研究会对于刊物关心的不够，今后我们要多关心杂志。

（赵友慈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更正

本刊1994年第10期《古代廉吏拒贿术》一文中说，“明代还有一个著名政治家名叫于廉”，“于廉”应为“于谦”。

1994年第11期《历尽沧桑的炎帝陵》一文中说，“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建都于南方的杭州”，“杭州”应为“南京”。谨向指出差错的同志表示感谢，并向读者致歉。

征订《炎黄春秋》1994年合订本

本刊1994年合订本（总第22期至33期），已装订完毕，欲购从速。

精装本每册44.00元，免收邮费，挂号寄书。

原拟装订部分平装本，因工厂方面的原因，未能如愿，请读者原谅。

汇款时务必将收件人姓名、地址、邮政编码写清楚。

本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联系人：杜习；邮编100802；电话6076801。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著名的壁画《金城公主和王子赤松德赞》 陈宗烈摄影



(左)金城公主找到并重新开光的释迦牟尼像
(右)珍藏描绘金城公主寻找释迦牟尼像故事壁画的
布达拉宫大殿一角 陈宗烈摄影



炎黄春秋



乌兰牧骑队员为草原牧民演出



壶口瀑布

地下斗争二十年

——向警予的助手陈恒乔与丈夫胡允恭的传奇生涯

“杀了邝廌 还有邝廌！”

——北伐军歌作者与蒋介石的师生纠葛

老作家冰心的海军缘

第一个率团访问内地的台湾学者范光陵

乌兰牧骑走红神州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 11-2817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3.20元